

现代社会主义问题

(日) 伊藤诚 著
鲁永学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现代社会主义问题

〔日〕伊藤诚 著

鲁永学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028号

伊藤诚
现代社会主义

株式会社讲谈社 1992

根据株式会社讲谈社1992年版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95—394号

现代社会主义问题

〔日〕伊藤诚 著
鲁永学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5印张 124千字

印数0001—3000

1996年4月第一版 1996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682-7/C·57 定价：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序言 社会主义会继续存在吗?	(1)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	(10)
1. 社会主义多种形态的展现	(10)
2. 作为自然权的共产主义思想	(13)
3. 乌托邦的社会主义	(16)
4. 欧文与费边主义	(22)
5. 马克思主义	(25)
二、社会主义的理论	(30)
第二章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30)
1. 唯物史观的形成及其公式	(32)
2. 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论	(36)
3. 经济理论的贡献	(41)
第三章 社会主义论的展开	(52)
1. 苏联型社会的危机	(52)
2. 无产阶级正统理论与无产阶级被压制状态	(54)
3. 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种类型	(55)
4. 国家资本主义论与新阶级社会论	(57)
5. 分权制的计划经济与自治管理的方向	(59)
6. 利用商品经济的可能性	(61)
7. 关于追求经济效率的问题	(63)
第四章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67)
1. 社会主义不可能论	(67)
2. 社会主义经济合理存在的可能性	(74)

3. 市场社会主义论的展开·····	(81)
4. 关于市场与计划相关联的反思·····	(91)
5.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多样性的可能·····	(98)
三、社会主义的现实·····	(106)
第五章 新自由主义能救东欧吗? ·····	(106)
1. 东欧革命缘何而起·····	(107)
2. 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吗? ·····	(111)
3. 东欧变革与马克思学派·····	(116)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121)
1.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121)
2. 怎样看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124)
3. 恢复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128)
第七章 苏联的经济危机与体制改革·····	(134)
1. 改革的课题·····	(134)
2. 改革的进展·····	(138)
3. 从改革转向苏联解体·····	(144)
后记·····	(150)

一 序 言

社会主义会继续存在吗？

步东欧后尘，苏联的原政权统治宣告结束，迎来了其自身的解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正在使社会主义体系成为过去。回顾历史，千万人曾满怀着对社会主义的希望，并为之付出巨大努力，以至于献出生命，在痛惜之时，又面临着抉择。要么坚信社会主义才是历史进步的基本方向，要么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工人运动，评论、文学、思想，学说诀别。难道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仅仅是梦想，是对虚妄的盲目虔诚吗？这样的疑问正撞击着人们的心灵。

本书旨在回答这一时代问题，试重新讨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思想，理论，及其意义、现实可能性问题。

回顾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上拥有最广阔领土的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随着苏联红军的推进，革命扩展到东欧各国。1949年，在世界的入口大国中国，革命也取得了胜利。在印尼、北朝鲜、古巴、非洲的原葡属殖民地、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尼加拉瓜等国也相继独立，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国家。占地球陆地面积约30%的居住区，全世界人口的35%转入社会主义体系。人们认为，俄国革命是世界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克服了资本主义体制之下的异化、经济上的悬殊贫富差别，歧视、不公平、无保障，及对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压迫，两次帝国主义战

争灾难，和随之发生的经济危机。

这一认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一直对日本的政治、社会运动、历史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及学术界，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宇野弘藏在经济学界批判了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马克思的客观方法，就资本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分析，批判，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取得了独创性成果。宇野认为，以俄国革命为契机，世界史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因此宇野写信，社会主义首先在苏联出现并得到发展，逐步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会越来越多。当时他并未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弊病和压制进行批判。可以说，这是19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科学界的局限。宇野对斯大林的批判也主要集中于，斯大林错误地把本来是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用于经济建设。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误解。

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没有受到思想和理论上的批判。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由苏联推广到东欧各国，而后又被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于是，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其发展壮大是人类史进步的主流。

但是，当迎来20世纪最后十年之际，人们对这一历史前进的方向及其进步意义的信心大大动摇了。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人民群众获得政权，当家作主。按照这一理念建立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未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理念。勿宁说，广大劳动人民在强大的党、官僚统治地位、特权之下，被排斥于政治之外，被各级决策机构所排斥，出现了体制上的不民主和压迫的倾向。这些弊病被人们反复指摘和批判。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常常揭露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家权力的消亡，这一社会主义的理念之一，已被现实所否定。人们还发现，经济的发展非但未能超过资本主义，反而

陷于停顿。特别是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消费水平出现了很大差距。

面对这种状况，人们期待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压迫和危机。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恶化之中，社会主义面临着预想不到的重大考验，转为守势。如在本书第三部份中将阐述1989年发生的东欧变革，1987年以后在中国出现的经济改革，及苏联的改革，这些都是对于考验的反应。由此而发生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方向和程度虽大相径庭，但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以搞活经济，却是方针大体一致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进行革命而建立的政权，总体上由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而重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活力，转而引入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世界在应付1976年以后的世界经济不景气中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福利路线。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重视市场经济自由活力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经济作用被削弱，国（公）营企业转为民（私）营企业。工会团体也被削弱。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及普及使投资单位缩小，耐久消费品的款式增多、档次提高。促进了跨国经营和积极的竞争。这种趋势为向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奠定了经济基础。

不难想像，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趋势，对于强烈意识到消费水平差距，致力于搞活经济的东欧，苏联，中国等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1988年9月，在日本召开的保守党首脑会谈认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正在恢复，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化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胜利。这对于那种世界历史在20世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无疑是巨大的讽刺。

必须指出，20世纪末社会主义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国家所出现的经济危机，混乱及为此而采取的市场经济方针和意义，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想理论的基础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并使其动摇。资本主义

世界中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潮流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市场的作用。这也促使上述压力增大，动摇加剧，相反资本主义的基础得到加强。在这种状况下，日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企业的竞争力较强，经济情况也较好。在日本，信奉市场成了廉价的常识。年青人更加轻视马克思主义，人们时常狭隘地把社会主义只当作“负”的象征。对于苏联改革陷入困境，往往加以偏激的评论，如：民主化只有靠经济的全面市场化才能实现，而认为重视社会主义的路线是不合理，不正确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彻底贯彻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日本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建立起和谐稳定的经济秩序。在日本也是如此，很多工人不断受到压迫和剥削，甚至于由于过度劳累而致死。诸如泡沫经济带来的不公平，无保障的资产重新分配，不平等的地区差别，工资差别，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等等。从马克思以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批判，对现代资本主义也是基本适用的。而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市场经济的活跃，这种适用程度就更有增无减了（就此，请参照拙著《资本主义逆流》，东洋经济新报社，1990年版）。

可以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批判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其基础思想理论，对于资本主义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始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波及经济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复兴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若我们这个时代确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历史因而终止。那么21世纪还有什么可以期待吗？只要经济依照市场原理，围绕资本主义企业的利害而运作，那么下述问题则无法得到解决。如，第三世界国家的严重经济危机、饥馑、环境破坏，异化的雇佣劳动与消费的交替反复进行，使人们孤立，分化、精神被摧残，丧失自主。若将社会主义当作不合理的梦幻，把资本主义看作历史的终结，那不是蔑视人类的潜在创造力，视未来为虚无又是什么呢？

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是否真的过时了吗？在社会主义面对重重危机，受到历史的严峻考验之际，让我们共同寻找和考察社会主义现实可能性的论据，以令人信服的丰富而又确实可信的分析和深刻的思想来提出这些论据。为回答这一挑战性问题作准备，经拙文探讨，大体要抓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是在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运动潮流中产生的，是其思想和运动的发展和继续。一党专政的苏联型集权的社会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殊发展形态，但把苏联的进退维谷看作是社会主义整体的失败、或否定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这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现实上都是不正确的。勿宁说，马克思主义摆脱了苏联型集权社会主义教条的桎梏，使我们的思想大大解放，能够重新考察其广泛的现实可能性。如，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环境主义，女权扩大论等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显示了新的活力。通过对苏联集权体制的弊病的批判，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为基础，可能为实现符合人类本性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从这一观点出发，苏联型集权社会主义的挫折，反而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考察社会主义的民主及其选择多种社会形态可能性的机会。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原理相对立，以社会主义理念出发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作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战略安排，则依据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政治经济条件，有充分选择的余地。

联想起宇野的三段论方法，将资本主义经济论分为原理论，发展阶段论及现状分析三个研究范畴。这与社会主义论的构拟极为相似。如，关于经济各领域及产业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程度和方式，中央计划和管理及地方或企业的自主决定权的分权，企业工人的自主管理具体形态，土地和所有制关系及其利用形式的问题等等。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但其具体形态可能表现为多种形态的社会经济体制及组织形态。对于那种认为，科学社会主

义就应是苏联模式的，实现了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和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体制才是唯一正确模式

的看法实在不敢苟同。勿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正是对那种僵化错误的社会主义的矫正。

第三、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多种多样的组织形态进行战略选择时，也应包括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党和国家官僚的压制下的统治确实难以忍受。而通过民主的政治社会体制及群众自治组织的参与，综合计划经济的决策和实施还是有可能的。这里，要注意到米塞斯(Ludwig Eblenon Mises 1881—1973)、哈耶克和兰格(Oscar Richard Lange 1904—1965)关于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争论。哈耶克、米塞斯指出，公有制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缺乏合理的计算基础，而兰格就此作了反驳。这一争论，即便不涉及计划经济自身和其决策规则，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存在的基础理论问题。不依靠市场供需的价格机制，而靠计算制定价格，是否有经济合理性？这是围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而进行的，苏联和中国的改革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之一。

本书的第二部份第四章中，以这些问题为重点，再次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争论进行了讨论，并回顾了最近就此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另一方面，到1960年以前，苏联面对一系列的困难和压力，国内政治社会问题成堆，但是经济运作还能正常发挥作用，并且实现了高速增长。在教育、医疗、福利等社会主义有代表性的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应该承认的。当时的经济增长是在何种条件下，而相反后来未能继续增长，这一变化又是从何处开始的呢，有必要搞清这些问题。至少有一个很确定的因素，当时大多数劳动群众支持这个经济体系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而后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表明，失去民众支持的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脆弱。

第四、怎样评价日本的社会经济秩序。世界规模的，苏联、

东欧旧体制崩溃，其反作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声誉上升，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受到野蛮的攻击和批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优等生的日本也是如此，工人运动的主流极易转向协调劳资关系，与保守派合作的路线，社会主义的力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尽管如此，优等生的日本国内当真建立了理想的经济秩序了吗？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下，追求企业和资本利润的结果，人们之间造成了巨大的资产差别，收入差别。泡沫经济给人们带来不安。洛克希德事件、利库路特事件，证券、银行业的丑闻、导致一系列不公正，贪污的经济制度、职工的过度劳累致死，大多数劳动者的疲惫。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对女性就业的极为不利的经济环境。以各种形态在各地反复出现的环境破坏。在向21世纪过渡的经济模式中，不应发生的社会经济问题，不时在我们周围出现。日本的国际关系，国际贡献也是在私人企业、政界财界的特殊关心之下，依照其利益进行的。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对于广大劳动者及经济的弱者来说，对其福利、经济生活的安定常常是负方向的。

然而，正是因为这样，通过分析研究这些社会经济问题，在思想理论上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看到为广大劳动者和社会弱者摆脱压迫和窘境，求得自身解放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和运动是具有其现实基础，并将经久不息的。可以认为，通过充分贯彻日本宪法，扩充日本宪法的内容，如，实现主权在民，保障基本人权，放弃军备，交战权，争取健康的文化生活权利，保证集会结社，表现的自由，维护工人的团结权，实现普遍平等的选举，这就有可能以民主主义批判并克服资本主义的歧视和压迫。

战前日本所留下的社会主义思想及珍视这种思想的学术传统和成果通过与欧美左派新生力量的交流合作孕育着其再次发展的可能。东欧、苏联旧体制的崩溃，共产党的挫折和解体确实给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以严重的打击。这也是使社会主义的思想、理

论、运动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使其有获得新生的机会。整个世界也在向这个方向前进。相反，抛弃社会主义，在还有压迫存在的社会中，从现代来看无望实现公正的民主。

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佼佼者日本社会中，重新寻求社会主义，准备广泛确实的证据，对于我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艰难事业，也是负有时代责任，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真挚地追求社会主义，重新考察寻求其论据和可能，看来似乎很遥远。但这是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给予支持和合作，避免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效率的过高评价，努力开拓社会主义的健全民主和搞活经济的道路有重大意义。

本书大体上以这一观点为主，对社会主义进行时代的考察。除以下列举的部份论稿是加以修改收入本书者外，本书内容基本上是新著。

第一部份，社会主义本来的目的是什么，简述其历史潮流，并作一下回顾。

第二部份，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进行重新思考，同时对苏联型社会的压制问题状况，主要以1970年后的社会主义理论分类加整理。进而讨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争论，及最近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论。总之，第二部份，从基础理论的观点就有关问题作讨论。也是从根本上探讨最近东欧、苏联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意义等重要问题。但，请读者注意，讨论的重点并非要以有经济学专业学历和知识为前提。

第三部份、试就东欧、中国、苏联最近的体制改革发展状况及其意义与现实结合进行考察。关于东欧和中国，收入了访问印象记述。其中有关东欧的第二章部份，请参照《经济学者》1990年10月30日号，同时还转载了富森虔儿对轻视市场经济机制缺陷意义的批判。该杂志1991年2月12日再次登载了包括大津定美参加的三人讨论记录。本书的《新自由主义能救欧洲吗》一章，在中国《参考消息》报上被翻译发表（1991年、3月）。可以认为

1991年10月在波兰举行的波兰总选举的人民公决也具有同样的宗旨和危机。

总之，社会主义受到了是否能继续存在的根本性考验，在回答时代的挑战，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可能性的尝试之中，愿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希望和帮助。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

1. 社会主义多种形态的展现

社会主义一语，于1827年11月在伦敦合作社的机关报上被初次引用，在18世纪30年代中得到人们的承认。这并不是个旧词，在当时欧文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运动中，表现了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倾向，主要以合作社主义，一种改良主义为核心。

而后这一词语，在法国继承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思想中也得到认同，其核心比之一般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竞争协作原理，有着更广泛的内涵，包含着人们为从贫困压迫中求得解放的理想，及社会主义的运动和潮流。

除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所谓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主张复辟没落的家长制小农生活方式，回到和谐的经济生活中去，以西斯蒙第(J.C.Simonde de Sismondi, 1773—1842)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后又出现的蒲鲁东主张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维持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通过行政改革，谋求工人的利益。

在法国1830年7月革命到1848年2月革命的欧洲各国动乱时期，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被并列使用，该词的内容是指废除阶级和私有财产制度，实现以公有为基础的合作社。Communism（共同体，共同生活）译作共产主义是否合适，是否受到狭隘的生产主义观点的制约，也许现在正是重新审定和研究这一译词的好时机。总之，共产主义的目标大体上是与社会主义、特别是

空想的社会主义相吻合。但1840年时，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要实现极为彻底的公有制，并认为实现的方法应是革命的，战斗的，并认为应该是与社会主义相不同的，甚至是对抗性的。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未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加入的国际工人组织，1947年6月第一届大会的名称是共产主义同盟，其纲领为1848年1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执笔的《共产党宣言》。

该纲领以唯物史观总结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阶级斗争史，其结局是通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使现代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实现以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自我解放的客观基础和任务。并以此认识为根据，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要在理论上，学术上阐明这种认识和思想就必须在理论上系统地搞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搞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内容和机制）。

1850年以后，马克思在伦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批判，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派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自然主义和谐理论的局限性，创建了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历史特点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系统地克服了史密士、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欠和疑难。特别是阐明和揭示了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是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形成的秘密。可以说，这一剩余价值理论与唯物史观一起使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正确地说，如同恩格斯《从空想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3年）中所说的一样，这一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具有无法抹杀的作用和意义。即，作为彻底忠实于事实并在理论引导下，实现客观地认识社会的科学，它与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在领域和作用上大不相同，不可混为一谈。然而，不可否认，由于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揭示出雇佣劳动者团结起来获得自身解放的客观基础和可能，使社会主义由空想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发展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自从这一科学研究成果《资本论》问世以来，社会主义一语广义地被认为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

例如：1875年哥达大会上德意志社会民主劳动党成立，1890年更名为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在工会扩大，政治力量壮大过程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影响。在1889年二十国工会团体代表组成的第二国际（国际劳动者协会）中，马克思主义也占有主要地位。在此期间，从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在概念上非但不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看作是对抗的，勿宁说，其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立场。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并未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壮大和强烈影响而成为一言之堂。如费边的渐进改良运动也形成了强有力的势力。并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派内部给予反影响，因而出现了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派内部也就下述问题出现了不同的路线分歧，如：关于劳动党应取的民主主义组织方式，对社会革命的战略、战术，特别是议会民主主义所占地位问题，对即将发生的世界大战的态度问题等等。第二国际主流的考茨基中央派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在捍卫马克思学说的同时又主张未完成社会革命的准备。因而最终未能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导致了第二国际的解散。而坚持反战革命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卢森堡（R. Luxemburg, 1887—1919）等人则强调要执行群众路线实行总罢工。

列宁率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布尔什维克派，制定了将战争转为革命的起义策略，依靠前卫党这一先锋队的严格纪律，及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去实现这一策略。组织了工人、农民、士兵的评议会（苏维埃），并于1917年实现了俄国革命。而后，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改称为俄国共产党，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强化了权力向国家官僚集中的体制，并

以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领导中心自居，积极宣传主张前卫党的组织方针及革命战略，革命成功后的社会经济建设路线等，明确表示其主张和路线为唯一正确的楷模，向世界各国推行。例如，日本共产党创立于1922年，而后一度解散，并于1926年重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始终受到其影响。但是，日本的劳农派，战后的社会党左派等在思想和运动路线上反对来自于俄共的这种影响，批判苏联型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派不仅存在，而且保持了相当的活力。而在马克思主义派之外，也表现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可能性。欧州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与苏联不同的欧州共产主义，欧州社会主义，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活跃。总之，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失败之后，人们怀疑社会主义是否还会存在下去之际，也正是回到出发点，以广阔的视野考察社会主义目标的好时机。

2. 作为自然权的共产主义思想

回顾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所贯穿的思想，从这一词语来看，在19世纪20、30年代出现之前的漫长历史中，就不断流传，打动人们的心灵；不时地唤起人民大众的激烈反抗和斗争。这不外乎是发源于对囿于私利私欲的浅薄，愚蠢、人压迫人的不公正，对于被压迫人民的贫困，悲惨的哀叹和愤怒。在向往人与人的共同、和谐、自由的生活理想中，自发产生并反复出现的。例如，马克斯·比尔(Max Beer)的《英国社会主义史》中，文章的开头提示远在资本主义前的罗马时代的这一思潮。

如柏拉图在对话《国家篇》中，问到，什么是邪恶，那就是富和贫穷，前者滋生奢侈和懒惰，后者则产生卑劣和邪恶，而主张在要实现正义的国家中，代表理性，高尚道德的政治家身分，与代表精神和勇气的战士身分者要超脱利己的私欲，专心于国

务，就不能有家庭和私有财产，限于这两种身份者在消费生活方面实行共产主义。罗马时代维吉尔及贺拉斯的诗，塞尼加的斯多葛哲学中都对原始自然状态下没有私有财产，人民共同生活享有自然权，超脱于世俗红尘的理想状态大加赞美。而基督教在下层饥贫的民众之中能得到传播普及，就在于它把“贫苦是幸福”“私利私欲是堕落”作信条，至少其初期是以公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教团生活为理想的。在中世纪也有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威尔士的亚历山大，等基督教教父们，英国的经院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等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们的自然权，是没有私有财产及其所产生的贫富差别，人们共同享有一切，实现公正，自由平等生活的权力。这种理想的自然状态的思想与人类的腐败、堕落而形成的私有财产出现后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思想的传统作为中世纪末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对现实反复产生了影响。例如，以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威克里夫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农民起义的保尔（J. Ball, ?—1381），以马丁·路德（M. Luther, 1483—1546）及胡斯（J. Hus 1369—1415）的语录为指导，闵采尔等人领导了激进的农民和下层市民的起义。作为农民，下层民众摆脱现实压迫，谋求解放的基督教最初教旨而流传下来的共产主义传统，最近在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解放的神学被继承下来。在神佛面前，人们本来就是平等的，作为同胞而诞生，由于财产身份被歧视压迫是不公正的。企望来世得到救助，同时现世也要为实现公正的共同生活向社会抗争的思想不仅在欧洲，在世界各地各种宗教中显示出来，常常成为激烈的农民，下层民众起义，斗争的指导思想。

在日本，从15世纪后半叶的约一世纪中也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思想的痕迹。在近畿、北陆、东海地方相继出现了由净土真宗门徒掀起的一向起义，江户时代也有农民起义在各地不断发生。江户中期的思想家安藤昌益（1730—1762）对佛教和儒教进行了彻

底的批判。以唯物论的自然生息繁衍与对此进行耕耘的人们的生活活动为基础，号召废除歧视和压迫，主张共同所有，共同劳动，实现平等的共同生活的自然境界。可以说这是世界史上具有独创性的高水平的共产主义思想。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出现的这些共产主义思想大多是出自于人类的理想，即要实现人类自然状态下的无歧视无压迫的共同平等生活。这种观点反对私有财产与其产生的私利私欲，身份的统治、服从关系及其带给人类的堕落，腐败。因此，自然法、自然权是只有在那种自然状态下，平等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

若将此称之为前近代的自然法思想的话，近代以后的启蒙思想中的自然法思想，则以劳动所有权论反对封建秩序及绝对王权的统治。而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将私有财产作为自然权的重要要素，并对此表示出肯定的倾向。二者又有所不同，即，在反对将现代以来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秩序看作是自然形成的，反对这种自然主义时，将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实现自然人权的共同社会，看作继承了近代以前的自然法，自然权思想的话，近现代以来的自然法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流派。

近代以前的自然法思想，设想消除人身依附的身份关系及私有财产的社会。大概这是来自于有史以来的所谓原始共产主义存在的传说及周围未开化社会的状况，以及出自于批判现存社会的腐败及悲惨的根源之动机。这似乎是很古老的思想，但这并非是视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权利为天经地义的启蒙思想所能取代的。这里倒是应该反问，人类本来的基本人权是什么？调整自然与人，人与人的关系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在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人与自然的异化及破坏，设想未来之际，我们也常常返回到这个原点上。虽然自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形成历史社会以来，纯粹的自然状态的确不可能存在了。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古远的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对于现实如何，而是就现存社会的颓废、压迫、非自然的畸形状态的批判，必将对未来寄予希望

的人们的基本权力，社会生活原则的理想方式产生影响。

近代以前的自然法思想，正是由于要回答这一问题的需要，而反复被提出来的。这一思想往往表现为宗教的启示及教义，或表现为哲学、社会思想。显然，它并没有合理的实现方式及媒介，而往往是对现世的失望和对遥远过去的崇拜。但是，我想在追溯社会主义的源流之际，不要忘记其重要意义。

3. 乌托邦的社会主义

在近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导致的灾难及破坏而产生的恐惧和愤怒，而另一方面，其主张与其说是宗教、救世的，不如说是基于合理的社会经济生活构想。然而，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并未能对资本的运动机制进行科学的剖析，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而是在思想上反对商品经济的产业社会所伴随的悲惨和破坏，并代之以描绘出一幅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图画。其现实表现为，很多场合，都是在期待说服上层社会觉醒。可以认为这即是其主张的空想成分。

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莫尔（T. More, 1475—1535）。他出身于大僧正的家庭里，曾任大法官，属于上层社会出身的显赫政治家。他所著的《乌托邦》（1516年）一书中，描绘了现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原型。书的第一部份深刻地批判了英国的社会现状。指出工人的命运比驮负重物的家畜更悲惨，货币和骄傲是一切罪恶之源。圈地使本来温顺的羊群开始啃食农民和土地。第二部分中，既是国王又是哲学家的乌托王征服了阿巴拉库斯（音译）半岛，通过教育和灌输共产主义，建立了乌托邦。在书中以40人为一个家庭，每个家庭有两名奴隶，由6000个农场构成一个州，共有五十四州，由选举出来的州评议会和联邦评议会来处理公共事务。农业成为其社会基础，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城市人口与农民轮换。财产公有，劳动时间每天六小时制。一夫一妻

制。人民生活简朴，不知奢华，奴隶来自于其他国家被处以刑罚的犯人，或为外国的贫穷工人，这些人可以随时离返。

经过近500年之后，在现代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来看，莫尔的批判依然尖锐深刻。并不是由于养羊，日本的地价仍在高涨，人们被驱赶被吞噬。莫尔的城市人口控制，州评议会分权制，六小时劳动日制等，在今天来看也不失其光彩。而且其构想的附属问答部份，对于今天现代社会也很有意义。

例如，莫尔在那里提问，共产主义取消了对个人的物资刺激，这样产业的发展将会失去动力，人们忘记了工作，会导致贫困吧？共产主义者拉非埃尔回答，那是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所得出的推断。乌托邦的居民已经完全适应了共产主义生活的体制。当苏联的现代化改革运动的方向转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化，并得到肯定时，删除那些细节，很多场合，就是莫尔的提问再现。从这一点来看，人类似乎并未取得太大的进步。

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起促进作用，形成现代国家的绝对王权，仍以神授王权说统治着国民，集中了操纵市民生命财产的权力。这种权力若被滥用，则为天下大忌。莫尔由于拒绝承认亨利八世的离婚及其王权至上，而令其大为不悦，招致杀身之祸。

后来，随着资产阶级市民势力的壮大，谋求废除绝对王权的市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英国的清教徒革命(1649年)和光荣革命(1688年)即为其先驱。洛克(J.Locke,1632—1704)为这种运动提出了理论根据。他的《市民社会论》(1690年)对后来的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法国大革命(1789—1804年)也予以巨大影响。

洛克主张，神平等地造人，人生来就有生命、自由、财产等不可侵犯的自然权。政府是为了保障其基本权力而由人民同意而组成的(国家契约说)，变更或废除背离这一原则的政府的革命权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在这里，洛克的“财产权说”来自于，劳动所得可以成为个人所有的劳动所有权论。于是，自然法思想

就可以用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念的古典形式来表现了。然而，劳动所有权论能否将土地私有权、利润、利息、遗产继承等不劳所得都合理化呢。法国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美国的独立宣言，日本的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保护国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三者财产权的问题上与洛克相去甚远。

总之，废除绝对王权政治之下的身份制的市民革命，既以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变革为课题，保护人类普遍的自由，平等等基本权利，同时也充分保障市场中商品交易的自由、平等及财产权，又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解放的理想，其理念的内容远远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这种思想在资本主义时代里，摆脱了过去共同体的诸多限制，由形式上的个人自由平等到市场经济的扩大，并随着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基础，自然成为一种社会思想倾向。

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也是摧毁王权政治旧体制的市民革命，从国民议会形成的君主立宪制经过稳健共和派的基伦特派，罗伯斯比尔率领的激进雅各宾派，在国民公会中发展壮大。国王路易十六世被处刑，进入独裁体制时期。始由中下层农民发起的革命转变为彻底的社会革命。于是，形势发展迅速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市民秩序，把土地分给农民，管制资本家，禁止投机牟取暴利，以统制来实现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平等。

由于罗伯斯比尔被弹劾处以刑罚。稳健的共和派东山再起，这场革命终于夭折了。但是，市民革命的理想目标，远远超出了市场上的自由平等，保障财产的局限，展现了人们追求社会生活中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侧面。可以认为雅各宾派的尝试就是苏联型社会的集权体制挫折的予演和缩影。其中显然包含着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

法国革命中激起，迸发出的向往人类解放的各种思想、尝试，都因为拿破仑帝制及稍晚些时候的1814年路易王朝复辟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宣告结束。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的圣西

门，傅立叶继承了启蒙思想及由斯多葛哲学而来的市民革命理想，又一次明确提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主张，寻求解决产业社会的生产过剩而引起的混乱及工人的贫困的方法来。

圣西门出生于查理大帝嫡系伯爵的家庭里，曾加入过义勇军，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大革命时支持雅各宾党。而后致力于将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引用于社会学领域。在他著述的《产业者的政治教理问答》（1823~1824年），《新基督教》（1825年）中有如下描述。即，人类社会这一有机构成体的进步经过原始偶像崇拜奴隶制的多神教时代，封建身份制的基督教时代，在这之后，从15世纪开始进入危机时代，科学的世界观，学者，实业家开始登场。法兰西革命就是要推动历史进步，但由于陷于无组织状态而挫折。

代之而来的是代表科学的学者与实业家合作组成的“人人皆兄弟”的公有社会。在这里排除寄生虫，一切人都有义务参加劳动，同时保证人们享有平等的机会，按能力进行分配。农业、工业生产由国家计划制定，随着进一步的发展，民族的墙壁，国境将被废除、将实现普遍的和平。

圣西门的这一设想很有感召力，显示了在产业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18世纪30年代初，B·P阿法丹等为代表的圣西门主义者形成了一种宗教运动。社会学的开创者孔德（1798~1857年）也曾是圣西门的弟子。但在圣西门那里，没有明确搞清实现新的公有社会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是谁。忽视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对立，而将二者都笼统地作为产业者对待。实际上承认了产业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寄希望于资本家突发奇想来实现产业体系的合作社。

这种想法如同现代的情形，资本家，经营者面向理想的经济社会，重视企业文化的社会作用，而市民运动要求企业为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人们的健康作出积极贡献。时代不同，但二者不谋而合，不可轻视其意义。但产业、企业要组成新的合作社就是

突发奇想，况且要资本家、经营者来组织建立合作社就更是突发奇想了。

傅立叶鲜明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法国最初的社会主义特征。他出身在富裕商人的家庭里，边从商，边自学、成才。在法国革命中失去了财产，并对这种社会的结局表示失望。他清晰地描绘了《产业合作社新世界》(1829年)的未来社会蓝图。傅立叶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伊甸园时代，未开化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等四个阶段。最后的文明时代，由过剩本身产生出贫困。而后必定会产生和谐的社会秩序。在那里，社会每年所得的分配为，资本占4/12、劳动占5/12、才能占3/12。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劳动的分配比将逐渐增大。

合作社的基本单位是1600—1700人构成，居住的建筑称为法伦斯泰尔。在很像法国的王宫似的殿堂般的住宅中过公有生活。在那里机械化的农业与工业相结合，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融合在一起。在公有生活中人们本身的欲望都投入创造性的活动。强大的工人军队被组织起来，有地方、国家、世界性的不同部署。傅立叶构想之详尽，可以从法伦斯泰尔的蓝图里，其成员的每天生活中看到。

六月每天的生活时间表

三时三十分	起床、准备
四时	在厩舍组作业
五时	在园林组作业
七时	早餐
七时三十分	参加割草组的作业
九时三十分	在蔬菜栽培组作业
十一时	在牛舍组作业
一时	午餐
二时	在林业组作业
四时	在制造业组作业

六时	在灌溉组作业
八时	去思想情感交流中心
八时三十分	晚餐
九时	联欢
十时	就寝

（田中正人译《产业合作社新世界》，五岛茂、坂本庆一编《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中央公论社，1980年，501~502页）

傅立叶的构想中包括工农，城乡的结合，克服由于分工而引起的片面发展，可以贯彻民主主义原则的合作社规模，分权自立的公共生活及其共同住宅等等。而后的社会主义理想及其在各地建立新村的尝试，也颇具魅力，发人深省。从上述作息时间表看，每天工作十四个半小时，睡眠时间五个半小时，并不轻松。工作内容的设想是以农业方面的作业为主，通过巧妙调整工作内容，来避免疲劳。这一点反映了产业革命后，当时的一般劳动条件之艰苦。相比之下，在现代日本由于过度长时间劳动，疲劳致死，从这样的劳动条件来看，傅立叶的调整作业内容的保健法依然有意义。而托马斯·莫尔提倡的六小时工作日制作为有闲暇的生活更具魅力。

傅立叶确信自己的详尽构想为最完美的体系，在里昂他严格按自己设计的作息时间生活，被称之为“巴黎王宫之狂人”，一直到死每天都怀揣着法伦斯泰尔的蓝图，等待理解其体系的奇特出资人来拜访。相反，他反对革命斗争与阶级斗争，这一点也显示了他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特征。

西斯蒙第出生于瑞典的富裕僧侣家庭，成为银行家。在法国革命中与父亲一起入狱。后来著述了《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等著作。与圣西门、傅立叶同为法语语系中有代表性的初期社会主义者之一。西斯蒙第认为资本积累通过机器排斥工人，以生产集中化掠夺农民使消费萎缩，同时又不顾消费的需求而扩大生产。其结果产生了超过消费的生产过剩。贫穷与灾难也因此而

生。他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生产过剩不可避免，首次提出了消费过剩学说。对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尖锐矛盾进行了尝试。

同时，他提倡的解决方法是实现生产及所得的理想的人口体系，恢复家长制的农耕制度。这是由于他参加了史达尔夫人的沙龙，与赞美旧社会怀古的浪漫主义者交流，并受到其影响而形成的。这也显示了西斯蒙第的浪漫社会主义之特征与寄希望于和谐的未来社会所构想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相比大相径庭。而后来，列宁不得不与之竞争并批判的俄国人民主义者正是西斯蒙第浪漫派社会主义现实翻版。在现代这种思潮也反复以环境主义者的浪漫狂想而出现。

4. 欧文与费边主义

欧文可以称之为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他描绘了合作社社会的共同理想，并为其实现而努力，他也是经营家、政治家，他将其构想上书于维多利亚女王。虽然他的构想数遭挫折，他仍躬身实践，成为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的首创者。超越了单纯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继承了英国社会思想及运动的实践传统。

欧文出生于1771年，威尔士的马具工匠家庭里，只在家乡的小学读过书，10岁时离开家乡在斯塔福等地的绸缎庄里作学徒，而后在产业革命时期移居曼彻斯特，18岁时成为小资本家，1800年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音译）的纺织工厂里以合作经营者的身份，实施被称之为“统制”的经营方针，并总结其经验写成“关于社会的新见解”一书公开发行。书中提出要重视“活的机器”，慎重对待工人，他认为，由环境形成性格，改善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性格。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办的工厂和生活环境得以完备。在当时一般为14—16小时工作日的情况下，他的企业做到了10小时

工作制，还配备了托儿所、学院、养老设施等。由于这样重视工人，酗酒、打闹等现象被克服，工作也努力起来，利润和收益也增加了。他号召政治家和经营者推广这些作法。

欧文于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新和谐村，投资3万英镑购买土地，移民900人，创建合作社社会，试图消灭私有财产与利己之心，经三年后失败。1824年组织发起了伦敦合作社运动，1834年结成了缩短劳动时间全国劳动联合，1837年后在高涨的基督教徒活动中给予道德派以重大影响，他亲身参加并领导了这些运动。例如，在合作社运动中，1832年他在伦敦开设了全国劳动公平交换所，在当地进行试点，实施格雷（J.Gray 1798—1850）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劳动货币论，尝试用劳动时间券交换各种劳动生产物品。

欧文及欧文主义者强烈希望通过改善人的性格改变社会中的不公正及弊病，实现为贫困的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和谐社会（共产社会）。而又始终反对诉诸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罢工等方式，就是在基督教旨运动高潮之中也始终保持了这一态度。这也可以说成是欧文主义的空想之局限的表现。在现代，合作社运动及工会运动的组建和发展过程中，围绕工会、合作社的任务与激进战略相对立，欧文主义的影响也常常表现出来，发挥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更有趣的是，最近在老人互助互护的地方合作活动中，出现了实施劳动时间券制度的想法。

19世纪的基督教运动要求废除1831年人民宪章草案中的男子普选权，议员候选人的财产限制条款，实现英国议会的民主化。该运动发展高潮中受到欧文思想的影响，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发展成广泛的有组织的工人政治运动，工会运动。这次运动包含了工人群众以社会主义及劳动为基础，重组英国社会的革命要求。由此，社会主义作为西欧社会的人民大众的民主传统而扎根。其激进方面由马克思派所继承，而较重视渐进改革的思想在英国也得到发展。如，约翰·穆勒（J.S.Mill, 1806—1873）的

《经济学原理》(1848年)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前的最标准教科书。该书中生产体系以自然秩序构成,而分配法则为“人为的制度上的问题”,对其思考则略有折衷;以对劳动者有利的分配关系的实现为目标,令人感到,与社会主义有共同之处。

1884年设立的费边协会是据罗马将军费边在与汉尼拔作战中以忍耐战术取胜的典故而起名。该协会重视学习,反对官僚集权,根据浸透的原理,通过渐进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坚持其活动,将欧文及基督主义的传统作为重建社会主义的来源,与牧歌式的非政治的欧文主义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该协会以通过日常的政治运动和学习活动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方针为特征。剧作家并兼评论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社会学者韦伯夫妇(Sidney Webb, 1859—1947, Beatrice Webb, 1858—1943)都支持了该协会的活动。

理论上重视约翰·穆勒所继承的李嘉图差额地租论,反对不劳而获的地租,以废除土地私有制为重要目标是其特征之一。进一步将不劳而获的利润、利息、产业资本向社会管理转移,将实现以劳动为基础的自由公正社会为目标。这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产生影响,并被其接受所吸收。继承约翰·穆勒及其合作者泰勒夫人(Harriet Taylor)的思想和学说,开始着手于现代女权主义所提出的妇女解放问题。这也是应注意之处。

费边协会的思想与活动成为1900年成立的英国劳动党的支柱,如,S.维伯从19世纪20年代成为劳动党的阁僚。社会主义以乌托邦的设想说服政治家或经营者,或者以激进的革命政党斗争或群众运动来实现其目标,而费边主义利用既存的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机构,通过日常活动实现社会不断改良来达到社会主义。这样,可以说对于阶级斗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路线,费边主义开辟了适应通过民主主义的日常政治活动以实现社会改良的另一条路线。

萧伯纳所编辑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1889年)中可以清晰看到,其最初的出发点明确提出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理想,以英国劳动党为首,西欧各国所建立的劳动党、社会党的基本思想都继承了这一方向。

正如马克思的革命右派所批判的一样,费边主义仅以日常的改变为重点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右蜕变为维护现体制的补充要素之危险。认为其危险性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种剖析并不充分。如,不劳而获的地租、利润、利息与剩余劳动在理论上的关系如何,还没有系统的阐明。因而产生了通过租税来进行所得再分配或实施福利保障政策可以充分实现社会公正的思想倾向。

然而,马克思派在理论上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致力于克服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病。现时正是马克思主义重新评价和研究费边社会主义,并吸收其以民主的变革实现社会的公正和自由等战略思想的时机。至少不应忽视马克思思想理论与费边变革路线的相容性。而将其看作只能与列宁主义的激进革命党战略相继承而不变的话,则过于狭隘了。

5.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迄今为此所看到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丰厚源泉与种种尝试的洪流中显现出来,不仅继承了其积极的方面,也克服了其弱点。20世纪以来吸引了千万人的心,是使本世纪成为革命世纪的有力指导思想。

以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思想,其理论根据从三个侧面被反复提示出来。其一是回顾总结人类历史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生活所应有的方式。并在其中探索实现合作与和谐的未来社会的可能性。回顾历史常常是与探索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及改革方向密切相关的。以远古的自然状态为理想的自古以来的共产主义思

想也好，以探讨产业时代无规律的经济危机和过剩中的贫困难为特征的圣西门、傅立叶的社会主义也好，都是对人类历史总结的一种尝试，这也是论据之一。

第二是批判地考察现存社会的压迫、歧视，贫困，将消除这些现象作为道义上的课题提出来。第三是在以上的基础上构想未来社会，为拯救和解放劳动人民，时而有人设计出详尽的乌托邦来。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在艰苦的科学研究中取得突出的成果为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提供了论据，并由此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潮流。其内容有以下四个相关联的特征。

即，第一，总结了人类历史，在超越了学术的更广泛的范围里，依据正确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研究，向人们展现了崭新的哲学的世界观，宏大而富有说服力的唯物史观。正如而后人们所看到的，在社会主义处于危机的今天，人们深刻地反思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机械片面的理解和套用的错误，马克思派则不断努力纠正那些错误，试图重新创造基础理论。虽然如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优势之一就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发展史及这一唯物史观中的对人类历史高度概括的深刻启示和强大的说服力。

第二，通过以唯物史观为线索的经济学研究，系统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原理的历史特点及内在矛盾，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应克服的对象及变革的可能性。《资本论》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及新经济学的狭隘的自然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局限，确立了作为历史科学的经济学原理。提出了科学地理解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矛盾的理论标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批判考察资本主义的标准的性质和意义，在当代也并未消失。这向人们显示，超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的希望依然存在，并且反复出现。

虽然如此，我们在下一章可以看到，在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

的关系上，资本论理论构成中的疑问，及其正确的解释，在今天更具有重大意义。无论是对资本论的研究，还是依据资本论进行研究，离开科学的批判研究，将理论当作教条，则抹杀了马克思将资本论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本来意义。

第三，依据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武器，基本上寄希望于无产阶级为核心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并不抱有对统治者，富有的资本家进行仁慈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救济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劳动党及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的亲身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翻身解放而奋斗，以其广泛的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论证，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第四，马克思的著作与前人所描绘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未来的详尽蓝图有所不同。马克思只提示了未来社会的若干要点，并未制定未来社会的详细规划。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原理是在考察了资本主义之后，从其反面得出来的。而未来社会的细节及具体情况，应该由未来社会的具体条件与未来的人们选择而决定。可想而知，马克思认为，予先确定未来社会的细节是不符合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

然而这一点也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弱点，当成引起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混乱与对立的原因之一。相反，这一点给社会主义危机中努力摆脱困境，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的多样性的人们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有着相互渗透的关系；后来又出现了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之后又有列宁与考茨基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理论 and 战略的争论。通过这些斗争，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否认了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列宁批驳了考茨基，阐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而后的俄国革命成功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

展被看作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继续。

而以考茨基为理论指导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及以该党为中心的第二国际各国劳动党，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同时，发展工会组织，并以此为基础，扩大其在议会中的力量，壮大政治经济改革的力量。这实质上可以看作按费边主义的渐进议会民主主义的路线去实现社会主义；但又与费边主义相异，依照马克思主义有明确的革命对象和特殊性质，而尽管充分实现社会化发展之后，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变革将成为其目标，其日常活动及其成果与费边主义并没有什么差别。

伯恩斯坦主张，在埃尔富特纲领(1891年)中，对于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其后半部，即无产阶级当前的要求，及为此所进行的民主改良；而在前半部分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则为无意义的。

这种解释过于草率片面，而可以认为费边主义渐进的民主改革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而推进的。显然马克思主义在费边协会与英国劳动党中有着影响，即马克思主义多方面起作用。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武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际，既要反对(第二国际的右派)考茨基中央派将帝国主义战争看作卫国战争与帝国主义政府同流合污，也不必象列宁那样局限于有严格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即从上而下的指令)的前卫党为领导的激进革命斗争路线。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意志革命形势下，卢森堡等第二国际左派重视民主的人民起义，总罢工的路线仍有其意义和可能性。

从这一观点出发，卢森堡所批判的列宁主义路线，即，在前卫党领导下，轻视并害怕群众的民主参与的路线。这一意见在今天苏联的压制体制危机之际，应重新予以评价。卢森堡的祖国波兰及东欧国家198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从历史的进展看有其偶然性。但，这正证明了卢森堡所梦寐以求的人民大众的民主起义的现实可能性。

而格兰西等人所创立的意大利共产党及欧州共产主义的西欧各国马克思派的运动，针对列宁的以党为先锋队来开展革命运动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令性领导，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化弊病；重视西欧的民主传统及对其发生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形成及渐进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对灵活运用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进行了尝试。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复兴中，新生的马克思派对列宁、斯大林持批评态度，并表现出进行民主的工人运动，市民运动的倾向。而相反的是，第三世界诸国军政府的压制政治体制之下，进行政治改革，解放斗争，仍然可能采取列宁路线，重视党的先锋作用和意义。虽然不能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但全世界的马克思派基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谅解。

正因为如此，可以认为，如今正是重新深入研究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重新探讨可供选择的多种多样的路线及其与丰富多彩的未来社会历史条件之关系的好时机。同时，社会主义处于危机之时也是重新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好时机。

二 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二章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被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批判现代社会的不合理，压迫，描绘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构想。马克思批判了这些空想，依据唯物史观对人类史进行了科学总结，系统地阐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以科学的研究论证了社会主义及其实现的武器。通过这些研究，马克思以经济学与唯物史观为基础，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这一点来看，对比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被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恰如其分的。

因此，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应该在以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相关联为出发点，这一基础上进行学习研究。《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课题，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及其特殊的历史性内在矛盾，揭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主体。然而，这毕竟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变革可能性的客观认识。接下来即为，阶级社会以资本主义终结，以自由个人集合的合作社会将会出现，这种思想，主张也将由唯物史观及实践的唯物论所证明和补充。

马克思论论证社会主义有其独特的功劳，同时唯物史观与马

克思经济学又是相互关联的。正如人们譬喻的一样，将黑格尔倒置的唯心辩证法颠倒过来，就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将唯物辩证论用于人类历史，则得出唯物史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则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展开。这样按传统的解释，既把辩证唯物论与辩证法形而上学地看作绝对的，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作属于党派的，有阶级性的，常常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这就难免会将阐明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同思想混同起来，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科学性。

当然，超越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经济看作天经地义的狭隘局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系统地阐明资本主义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活动为课题，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背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得出的成果。该课题的设定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原理及其历史形态和内容时，始终起到深化其理论意义的作用。然而其揭示的理论意义、历史内涵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启示，在经济学研究中必须使理论与事实统一于客观认识体系之中，如果有了遗漏或错误也必须同样地以理论和事实予以修正和补充。

与此同时，对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研究也将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而深化和充实。但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思想 and 理论形成的历史及后来的发展看，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课题尚未被深刻发掘。例如，唯物史观在1844年到1845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同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本形成，在《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版的序言中简洁地总结之后，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成形后就未再进行深入探讨。就这一点，马克思不会认为自己的所有理论和结论都是不可变更和修订的。尽管如此，这也是在后来，马克思正统派将唯物史观教条化，形而上学地僵化的原因之一。

在社会主义面临危机或新生的严峻时期，重温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基础理论的唯物史观、经济学理论大有必要。在

学习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际，特别要注意马克思怎样继承前人所提出的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论，及就《资本论》留下的理论疑难问题，后人所作的研究和概括。从而得出依据唯物史观应对社会主义补充些什么。下面就这些问题，回顾马克思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并进行探讨。

1. 唯物史观的形成及其公式

显然唯物史观是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正式研究，进行之前形成的。可以推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依据唯物史理论而建立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以经济学研究为重要引导，并得到经济学论证的。这一点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也可以得到认证。

回顾马克思所在的时代，1815年是德意志的黑格尔近代哲学发展的顶点，其绝对精神的辩证法包容了自然和社会的巨大体系。而于此相对，黑格尔的弟子费尔巴哈通过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考察批判，指出基督教的神的本质是将人们普通的思念、心情、爱等外化、对象化、理想化的结果，即人本主义的唯物论。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学习了黑格尔哲学之后，又深入研究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受其影响又开始深入进一步研究。然而马克思很快就指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将人仅仅局限于自然主义的缺欠，并开始注意到人们在现实特定的历史社会关系下的本质活动，特别是由于劳动及劳动成果的被异化，被置于阶级关系之中。

即，黑格尔以法律的哲学来考察人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通过批判其法律的哲学，发现法律的哲学关系，国家的各种形态，其自身都不会是动态的，也不能以人类的精神发展来理解，而应看作根置于被黑格尔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总体之中的。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剖析了包括着劳动这一特殊异化关系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全力

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之前，与黑格尔及费尔巴哈相对应，总结了自己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本质的研究成果，即唯物史观的思想，并肯定了到资本主义为止的人类历史的基本意义，揭示了历史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走向社会主义的未来。

而这一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来说又是后来继续进行研究时，起到“略纲及一般性结论”作用的。就此在后来的《经济学批判》和《序言》中，做了如下概括，为方便起见，要约为三部份。

① 人类在社会生活生产关系中，形成了与当时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以此为基础，在此之上形成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基础相适应。……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其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

② 社会的物质力量在达到某种发展阶段时，与迄今为止其所存在的种种生产关系或为其法律表现的所有（制）关系产生了矛盾。这些关系由其发展形态转变成发展的桎梏。此时革命的时期即开始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或迟或早将发生变革。在考察这种变革时，对基于经济的生产条件，物质的、自然科学可以确认的变革与人们意识到这种冲突，并与之决战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及哲学等，简言之，对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表现要始终区分开来。

③ 大体说来，从经济的社会体制的进步阶段，可举出亚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中敌对的，即做为个人相敌对的意义上的最后的敌对形态。而资本主义社会内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也在造成解放这种敌对关系的物质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宣告了人类社会前史的结束。（K、马克思《经济学批判》）

对如此宏伟的人类史的总结，依据当时的历史学，努力去把

握和预见人类史的基本模式。与此同时，这一历史观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学而得出来的，并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指针，即，依据历史学的全部成果，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出发、观察分析人类的全部历史。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是将人们生活的物质再生产以全面的商品经济来维持并发展的。同时，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生活作为生产关系与其他方面相异，有着独自的结构，独特的发展。结果，人们的意识、社会的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基本上与经济基础相对应并被经济的发展所制约。

这种经济基础同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上层建筑的鲜明的分离与制约被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并未如此分明。勿宁说，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基础与上层建筑或多或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且时代越久远二者就越未分化成为一体吧。然而，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学考察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也将对分析资本主义有所启发的话，那么其政治的及其宗教的生活过程与物质经济生活的特殊方式是如何对应，与其生产关系的维持又是怎样相关联的，这是一定要被问及的问题吧。唯物史观正包含着这样的问题。

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的深化与展开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既不是自然的秩序也不是终极的社会体制，而是以往人类历史的终结与另一时代的开端、人类将从此获得解脱，敌对的阶级社会应该结束，这是其特殊的历史社会。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宣告人类社会前史的结束”并“以此为自由世界的基点，构筑人类史的全部缩影”《唯物史与现代》的历史观。这是批判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的剖析，而又是只从经济学研究所得不到的关于人类史思想的总结及展望。

大体上从这一观点看来，迄今为止的对唯物史观原理的批驳，并未能否定唯物史观。如最近有人依据经济人类学成果对唯

物史观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批判，提出了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如在未开化社会中的适用性问题。但对马克思的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进而证明唯物史观的方法和意义却总是被忽视了。

从现代历史学的水平来看，“从经济发展而引起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变动，促进历史进步的阶段看，亚州式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确反映了当时历史学发展的局限，难以避免以西欧为中心的单线的，简单化的历史。史前时代中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形形色色各具特色的共同体社会的种种发展。（饭田股《现代社会主义再考》，社会评论社，1978年第六章）均未被涉及。补充这种不足，充分证明唯物史观是对的。而丰富多彩的社会发展史进入现代即开始了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编年史。从这里展望社会主义之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任务和主要纲领无疑是应该占有重大地位的。

应注意唯物史观简述的以下之点，马克思将辩证法的主体，以生产力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及被倒置过来之后的费尔巴哈的自然人。形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与物质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对应，而形成生产力的发展形态与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的所有关系共同转变为桎梏，进入革命时期。这种历史观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反对家长制的农耕社会及将原始社会理想化的浪漫社会主义潮流，另一方面又与以绝对精神、人类精神发展来看历史的立场相对立，努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来把握其发展。

的确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若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在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关系中运动的，显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孕育、成长、成熟的过程中与物质的生产力发展相对应形成历史的推移。然而不要忽略、生产力在资本主义下的特殊生产关系之中，其发展方向、速度及质的内容都受到很大干扰和影响。而进一步是否可以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动力而实现的，而资本主义开发出来的生产力将全面的被社

会主义所继承下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大概在这一点上应将唯物史观的简述作为假设的历史观，留有补正与充实的余地。至少不应将生产力看成如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样，当成至高无上的历史动因，即应考虑到生产力要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和渗透并影响其发展方向和质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着紧密的相互制约的关系。

特别是今天的生态危机及保护环境成为重大问题时，至少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后就有了可以广泛选择的可能性。对于资本主义来讲，社会主义本来的优越性之一就是靠人道主义的技术选择，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巨大的可能。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包括上述之点，对唯物史观的拾遗补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亲自将唯物史观用于实践，与恩格斯共同执笔了《共产党宣言》，就是说根据唯物史观进而展开了社会主义论。

2. 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论

《共产党宣言》(1848年)由以下四章构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文献”及“各在野党对共产主义者的立场”。著者在前两章中积极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其要点简述如下。

即，“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是以复杂的身分和阶层的区分而展开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斗争日益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的斗争。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不外乎是由于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成为桎梏，而被粉碎的结果。

然而现代的生产力终于与如同被魔法呼唤出来的魔鬼一样，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裂，并日益威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存

在，出现了商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商业危机，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竞争、工业与机器的发展和使用、与无产阶级生活的不安定，贫困化一起，使他们日益团结在一起。于是，工人们结成同盟与资产阶级斗争，为维持工资成立了工会，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内容虽不尽一致，但形式上，都是矛头指向各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样资产阶级与大工业的发展一起，“为其自身生产了掘墓人，其没落与无产阶级的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1]

接下来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里，阐述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该章的最后就无产阶级革命的课题作了如下总结。即，“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争取实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利用其政治的统治，逐步剥夺资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中，即，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手中，尽可能使生产力的数量迅速增大。”这就需要对所有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加以专制的干涉。其方式因国家而不同，一般适用的有，①没收土地所有权，②征高累进率税金，③废除继承权，④没收逃亡者，反叛者的财产，⑤国家集中信用金融权，⑥由国家集中管理运输工具，⑦增加国有工厂，并共同计划实现土地的可耕地化及改良耕地。⑧强制进行平等的劳动，特别是组成农业产业军，⑨农业与工业的结合经营，消除城乡对立，⑩实现对儿童的公共无偿教育，教育与物质生活相结合等等。

随着工人革命的进一步进展，阶级差别消失，公共的权力失去政治性质，通过世界市场的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差别与对立逐步消失。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各国人民之间的敌对立场也不复存在。取代阶级社会的合作社会中，“个人自由的发展是所有的人们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样《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作了如下陈述，生产力的发展使封建的生产关系解体。由此而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危机表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发生。第二章中也提出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将尽可能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显然，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发生变化的人类史的基本线索即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孕育成长及衰落的必然性，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进而革命后的社会变革也依据生产力的发展而实现。可称之为依据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和社会主义论的成功展开。

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与唯物史观的简述相对比，突出了阶级斗争史的观点。例如：封建社会的解体，世界市场与大工业形成中资产阶级的作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废除资本主义，实现合作社会的无产阶级之作用。在这里从大的方面来看，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都起着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使旧的生产关系解体、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两个阶级的作用和地位用唯物史观来看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向两大阶级分化，也代表了大工业与生产力发展相伴随的生产关系进展。

包括资本论在内，1850年以后马克思的深入思考和研究进一步充实了社会主义论，写下了《资本论》的大量手稿。在第一版1867年出版以后，马克思在1872年德文版的《资本论》的序文中指出，1848年与恩格斯共同在《宣言》中阐述的各原则大体上仍然适用，但如同在前面所看到的一样，应注意到第二章结尾所提到的革命策略的一般原则与历史情况怎样灵活运用的问题，同时对照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指出巴黎公社的实践证明，无产阶级不能利用夺取的现成的国家机器为新政权服务。

关于最后一点，作了很大修正。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如下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后，无产阶级“将所有的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而国家本身作为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能继续存在，国家自身必须成为公社或变革的对象。这一论断在1875年写下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如下

论断，“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向后者的革命转化期，与此相应在政治上也有一个过渡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与此论断相关，《共产党宣言》中：“公共权力将失去政治的性质。恩格斯就此有“国家的消灭”的论述。在现代这也反复引起过争论。

上面的补充，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实践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如果说有什么间接关联的话，那就是在《资本论》理论大厦的基础上，阐明了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理论，较详细地论述了相应过渡期的政治形态。

即，在《宣言》中就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步之后的各方针政策列为强制性的平等劳动等10项进行了论述。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由资本主义脱胎而出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经济生活特点，作了下述补充。即，该阶段“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这里很显然、只要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调节这种交换的就是同一原则起作用。”“因此，这里的平等权利，仍然是，原则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即“这一平等的权力，对于不平等的劳动来讲就是不平等的权力。”（马恩全集19卷、19页）。

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总产品中要事先扣除的共同基金可分为下述几项，①作为被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充部分，②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③为事故及天灾的储备基金，进

一步又指出：①非直接生产的一般管理费（这部分与当今社会相比变得越来越小），②学校、卫生等共同消费部分（这部分将变得越来越大）。

因而作为消费资料的个人分配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工资为媒介，工人所得到的必要生活资料及相应的必要劳动部分相重合。这一部分，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由于包括地主、管理者的广义的资产阶级消费的消失而可能增加。而自主决定的储蓄基金增大的话，消费基金则会缩小。进而共同消费基金在医疗、住宅、城市交通，图书馆，休假设施等方面将增加。这方面基金的比重也将增大，相应属个人分配的消费基金与必要劳动相对缩小。总之，其社会意义与资本主义下的工资有着内容不同的一方面。

经过这样的低级的第一阶段，“在共产主义的较高阶段，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况消失了，没有脑体劳动的对立，劳动不再是生活的手段，劳动本身成为生命的第一需要，伴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增大，公共财富象泉水一样涌现之后，社会将可能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局限，在它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恩全集》第19卷第21页）

以上的考察，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经济生活状况的推想，大概是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形成的，如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中有“以公共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在意识到自身的个人劳动的同时，作为社会劳动支出的自由人们的结合体”的论述，第三卷五〇章“竞争的外观”中有就“所有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共同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一般基础”的论述等，则为其直接准备。

这乍看起来似乎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劳动货币论，劳动全收益权论类似。而通过对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历史运动法则进行分析，明确了价值形态与价值实体的关系，通过资本主义的特殊区分和处理机构，洞察了其深层的所有社会的共

同经济原则，即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一般基础及社会机能。

然而，从《资本论》的经济理论体系整体潜在地表现出来的对唯物史观及社会主义论的贡献来看，并未彻底反映上述分析的成果。另一方面，《宣言》以来的唯物史观及社会主义的原则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被继承。因而《资本论》的论述也多少出现了勉强，不统一之处，经济理论对唯物史观及社会主义论的贡献也因此有了难于理解之处。通过对《资本论》经济理论所遗留下的问题进行补正，可以对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论加以新的分析和研究。以下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几点重新作探讨。

3. 经济理论的贡献

(1) 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按照唯物史观论述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将必定到来。如，第一卷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第二节中这样论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随着资本积累及资本的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不断产生相对的人口过剩和产业预备军，其结果，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大资本家手中集中，相反雇佣劳动者的贫困则越来越增加。

接下来的第二十四章第七节“资本主义的积累的历史倾向”中论述，掠夺“基于自己的劳动的个别的所有”，由这一否定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随着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及生产力的发展，资本集中的反面带来了劳动者的贫困及更重的压迫，于是有组织的反抗则增强，不久“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与其资本主义的外壳的矛盾到达不可调和的程度”剥夺剥夺者，否定之否定将会发生。

这一论述，显然是《宣言》第一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唯物史观关于社会主义的论点的延长，并补充说明资本主义积累

和人口规律论。然而将“资本主义的积累的历史倾向”作这样的理论概括则有些勉强。

例如：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基础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掠夺农民手中的土地”，这些土地并未基于自身的劳动成为私有的产品。况且，原始积累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关于积累的基本内容，不是通过掠夺达到资本的集中。其原理是基于劳动力的商品化来榨取剩余价值，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只要是这样，资本在劳动生产率许可的范围内，即便允许实际工资有所上升，也仍会压缩必需生活资料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余地。

资本积累的增加因固定资本的制约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其有机构成未必会不断提高。即便有机构成提高，积累的资本量增大，而雇佣劳动也将增加。从原理上看，资本积累未必一定会带来失业和劳动者的贫困。因而劳动者的团结和有组织的反抗无论如何增强，都未必被认为劳动者的贫困化是其直接必然的结果。而是与资本积累、劳动者所居具体的历史条件、工人运动及其领导者的能力相关。并非是资本主义内在规律所决定的。

而从《宣言》第一章到《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的积累的历史倾向”中的论述正是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修正主义与反马克思派所攻击的目标。马克思派往往支持其中的两极分化和贫困化论，将这一理论的应用作为重大任务。看来似乎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论由于经济理论而得到加强，而结果是未经学术上充分证明的主张给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带来了混乱和弱点。

《资本论》的经济理论，如通过价值形态与实体的区分与关联，阐明了商品经济所特有的机制和结构与各种社会形态共同的经济原则的关系，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地位及受压迫的理论，进一步搞清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矛盾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通过全面的论述，明确了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特殊运动原理，揭示了扬弃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目标

的可能性。而唯物史观的任务是总结迄今为止的人类史及向社会主义转化，即揭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进一步以事实来证明这一必然性尚未以工人运动的实践为重点。即，经济学对于唯物史观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客观地阐明变革的对象和相关条件。而将其可能性变为必然的作用则有待于社会主义思想所指导下的实践活动。

(2) 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及其质的内容

从上述经济理论与唯物史观的辨政关系出发，对唯物史观的内容加以补正的要点在于，唯物史观的简述中，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基本动力，生产关系则必然被变革，而向社会主义的变革也成为必然。《宣言》中则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后，生产力的量的扩大加快，革命变革的步伐也相应被推进。尽管理论与实证都证实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与生产关系相冲突而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现代经济中的长期世界范围不景气，但将其归结为经济学的问题，只是阐明变革的对象及条件，是不妥的。强调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必然性，这属于社会主义思想与主观能动的实践作用。

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向社会主义的变革是天经地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西欧在从封建社会到形成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世界商业与商品经济的扩大促进了旧生产关系的解体与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起到了基本动力的作用，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有历史性的差异，是以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通过对可能被变革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践者，组织起来的工人、市民的运动，来有意识地实现的社会课题。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中也未必一定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即，生产关系变革之际，对于担负着变革主体作用的无产阶级应以唯物史观来看待。这样可以免于对唯物史观作片面的生产方主义的理解。就此，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

述的“这种整个颠覆的物质基础，一方面是现存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形成了革命群众，不仅对于旧社会的各种条件，对“活的生产”，形成了对社会总体活动叛逆的人民大众。而上述因素不存在时，就是把“颠覆”的概念重复100遍，对于实践的发展也毫无任何意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宣言》等文献中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把生产资料都集中在国家手中的同时，给社会带来了比资本主义更为迅速的发展，并进一步去实现共产主义。这里也有单纯生产力的唯物史观的疑问点。这一面由苏联的领导人所继承，苏联革命胜利后，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了一切服从生产力发展的修正主义倾向。大规模发展经济的路线给工人、农民带来的是压制。很多人开始对此进行了批判。同一指导思想对苏联型社会也造成了环境破坏。

然而，马克思另一方面又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农业与工业相分离，对土地和劳动者都有破坏的倾向，进一步对造成脑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使劳动者畸形化的倾向进行了批判。《资本论》(331—332、463—466页)将此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从这一观点来看，生产力的发展要有量与质双方的统一，且受生产关系性质的相互制约。社会主义应克服资本主义技术过度开发的弊病，在与自然的共生中，将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生产力的质的变革作为重要任务。从这一点出发，经济学理论与实证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生产力发展的实质内容，及选择过程的理论和意义尚大有余地。

(3) 价值论研究的意义

如上所述，马克思通过《资本论》中对价值论的深入研究，充实了社会主义的理论。看起来很曲折，价值论研究对于唯物史观为根据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解决马克思的价值论所留下的疑问，也是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何种贡献的一种探索。相反，从对社会主义理论贡献的可能出发，也应斟酌价值论研究

的内容和方向。

例如，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将以劳动证券形式实现按劳动量分配消费品。对于各种各样的消费欲望，实现直接按“社会劳动时间的有计划分配。”

而现实中，苏联型社会广泛地利用价格形态，这是由于包括生产资料价值转移部分的产品劳动量的确定，在技术上是困难的。除复合产品及复杂劳动的特殊问题，各种产品的劳动量，从理论上讲，在生产技术上是完全可能的，但现实中大概受计算机的成本及性能等因素的限制，在以所有的产品为对象确定其劳动量时仍是困难的。

于是在苏联型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中，价格形态与财富的衡量是用同一尺度。消费资料的分配也通过工资形态进行。其价格，工资置于集权的行政管理下、置于经济计划之下，与直接靠劳动时间的计划和分配相异。利用残存的商品经济形态仍有不可否定之处。于是有了导入利润动机，利用它来刺激市场的作用。在东欧广泛开展的分权自主管理的改革运动，改善共同的自主管理之下的车间、企业、产业、地域的软条件，有效的经济机构，实行市场经济化的方针，追求市场灵活性成为反复努力的目标。

而后经过1989年革命之后，东欧各国走向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市场经济方针占了统治地位。中国也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推行市场经济。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运动来说，市场与价格的可用性，今后也将被进一步探讨，研究。

尽管社会主义未必将所有的生产工具国有化。但是既然生产资料以各种形式公有化，基本以生产合作社为方向，社会主义下商品经济的广泛被利用，并不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借用李嘉图的价值论方法，从单纯的商品关系抽象出价值学说，揭示了等量劳动交换是价值关系的实质内容。并论述：“独立进行不相互依存的私人劳动生产物品，相互作为

商品而对立。”将这一论断绝对化，就难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产品作为商品而相对的可能性。于是将与计划经济共存的价格关系看作与商品经济完全不同的东西，相反地把利用市场经济直接说成是修正主义，或导入价格机制必然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为前提。这是一种狭隘的看法，仍会再次引起混乱。

而马克思在另一方面，本来认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将到尽头之时，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及其成员相接触之点开始的。”（《资本论》161页）。宇野弘藏重视这一观点，强调商品经济在各种形态的生产关系的社会之间展开社会生产具有外来性。采用不直接与劳动实体发生关系而以纯粹的流通形态来构成的方法。从这一价值论的新的展开与构成看，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地域社会间、生产共同体的企业之间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可以利用价格形态，这在理论上也可以理解。

在马克思那里，既重视价值形态的概念，又始终基于劳动实体而展开论述，由于认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基本是相互独立的私人劳动，则可能出现一种倾向，即，生产资料的公有的劳动形态一成立，商品的价值关系立刻被排除，将会实现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生产和分配。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条件下，产业间地域间产品有计划供给时，以各种产品为对象的劳动量将如何计算，还有为各种产品定价时，如何处理其背后的劳动量关系。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显然只要这里实行的是等价交换，那么就应受同一原则的支配。”在《资本论》的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中有如下内容“价值的所有本质的规定”包括了对无商品关系的劳动时间的处理。这很容易使人们想到商品生产物的等量劳动交换所规定的价值规律内容实质，原则上在社会主义也可以实现。而且在那里价格也同样受到这一规律的制约。

回过头来重新探讨一下，最近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研究。在生产各种商品的劳动量 a_i 中，包括了由生产资料转

移的旧劳动量 c_i 与工人生活的必要劳动 v_i 及剩余劳动部分 s_i 。与前二者不同， s_i 在交换时，产业或企业即使不能回收这一部分，也不影响再生产，其处理有相当自由的余地。只要如此，尽管生产价格中带有（费用价格加平均利润）与剩余劳动部分的不等量劳动的交换，价值规律仍在起作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业、企业中，相当于 $(c_i + v_i)$ 部分的劳动量也必须得到补充。很显然，对于超过这一部分的处理，是有很大的自由余地的。不必象资本主义那样依分配平均利润的原理进行。随着公有生产资料比重的增加，直接分配给个人的必要劳动部分也相对减少，由社会同意而决定来处理的剩余价值部分的作用将增大。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条件下，决定产品的价格时，有社会可以自由操作的余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一价格体系“正常化”在讨论中应加注意。

（4）复杂劳动问题

关于通过劳动证卷分配消费资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因劳动者的体力、智力的不同，劳动的酬金在内容也有所不同，作为劳动尺度的分配关系还带有不平等的权力，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这是留给后人的重要理论问题。《资本论》并没有在理论上完满地解决复杂劳动、熟练劳动与简单劳动的相对数量关系问题。较好的方法是依据新技术设备的不断发明，把新复杂劳动转为简单劳动。这样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劳动看作发挥了平等的劳动能力。这种倾向到现代一直存在并反复发生作用，与这一倾向相呼应，现实有下述两种动向愈发明显。

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务管理的“官僚主义的”形态更加强化，职务划分更精细，对基本上有同样劳动能力的人的劳动报酬也分为三六九等。另一种倾向是在市场经济下要确保再生产的供需关系，对于种种需要训练、教育的技能和劳动能力给予特别的报酬。这种高报酬的程度可以与其劳动的较大支出来理解。

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掌握一定的技能与接受教育并不由个人负担其费用，如果全部由社会基金来确保的话，至少在保证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时，没有必要对其劳动支付高额的报酬。这时的复杂劳动与一般劳动相当程度上不具备互换性。是否可以认为是多数人的活动能力的一定时间的支出。而将其作为一定时间劳动力的支出同一般劳动等同看待更合适吧，即便从精神的紧张程度与肉体的疲劳差别来看，同简单劳动可以互换的工作也千差万别。复杂劳动经过专门的训练教育，竞争的压力小，工作中相对愉快、疲劳也相对少。与简单劳动相比，实际上很难以找到支出了较多劳动的根据。

这样看来，承认不平等的劳动能力与其相应的报酬，即马克思所说的不平等权利，在现代大概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的劳务管理技术与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若说苏联型社会的党和国家官僚特权的经济生活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中的不平等权利论为依据的话，则有必要对复杂劳动这一概念，在理论上作重新探讨。

与此同时，以发挥人们平等的劳动能力的平等权利为基础，考虑到有无家属、家庭成员的情况及其他需要，而进行消费资料的分配。应该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意识到，应扬弃脑力劳动的对立，并伴之以文化的变革。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不应该等待遥远未来的生产力发展来实现，而应该是在其第一阶段就考虑到这些问题，逐步解决。至少以共产主义的较高阶段为彼岸的传统的苏联型社会中以党和国家官僚的特权生活为按劳分配的正当化的思想，实际上并没有理论根据。

(5) 国家权力过大化的因素

苏联型社会中产生的问题中，大概最明显的就是，国家权力不是向着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社会主义理论方向发展，非但没有失去政治的性质走向消亡，而是相反愈发强大，在其之下无产阶

级受到压制，并未成为社会的主人公获得真正的解放。那么，这种苏联型的社会问题如何理解，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如今世界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形成期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化现象论、官僚代理人国家论、国家资本主义论、新阶级社会论等等。就其背景的理论问题方面已有阐述，以下进一步指出两点。

其一，就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应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问题。《资本论》的经济学原理体系中，特别是危机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机制。然而，在理论上，《资本论》在整体上的完成度明显较低。同时存在几种类型的危机论。这对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根源也有很大的影响。

例如，正统马克思学派的传统的商品过剩经济危机论在强调“直接榨取的诸条件与实现榨取的诸条件”并不一致时认为，对于“仅由于社会生产力制约”的剩余价值生产增加的倾向，资本主义特有的局限在于无政府的“生产部门间的均衡关系”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耗”。而无政府的不均衡状态，消费的局限则被看作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即资本主义的所有方式所致。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大生产与资本主义榨取的矛盾在经济危机中强烈地爆发”，也可以作同样的理解。

从这种危机论出发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推行国有化及公有化的计划经济，这样就可以解除无政府状态不平衡和对抗性的分配关系，避免资本主义的矛盾。随之，强化国家机构和权力，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资产阶级法权，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禁止分配中的阶级不平等，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看成是人类理想的彼岸社会，而认为迥然不同的低级阶段中国家走向消亡的过渡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也支持了强化集权的计划经济，强化党、国家掌握权力的路线。

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理论上阐明了，关于劳动人口的资本积累过剩将导致经济危机。这一资本过剩的危机论，战后在日本

受到宇野的推崇形成了日本的理论体系，并认为周期性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力的商品化。因此，剖析资本主义展望社会主义之际，应认识到只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否定和公有化是不够的。

与土地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不同水平相呼应，必须废除劳动力的商品化。使人民大众获得解放，成为主人。实现废除劳动力商品化的变革这一社会主义目标。其内容应包括些什么，将会经过何种形态的发展阶段和途径等问题，都应在关于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的异化和压迫的理论和现实机制的基础上搞清楚。当然，这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工农分离、体力脑力劳动分离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旦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其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机能也一定是公社式的、实现了社会化，权力趋于分散化。在这个意义上，增加工作岗位中及地域的人民参与决策权及透明度和民主化，重视工人自主管理的主张和运动，虽然不是理论上有意愿向废除劳动力商品化的方向努力，但在实际上具体地揭示了这一问题。

另外应注意到一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苏联型社会的国家机构的强化与资本主义并未给世界带来均衡有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将在世界市场中消失。而无产阶级掌握权力以后，更促进了这种倾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也指出“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对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只是显示了其未来发展的前景。”对照看当时先进的英国，向全世界推行自由主义，国家的对内外职能有日渐缩小的趋向。而无产阶级革命后，各国人民间的敌对关系则更易于消失。

但是，资本主义本来就是在商品经济下为实现资本的增殖而组织生产的。其现实的倾向是，以合适的工业为生产基础集中发展。这样，马克思所一贯重视的工农业分离，城乡分离和对立将

不断产生，并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中心的一些工业国与周边农业国即初级产品国家间的分离和对立。进而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工业化所发生的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这些国家中形成了金融资本开始了帝国主义的资本渗透和竞争。而后，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性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殖民地解放斗争，资本主义的核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其间经过反复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中心各国之间及与周边国家之间，各国人民发展的不均衡，差别及对立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增大。资本主义世界体制下所特有的国际不平衡的中心及周边阶梯式发展，在帝国主义阶段后，既加强了国家的经济政治作用，更表示了各国人民间差别和对立的倾向。

苏联型社会在这种世界形势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过程中推向东欧诸国。战后又扩展到中国和古巴。这些都是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制包围之下形成的，而在战后冷战结构中被迫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抗中维持生存。这种对立结构给予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凯恩斯主义及其后的就保守主义的国家及军事力量强化提供了借口；相对的是，使苏联型社会的国家和军事机构得以强化。关于后来苏联、东欧、中国，各自走向不同的变革道路，将在以后诸章中加以讨论。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型社会的扭曲和压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际紧张局势中对抗资本主义的需要。

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理论对这些现实问题，显然并不局限于经济学原理，还有待于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和现状的分析来补充。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考察，重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联。重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经济学研究的辩证关系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分析研究，对当代史的指导意义。反思当代社会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应该对经济学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等领域进行全面的重新探讨。这也将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第三章 社会主义论的新展开

1. 苏联型社会的危机

19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对社会主义的议论更加活跃。在资本主义世界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中，向社会主义寻求出路、以及反对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实际现状及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关心。但，与30年代的危机时相比，已对旧苏联型社会的发展及其正统理论、即社会主义是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失去信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失去对近代经济学的信任，现存社会主义的危机使苏联型正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威信扫地。这给我们20世纪带来了双重闭塞。

但，在传统的正统马克思理论行不通之时、重温马克思的原理，在思想和理论上进行新的尝试。这一潮流中可以看到，苏联，东欧的非正统派和西欧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构成了重建马克思经济学运动的重要一部分。这也影响到日本，但对于宇野派来讲，这个问题也仍还是个未解决的问题。

回顾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社会将首先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实现彻底的民主化、强制解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公有化。然后将实现生产力的高速增长，消除阶级差别，使国家消亡。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的人们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第二章）的美好社会。而这一过程必将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来实现。占全球人口35%的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开始了革

命实践。

但各国的现实发展，并未显示出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古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成果。虽然生产资料实现了国有化及公有化。但在这之后国家非但丝毫没有走向消亡的迹象，而由共产党的干部、高级官僚、军队领导者等特权阶层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却愈发强大和庞大。例如，米哈伊尔·S·沃思林斯基的《特权阶层》中分析了“统治阶级”的发生、生活方式、剥削的实质、特权范围、内部构成。1970年，苏联所有党员1千7百万人中的40%，即75万人加上其家属约300万人(占总人口2亿六千万的1.2%弱)。形成了被称之为“红色贵族”的特权阶层。

而相反，苏联型社会中的工人群众没有工作的保障，生活条件不完善，特别是难以确保自身的劳动条件以及对社会决策等政治活动的发言权，参与权，抵制权，并未真正获得解放、成为社会的主人。工人、农民处于被异化，被压制之中，成为被统治阶级。这种看法更接近于实际。中国曾期待打破这种体制，为此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引起了混乱，随着1976年毛泽东逝世而文革也宣告结束。

而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应使生产力加速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逐步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苏联型社会的经济发展却走向停滞。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减慢，停滞，产品的质量的提高，效率的提高都举步维艰。如，苏联的GNP(国民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在第六次五年计划结束的1960年时为9.2%，第八次五年计划结束时下降到7.8%。而第十次五年计划结束时的80年则降至3.5%。之后的第十一次五年计划(81—85年)时，只能将指标降低到3.4—3.7%。公布的经济数字表明，连较低的指标也未达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改革，苏联经济的增长实际上陷于停顿。东欧也同样、或者陷入更严重的停滞。

在国际关系中，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友好关系也出

现了破裂。特别是1956年批判斯大林之后，当年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59年末出现了中苏对立。65年发生了捷克事件，79年爆发了越南，柬埔寨，中国的军事争端，这一年苏军对阿富汗进行了武装入侵。在战乱中，社会主义国家间出现了倾轧。这与苏联型社会的国家权力过大有关。

1980年夏，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高涨，是由于苏联型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所产生，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要进行变革的团结工会与统一劳动党产生了深刻的对立，以苏联的武装干预为背景，81年末终于导致了雅鲁泽尔斯基的军人政权。在东欧社会主义地区第一次出现了劳动党丧失政治权力的严峻局面。但是，问题显然并未得到解决。对团结工会的压制，使社会矛盾潜在并激化，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背景，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掀起了民主化运动高潮。这成了其后东欧革命的重要契机。

2. 无产阶级正统派理论与无产阶级被压制状态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始于1980年初。与此相呼应，据说在学生运动所提出要求中，出现了要求删除必修课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款。这正如，当时苏联政府所指责的一样，成了转向右倾的修正主义的见证。不仅如此，更应注意到，这是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现行体制掩盖所存在问题的保守作用的抗议。

例如，在杜布切克手下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在捷克事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牟理奈西的回忆录《寒夜》中指出，从共产主义改革的观点看，到“布拉格之春”以来，受到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改革运动、受到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名义的，以苏联统治阶层的利害为转移的，来自于外部的压制。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自由与平等的理念及法律的形式维持着实际上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出现了这种倾向、即苏联型社会中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被反过来用于维持对劳动群众的压制。

例如：根据苏联的正统见解，十月革命后约20年间，苏联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知识分子团结协力，发展生产方向和谐的共产主义过渡。1936年斯大林宪法所写明的这一条款在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都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在如下的意义上，这种见解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统理论为根据的。

即、恩格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理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于社会性大生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而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源也在于此。而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与其相对立的私人占有也是来源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态。社会主义要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应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这样才能废除资本主义。按照唯物史观，人类史上最后的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旦废止，将实现没有统治被统治的阶级关系的社会主义，而后无产阶级将成为主体，从按劳分配，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达到共产主义，实现按需分配，保证了协调的发展。

从这种观点看，彻底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及公有化的苏联社会，阶级对立已被消灭，和谐的社会已经实现了。

但是，这样看，苏联型社会中工人群众的非主人地位及被压制状态，本来就不应存在，不成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对于既存体制就成了保守的，压制工人的，转化为意识形态了。

3. 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种类型

对此出现了几种批判意见，带来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活跃。将苏联改革前的几种观点总结如下，一种认为，苏联型社会基本上是工人为主人翁的国家，是社会主义，但对其中的扭曲加以批判。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型社会已经变质为不能称之为社会

主义的阶级社会。其中关于前者的扭曲论、大体可分以下三种类型。

即，和苏联的正统理论最相近的批判意见里，苏联型社会所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历史地看，是由于社会主义还处于形成的初期。如藤田勇的《社会主义社会论》（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就表明了这一立场。从宏观来看，在世界史过渡期的苏联型社会确实在国内外都出现了扭曲。但从中期来看，苏联社会实现了相当高速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的过程中，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压制型社会体制没有改善，反而被强化了。

作为第二种观点，这一点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著《共产主义是什么》中指出的一样，对于劳动人民压制的史实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个人的素质和错误及其个人崇拜所产生的话，则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切。埃琳斯坦的《斯大林现象的历史》中也在广泛的历史、经济、政治环境中分析确定了斯大林的地位和个人性格的作用。确实批判斯大林之后，利用恐怖手段反复进行肃反的政治上的粗暴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控制。但是，其官僚上层的特权地位及其之下的劳动人民被异化，压抑的状态经过近四分之一世纪后并未有什么明显表现。特别是1964年以后的勃列日涅夫体制，甚至被人称之为新斯大林主义。这似乎表明苏联社会的特殊性可能归结于斯大林个人的性格与错误。

第三种观点，例如斯大林的头号政敌托洛茨基着眼于斯大林个人背后的广阔背景中的问题，写下了《被背叛的革命》（1937年），主张由于苏联的落后性，专家阶层作为劳动人民的代理统治者形成了特权官僚，要铲除这些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埃尔耐斯特、曼德尔继承这一点，写下了《官僚堕落的劳动者国家》（On the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 in New Left Review 108, Mar-Apr 78, P43）但是，正如斯威齐指出的一样，以托洛茨基的落后性为根据已经不能说明这一点。普及了普通教育，对专家的需求不足也解除了。曾任匈牙利首相的理论家赫格

居斯·安德拉什在《社会主义与官僚制》(1976年)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只要不放弃经济的发展与效率就有必要保持有决定权力的专门统治集团,构成官僚体制的诸关系,并主张冷静地认识这种必然性,承认并支持对官僚阶层加以有效控制的群众运动。

这种观点的问题所在是,基本上成为社会统治阶级应该作主人公的苏联劳动人民,为何要长期地服从于官僚代理人?而且为什么无法实现对官僚代理人的控制。东欧各国改革运动对这种体制上弊病的纠正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波兰团结工会的广泛深刻的运动曾受到军政府的压制,这意味着什么。劳动人民应成为统治阶级、社会的主人。而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里,与社会的目标相反,出现了变质,阶级关系的再生。

4. 国家资本主义论与新阶级社会论

这就提倡了一种严格的立场来观察苏联型社会形成的这一阶级社会。在这种立场上看,阶级关系的特殊本质当然是重要的。就此问题分为国家资本主义论与新阶级社会论两种主张。例如,法国贝特雷姆著《苏联的阶级斗争》(1974、77、82、83)的第一卷中主张,苏联的资本主义复活,国家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而出现。这种看法被当时苏联史研究所支持,与文化革命中中国对苏联的批判相一致;这种主张如果正确的话,可以认为东欧各国也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在文革之后的中国,也重新出现这种状态。

一方面承认唯物史观的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是阶级社会的最终形态,另一方面重视苏联型社会中所存在的雇佣劳动及通过价格形态对工人与农民的剥削,确认劳动人民作为被统治阶级,就等于确认国家资本主义为苏联的特征。但是,认为苏联型社会中不允许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难以将官僚阶层看成资产阶级,从

其行动方式看也很难说遵循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方式。工人几乎没有失业的威胁，各个企业内也没有提高生产率的动机。

斯威齐在《革命后社会》中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后的苏联社会经过党与上层官僚的倒置形成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新阶级社会；对贝特雷姆的主张进行了好意的评论，但其见解则与前者大不相同。这种主张克服了以苏联型为楷模的否认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及传统的初期社会主义理论的不足，如斯大林体制论，官僚代理人无产阶级国家论、国家资本主义论，充实了唯物史观的不足，为马克思理论分析研究现代史提供了合适的理论基础，也进行了勇敢的尝试。斯威齐重视苏联型社会上层借助于国家机构，通过教育机构与晋升制度，自动地维持其特权地位的世袭，构成其统治阶级的特点。

沙米尔·阿明将这样的统治阶级称之为国家阶级。前面提到的沃思林斯基也详尽地描述了特权阶级的生态及特权的内容。波兰出身的英国现代历史学家达尼埃尔等所著的《波兰革命与苏联—格但斯克之路》中探索了，斯大林之后苏联、波兰的特权阶层的实态及潜在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阶级斗争表面化的可能。

确实，苏联型社会中的国家庞大化，工人被排斥于政治之外，自由被压制所取代，改革运动处于窘境，少数民族受到压迫，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及对外干涉等一系列与社会主义不符的迹象，只有在想到通过国家机构强化统治阶级的地位及维持特权的目的一致性，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现象。但是，这一系列的迹象也正如初期社会主义论指出的一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而后的国际关系中，与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大军队和国家相对抗中所产生的。在冷战的格局之中，无论从东西方那个阵营来看，相互对立中难免不产生特殊的社会扭曲。

从对外关系受到的压力、苏联型社会的特殊统治阶级存在，入手分析时，会发现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有所不一致，如古代

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封建制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垄断性所有为经济基础形成对照。斯威齐等人的新阶级社会说，重视特权阶级基础的教育机构、晋升制度的作用，有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特色。

大概垄断阶级通过国家机构可以对生产资料进行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成是垄断性占有。因此，这里统治阶级的性质，并非是完全意义上形成了阶级统治的基础。或者在这一点上与初期社会主义论，工人官僚代理人国家论有再综合的余地。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充分注意到教育、知识、情报的集中及政治权力的集中都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为阶级统治的形成和维持提供了可能性。就此点，被东德驱逐出境的鲁德卢夫·拜罗所著《社会主义的新展望》（1977）中深入就亚州的生产方式与苏联型社会进行了理论、历史的对比。也可以说，其论点直接或间接地显示了现代第三世界诸国的状况。

苏联社会中的就统治阶级未能实现被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的雇佣保障及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但某种程度上由于被压迫阶级的主动承受而维持下去的侧面也不可忽视。1989年东欧革命发生后，这一点也大白于天下。

总之，对苏联能维持压制的社会关系及其原因作何理解，就此进行改革的基本方向及历史意义的研究、理解上有决定意义，也成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关注之点。

5. 分权制的计划经济与自治管理的方向

从以上观点看，不可忽视的主题是有关苏联型社会的集权体制的分权化改革路线的论点。分权化的主张一方面包括对苏联型社会的集权计划主义伴生的命令压制体制的反抗。在这一点与中国文化革命的指导思想有所共鸣的。另一方面，在苏联、东欧各国的议论纷纭中，确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系统的职能及效率，避

免经济的崩溃，重视这一重大课题。总之，这些代表了批判斯大林之后改革运动的发展。再从内容上看，在各企业的经营中努力实现工人的自主管理，强化以此为基础的民主主义。相反，关于各企业间的经济关系显示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向。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副首相、布拉格之春的经济改革理论家奥塔希克在《对新经济社会的建议》（1973年）中提倡改革路线，他的合作者伊捷·柯斯特在华沙协约国军入侵之际，被驱逐出国。后者所著《现代社会主义》继承了前者，在理论上进一步作了探讨。曾致力于波兰的经济改革，1968年被驱逐于国外的乌基米埃西·布鲁斯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1973年）中也论及了分权化为方向的市场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强调了其中的经济决策与政治决策的相互渗透关系。

埃德瓦鲁特·卡尔德里在《自治管理与民主主义》（1977年）中以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及76年工会劳动法、自治管理运动为基础，论述了其指导思想和制度。日本的岩田昌征所著的《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考察》对于南斯拉夫型改革路线给予高度评价。匈牙利出身的法国历史学家弗兰索娃·费伊特在《斯大林之后的东欧》（1972年）中描述了东欧进行改革的前前后后，中苏对立的影响及苏联的对外政策等等。

勃列日涅夫体制下的苏联最高领导层批判这种改革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并始终贯彻了压制的方针。而以匈牙利事件后苏联对东欧的干涉为契机，欧洲共产主义、西欧马克思主义重新崛起，与东欧的改革派相呼应，出现了分权化、地域主义、自治管理的倾向。这种动向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党派运动方针及基础理论研究都发生了很大影响。如，大内力在《新社会主义像探索》（1979年）中，灵活运用宇野理论，强调废除劳动力商品化，吸收上述倾向，对日本社会党的纲领文献《日本走向社会主义之路》提出了修订计划。

6. 利用商品经济的可能性

其中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商品经济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理论曾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实物经济为基本原理，应尽快地排除商品经济。俄国革命后，从内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时经济、苏联集权经济动员的经验，似乎也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特别是战后，批判斯大林之后，E·Γ·李贝尔曼在其论文《计划·利润·奖金》（1959）中指出，“为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允许引入利润核算机制。

战时动员体制结束后，集权下的实物计划经济显露出以下倾向，企业管理阶层中尽量压低可以实现的生产指标；回避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新技术引进，忽视产品质量；没有参与意识，有就业保障的工人对效率的麻木。另一方面，在消费资料的分配，需求同供给的调整及相应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调整等方面，实物经济都表现为缺乏合理性及物资的极度缺乏。为克服这种状况，苏联型社会出现转向依靠市场机制的倾向。

以分权计划为目标的东欧各国改革运动反映了其发展的现实一面。实际上，南斯拉夫型分权自治管理体制下，对各企业的工会基础组织间的经济关系如何管理、计划，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也许计算机的发展将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现在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商品经济的形态。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通过刺激来节约费用，提高效率，提高质量。相反，对基础工人组织之间的工人劳动条件、收入及生活水平的差距如何调整，怎样确保劳动人民参与所有的社会活动来实现经济政治上的自治管理，仍是尚未解决的课题。

1989年东欧革命后，东欧各国的政治机构的民主化得以实现、向自治管理型社会主义改革的路线并未得到支持。当前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全面市场经济化方针政策，都是自治管理或者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与调整中，指导思想与现实困难冲突的表现。

斯大林曾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中主张，经济学中的经济规律可以象自然科学中的利用自然规律一样利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对此，宇野立刻予以反驳。他指出，斯大林将所有社会生活中共同的经济规律与商品特有的经济规律相混同，而社会主义是要废除商品经济及其无政府的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经济向有意识的，计划的充分的方向发展。现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未能立刻废除商品经济的诸形态相反，显然现实中将很长时期内将会把商品经济纳入自身经济环节中。分权自治管理经济系统则更是如此。

但是，这并不意味如同利用自然规律一样利用价值规律。如同宇野所指出的一样，基本上还是废除商品经济的作用，转向有意识的、计划的方向的过程中的一环。具体地说，保证民主决策变得更加重要，尽管是分权的计划经济、基本的物资，资源的生产、分配计划，公共设施，服务的拓展及工资、各种物价的有意识调整、变动、对供给的财物、服务种类、品质的流通系统的扩充、完备、通过消费者对生产、供给战略的参与及上述有关情报的公开，限制和管理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措施。

与资本主义不同，不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计划经济中，物资与服务都伴随着价格形态表明，对于社会劳动生产过程，商品经济的形态构成其非本质的外部关系，且对于任何生产关系的生产品都能起到有益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第一章所述，宇野理论考察有关社会主义利用商品经济的流通形态论的纯化方法，将成为重要的原理标准。不仅如此，在理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价值论的观点看，对于商品价值实体的劳动量关系的价值形态价格关系，应将其本质和现象紧密联系起来考察。

这里有来源于斯大林的混乱，而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之际，胡

乔木的文章《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北京周报》1978.11.12）中提出，“按价值规律实现等量劳动量交换，则会实现工农业间，各产业间的谐调的经济发展”，这也表现出其朴素的误解。纠正这样的混乱和误解，在理论上搞清计划经济下，人为调控价格机制的可能性，重视价值形态与实体的量的关系区分，承认通过二者关联的价值规律内容中对剩余劳动处理的自由度。这也显示了我们价值论研究的方向上的局限。可以认为就以上几点也仍有讨论和研究的余地。

7. 关于追求经济效率的问题

苏联型社会沿着集权的计划路线、以发展重工业优先，绝对重视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的发展经济方针，形成了特权官僚的统治体制。这种路线也适合战时经济与军需生产。但是，随着多种多样的消费资料的生产变得越发重要，仅仅靠集权的计划，已经不能确保经济效率的提高。随着企业内官僚及工人表现出丧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意识，为恢复经济效率，进行了利用市场机制，分权化及工人自治管理的尝试。

始终重视经济效率，进而加以绝对化，于是就出现了下面一些问题。正如赫格居斯所指出的一样，只要追求效率，无论集权体制下还是分权的计划经济之下，专家阶层的形成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当前广泛的社会分工及工厂内的分工的效果也不可忽视。于是在社会与工厂里由于职务分工不同而形成了阶层，其下层常常被压制。中国的文革中的下放运动就是试图废除专家官僚和分工的一种矫枉过正。但这并未能避免效率的下降，1977年后转向“四个现代化”路线。

如同赫格居斯指出的一样，只要追求经济效益，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官僚阶层的形成就不可避免、劳动人民怎样通过代理人来实现民主的控制就是重要的课题。这是一种现实的想法。没

有必要认为掌握决策权力的官僚阶层将永久存在下去。勿宁认为，如同商品经济、国家一样，既存的集中持有特权的官僚阶层也将由于人民的自主意识的解放和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最终走向消亡。

与此方向相对照，人民追求，努力限制官僚特权，将政权职能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控制之下。这一过程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实现。集权的国有化的生产资料在分权的无产阶级自治管理之下，向社会化方向发展。正如布鲁斯指出的一样，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同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后必将反复进行。国家官僚与权力也将在这种反复过程中，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渐渐减退。而苏联、东欧寻求经济发展，提高效率的路线，一直都是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开发，使用的产业技术与生活方式，并以此为目的的。假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及利用这种技术的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与社会思想与社会体制无关的、中性的，不可回避的选择，即唯一的出路，那么模仿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技术和生活方式，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有百利而无一弊，应受到推奖。

的确，前一段时期中，人们仍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是与生产关系及意识形态不相关联的。而最近，由于资源能源问题、生态平衡及反对核武器问题，无化肥农业等，人们开始深刻反思资本主义世界下，以资本的利害为原则而推进的科技发展方向，形成的生活方式，并对此加以深刻的批判。例如，从关于反对核电，发展柔性能源系统的小规模技术的可能性的科学技术理论动向、对汽车化社会的批判等等来看，可以认为，至少在某一时期之后的资本主义工业技术与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并不能看做是生产力提高的唯一途径。

苏联所追求的大规模工业化路线，从未对那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所伴生的弊端加以批判，而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其在集权国家主义方向上的重新扩大及发展。在苏联型社会中，

虽然依据与资本主义相异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或多或少进行了新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的开发和开拓，但并未取得长足的进展。在整个苏联、东欧，人们对美国型的汽车化社会仍然羡慕不已。饭田股在《现代社会主义再考》中评论到，以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为基础的西欧文明虽显现出渐渐日落西山，但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各国还看不到能取而代之的经济发展及新文明的内容和实际发展。

例如：应该对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产业与大规模生产产业，在现存基础上进行区分。将一切领域的规模生产都绝对看成高效率的话，那么虽不是对分权的工人自治管理的全面否定，也将给这种自治带来困难。在生产技术开发上，也应重视保护工人的自治管理。这种发展，为国家的消亡，特权官僚的废除，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人们自身的解放，主人翁地位的获得打下物质基础。

提高经济效率本身，虽是长期必须实现的经济原则，但不应将此视为终极目的加以绝对化。应认识到为保持与自然的和谐，获得人类的解放，也有必要对迅速加以调控。同时对于以汽车社会为象征的利己的资本主义消费生活方式应加以批判和克服。

然而，东欧的民主革命、苏联的体制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在推行市场经济中，往往会轻易将资本主义创造的产业技术与消费生活方式不加批判地吸收引进。这样就不可能实现产业技术的选择，改变消费生活的内容，发挥社会主义重视社会效益和使用价值的优越性。上述地域的社会经济改革，最终将会被资本主义所吸引，压倒。相反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展开的生态保护，生态平衡运动、及对此的关心，对资本主义产业技术及消费方式反思，却使人们更容易认识到社会主义可能克服这些缺乏重视使用价值的可能性。

在这种意义上，要明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指导思想，搞清传统的集权的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和意义，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理论与现状加以批判的考察和重新认识。另一方面，离开市场

经济，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就不可能形成合理的经济秩序。这种批判从19世纪20年代以后就反复被人们提出，70年代后随着苏联的危机，就此的争论和研究又重新热起来。下一章将回顾这种反社会主义的主张和争论，重新考察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的现代可能性。

第四章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在苏联、东欧、中国，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到挫折，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体制改革，但都以市场化为主要方式。这种状况说明，不依靠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合理存在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形成代替市场经济的动态合理的机制。就此问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从1920年到30年代，西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争论已经提出了经济理论的重要争论之点。这一争论继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皮尔逊(N.G.Pierson, 1839—1909)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米塞斯(L.Von Mises, 1881—1973)、哈耶克(F.A.Hayek 1899—)、韦伯(M.Weber, 1864—1920)主张不承认市场价格的集权计划经济对有限的资源和资本无法实现合理分配的基础。对此，泰勒(F.M.Taylor)、狄金森(H.D.Dickinson)、兰格(O.Lange)、多布(M.Dobb, 1900—1976)、斯威齐(P.M.Sweezy, 1910—)给予了反驳。在50年之后的今日，西欧又重新出现了这种争论，主张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及对此的评论、研究，令人想起当时论点的重要意义。本章将回忆两个时期关于市场与计划的争论和研究，思考其现代的意义。

1. 社会主义不可能论

战前西欧的争论中，主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存在的合理

性的理论，大体都经哈耶克编入《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的理论》一书中，其中包括了皮尔逊、米塞斯、哈尔姆（G.Halm）、巴罗内（E.Barone, 1859—1924）的文稿。这些文章主张，按马克思派的主张，用共同社会的人为的计划代替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劳动时间作为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分配的尺度，这种经济系统的合理存在是不可能的。

为避免混乱，应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名称用卢布和元，其确定价格的几个方面有，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设想的价格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时间的某种相关机制来确定价格。②由投入产出的供给结构的社会的、技术性关系，客观地决定，公定地决定。③在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自由变动中来决定。以上三者各有其不同的意义。批判集权的计划经济不可能合理存在，当然是以新古典派价格理论为根据，强调③的价格机制是经济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如哈耶克所评价的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近代论述的作出最早的贡献”，皮尔逊的论稿《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1902年），作了这样的论述，即，一旦实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现象就消失了，只剩下技术问题的意见受到广泛的支持，是个重大的错误。

第一、反映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之间贸易的需求与供给的价格以货币结算。而只以各种产品所用劳动量为尺度计算、则将与勤勉、效率有关的劳动视为同一价值了。中国将体力劳动看作熟练工。有的国家随意要求贸易对象国增加支付购买其贫脊土地上低效率生产的物品。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出现了利用对净收入的价值评估来进行分配的问题。依劳动时间为尺度的价值评估则将一切劳动等同起来。造成高效率劳动无权得到高的收入。而用等量劳动生产的物品中，其质量上乘者需求较多，则被认为价值较大，因此交换与交换价值就自动产生了。

其中前者的国际贸易论点是皮尔逊所特有的，下面就此加以

评论。只要各国保持其独立性，社会主义各国间与其国内计划经济相区分，排除援助关系，则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贸易决定其价格与资本主义诸国结成贸易关系的社会主义只能如此。这种情况下，各国国内则有必要在国内计划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贸易关系，避免出现混乱和障碍，保持经济生活的公平，使其费用和利益归于整个社会。计划经济若实现分权化，则由地方自治体来完成这一任务。

然而，为什么可以说，自由的国际市场价格是最合理、公正的呢。皮尔逊按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认为这是绝对合理、公正的。而可令人信服的意见是，国际贸易中的市场决定价格掠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使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国家经济上更落后和贫困。认为中国的力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熟练工不一样，是将市场价格机制绝对化，或是无缘故的歧视。社会主义国家间有可能排除供求决定价格中的投机成分、避免由于工业竞争力不同而出现的剥削和掠夺，实现合适的劳动量交换。为资助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可以通过协商调节贸易条件。这正是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特别之点。苏联与中国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古巴的砂糖，就是很好的说明。

以劳动为尺度的交易，可能使某一国以贫脊的土地上产品，换取其他国家较多的产品，皮尔逊的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在这样的国家中，出现了以等量劳动产出较少的情况。尽管较以前为少的本国产品换取与以前等量的外国产品，为此付出了与从前相等量的劳动。但由于交换比率的变化使皮尔逊产生了错觉。

皮尔逊的第二个观点，即、国内经济的论点，由米塞斯之后的学者加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米塞斯的著名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中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属于共同体的财产。”在这种前提下可以选择各自不同的分配标准。假设以其成员平等的原则，经一定期间后，分发一批可以领取一定量消费物品的票证。这样，每个人可以用领取的物品与

他人相交换，于是出现了交换与使用货币的可能。

如米塞斯指出的一样，漂亮，人类的健康、幸福、个人与国家的名誉等非经济的因素是不能以货币计算的。而属于范围内的日常经济生活都需要货币的经济计算。不通过货币计算的价值计算，这样的计算不进入生产资料的高层次交换领域，则不能实现社会经济合理地存在。但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生产资料共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等）不能使用货币表现其价格及价值，货币在经济计算中则完全不起作用。”于是，当局不可能通过计算来找出实现最低成本的方法。静态状况下，经济计划是可能的，也可能引入新技术，进行技术改造。但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内部没有计划经济的指针，所有的“只是暗夜中的摸索，社会主义是合理经济的破产。”（《集权的计划经济的理论》121页）

没有货币，不存在交换的经济中，只能以劳动来代替经济计算中的价值单位。米塞斯指出，其中存在二个缺欠。一是没有对物质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益的正确评价。如，以生产要素a一个单位，劳动一个小时计算的话，P的生产要二个a单位与工作8小时，Q的生产，a单位与工作9小时，用劳动来衡量P与Q等价，而用价值来计算的话，P要比Q要大一些。前者是荒谬的，后者是适合于计算的，合于目的及其本质的”（同前书125页）。第二、无视劳动的本质差别，简单劳动与熟练劳动的换算率不清等。与经济计算相关联，没有自由创造，无个人负责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的重大威胁。社会主义缺乏改善生产技术和条件的内在压力，对需求的变化难于作出反应，成为经济有机体的赘物。

社会主义的提倡者们的根据，就在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及其合理性。但从经济的合理性观点来看，其依据是错误的。如今看到的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统治下产生的只是破灭和消亡。

米塞斯的最后的评论中，将革命后当时苏联的内战及外国武装干涉出现的经济危机误认为体制本身的原因，没有看到后来直到196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而后苏联经济走向崩溃及

采用市场经济化政策潮流之中，米塞斯所指出的理论问题再次显示了重大意义。其要点是，生产资料公有化，没有市场交换的经济体制中，无法计算各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因而也无法实现合理的成本最小化。与此相关在理论上虽不很清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确实存在着诸如缺乏进行技术革新的积极性与责任感，对需求变化的灵活反应和适应性。

这此论述中多次涉及了以劳动为尺度为经济计算单位代替市场价格机制的可能性。他继承了其导师柏姆-巴维克(E. von Böhm-Bawerk, 1851—1914)的思想，对马克思的价值论持批判态度，认为以劳动为尺度是荒谬的。看来似乎是文字争论的价值论论争竟与社会主义经济论有着重大的关联。关于以劳动为尺度的论述中，米塞斯所提出了两大缺欠，其中第二点就是熟练劳动的评价问题，下面将多次提及。如前面第二章所述，将熟练劳动力的培养及再生产的劳动费用处理问题与熟练劳动力的支出时间评价问题区分开考察的话，后者可以归结为各种类具体的有效劳动向抽象的人类劳动还原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可称之为可能解决的论点。

第一点，关于生产资料与活劳动的组合比率问题，如前面举出的一样，米塞斯认为以下述条件为前提。P及Q的生产中对必需生产资料a投入劳动可看作为庞柏姆-巴维克所称之为忍耐期待期间的利息，其投入率高的P当然比Q的价值大。总之，米塞斯所提出的问题是默认不仅有市场价格，对生产资料的投资还伴随着利息及利润的关系。因而米塞斯在这里所作的批判也局限于，离开资本形成的市场，就没有合理的经济计算的狭隘意见。

韦伯死后发表的大作《经济与社会》(1921年)的第二章“经济行为的社会学基础范畴”中，也从米塞斯极为相似的诸论据出发，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合理的计算。据韦伯的论述，以实物经济为根据的计划不可能进行不同生产资料之间的费用的比较和计算。资本的合理使用与维持只有依靠交换与使用货

市的经济制度才能得到保证。而计划经济中，计划的指标和实现方法都是由中央的指令强制进行的，经济行为是被动的，缺少自律性，自发性与动力，将导致劳动积极性的减退。

哈尔牟的《关于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合适的计算可能性的详论》中也继承了皮尔逊、米塞斯的思想，对二者的论点加以整理，强调指出，要确保相对稀缺的资本与作为资本的物资及土地的合理利用，利息与土地费用是不可缺少的，在无法计算生产要素的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中不能合理地决定利息及土地费用和经营。

在这之前，巴罗内在《集产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机构》（1908年）一文中引用瓦尔拉斯的最适一般均衡理论的数学理论方法与在计划当局下的共有财产的生产资料及土地和人工相结合，探讨了使共同福利最大化的方法。

其结果，只要该国的生产管理最高机构谋求福利的最大化，就需要决定各种生产物品，及服务之间形成某种等价比率，即使废除货币，最后“价格、工资、土地费用、利润、贮蓄等旧制度的所有经济范畴，也不得不改头换面，重新出现。不仅如此，自由竞争其特征的两个根本条件再度形成，并随着这种条件的完备，自由竞争也越近似于极度充分。勿须赘言，就是生产费用的最小化和生产费用价格的平均化。”（《集权的计划经济理论》315页）

哈尔牟同时指出，人口、物资的数量巨大即使假定技术系数不变，也难以解开满足生产的物理必然性、费用、价格平均化的平衡方程式。要求得出这一结果，找到生产费用最小化的条件，决定经济技术系数并非只靠笔头可以计算出来的，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即，计划经济不可能制定出能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生产计划，假设实现了，其结果也无异是在秩序和内容上实现了自由竞争。

哈耶克在整理編集上述研究成果时，提出了如下主张。即，

社会主义需要解决可能有多种用途的有限资源的配置这一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纲领，但在欧洲大陆上，社会民主党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就是物资的生产资源的共同所有，并由中央指示统一使用，再加上选择消费的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但是当土地、劳动等资源的配置作为生产方式可以选择的场合，没有价值的标准，就难于搞清哪种方法是最合理，最节约费用的。而在市场经济之下，这一问题就会在以价格为前提的个人决定和价格机制之下得到解决。(同前译文：17~21页)

例如，H.D狄金森论述道，设想如掌握了所有相关的资料及知识，应该生产的商品数量、价格，可以运用理论经济学说明竞争机制形成价格，引导生产方向。(H.D. Dickinson; Price Formation in a Socialist Community, Economic Journal, Dec, 1933)

但哈耶克认为，即便这种理论在立论上没有矛盾，实际上是不可能实行的。首先企业管理者要作出合理的决策，负有责任对技术上的细节和原料的节约予以具体的关心。而中央计划当局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管理如此庞大数量的情报。这也与集权计算经济的官僚制缺少技术革新动力的问题有关。

第二，在计算找到合理的生产方法和合适的生产数额之前，必须搞清关于消费资料各种品种、数额的相对重要性的资料，情报。何况个人的嗜好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因而这种统计资料也需不停地修订，这种资料的搜集超出了人类的能力。第三，按得出的结果应该生产商品的数量至少也要达到数十万，这就需要求得与此相对的未知数，及“已知数”，要解这样的方程是“用现在所知的任何方式花一生的时间也解决不了的。”(《集权的计划经济的理论》221~225页)

哈耶克在这里强调能促使经济发展的知识与情报的局部零散的特点，着眼于价格机制将零散的信息在全社会内统一调整的作用，尖锐地批判了由计划当局搜集处理所有信息的社会工程学式

的设计主义的构想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哈耶克依据就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就人类可能处理的知识及情报的范围，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所表明态度。

从这种观点出发，哈耶克认为苏联的经济体制不可能合理地运行，1935年对当时苏联的评价“大众的生活状况比俄国战前更糟”（同前译文218页）；可以说客观地看这种评价是不正确的。到战后19世纪60年代苏联的迅速发展使人民的经济生活得到提高，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而后的苏联，东欧经济危机的恶化之中，哈耶克的这种对计划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批判，构成全面市场经济化的经济改革路线的背景，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概括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争也再次成为关系社会主义现时和未来的重大理论问题。

2. 社会主义经济合理存在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其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缺乏经济计算的合理基础，只能成为一种专横的，不合理的经济体系。

狄金生对于米塞斯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1933年的论文（前文已引用）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生产资料的合理价格，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进行了反驳。狄金生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概括。即，对市民用其货币所得可以自由购买的收费消费资料，代理贩卖行业人员可以根据库存的增减，调整价格的高低，得出各种物资的需求曲线，保持合适的库存水平，并将当时的变化趋势下的定货传达给生产机构。生产机构根据最终的消费资料所确定，并用于费用计算。每一个人的所得与其他所得虽然是平等的，也可以根据需要由社会加以决定。同时，对某种职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解决办法，可以通过变动对各种劳动支付费，调节供需关系来解决。而教育与职业训练必须免费，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受教育，增加当今缺少的熟练工种和需要专门技术的劳动力供

给，缩小个人所得的不平等。很多免费的社会服务也缩小了由于个人所得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实际所得不平等。

而狄金生以下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应考虑利息，这种主张也是意义深刻的。即，在铁路建设中，是否建设隧道代替山间绕行，要看追加费用在完工后运行使用中，相当于多少年将节约的费用。如果五年的话，当然修建隧道，若要100年的话，就不会修建隧道了。在投资时，社会主义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比较，考虑利息的分担问题。

但，这样的利息率应该如何决定，狄金生并未提供明确的说明。在新的消费资料与生产方法频繁创新的时候，利息率必然高，而在缺乏变化的经济状态下则相反、利率不会提高。这样是通过利率促进投资还是抑制投资，被作为战略决策的手段来运用。而且，人们认为作社会主义的特点，例如，上述举例中的费用比较，不一定用利息支付和负担来处理，在确定固定设施建设费的许可程度时，考虑投资的社会优先次序，不必各领域一律处理等点则是充分表现。

在狄金生之前，泰勒在1928年来，作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讲演时报告的论稿（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29）中，也以同样的方向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存立的可能性，主张生产要素价格的计算方法可以通过反复实践来纠正错误而达到目的。

即，在这里国家作为唯一的生产者管理生产活动，指导生产，从市民那里购得服务，付给予他们货币，使他们自由地购入商品。国家决定市民的货币收入，市民支出其得到的货币、接受国家的指示，进行生产。国家确定的生产价格可以充分补偿生产所必要的生产要素价格。在确定价格时，当局首先作出生产要素价格表，并以此进行生产活动，在表中找出评价的错误，进行订正，通过反复试行错误，提高各生产期间不足的要素价格，降低

过剩要素的价格，这样实现合适的定价和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

这种通过试行错误，寻找正确答案的方法，事实上回避了狄金生所提示的搜集情报、解联立方程的数学方法及哈耶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批判。兰格在1936~37年所写的论文(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October 1936 and February 1937)中继承了上述思想，对其论点加以总结，使争论点更加集中。

这篇论文中，兰格以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及选择职业的自由为前提，以消费者的需要体现，即以偏好作为生产与资源分配的决定基准。消费者的所得是由劳务的相对价格部分及由资本和天然资源所派生的所得分配部分所构成。后者的社会分配部分不影响职业的选择、劳动的分配，对于国民按人口均等分配或根据年龄、家属情况进行分配。在国民总所得要事先扣除一部分作为共同的积累，而后再进入分配，这种积累率是由中央计划当局根据战略需要而决定，这也是社会主义资本形成的一个特征。

在选择生产要素组合之际，必需选择能使生产费用最小的组合。其结果，单位价格中各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都趋向平均化。而生产的物品的产量则决定于边际生产费用与产品价格是否均衡。于是，平均费用比较边际费用低的产业可以得到较高的利润，而反之费用高于边际费用的产业则出现亏损，对于前者则课税，后者要给予补贴。在这一规则之下，产业与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生产，消费资料与劳务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其它生产资料价格则由中央计划决定。这样一旦决定了价格，生产物品的供给量和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则被决定了。

由于竞争的市场中的价格指标机能的结果，如同使供需达到平衡的价格机制一样，社会主义如果维持价格的指标机能，就可以同样形成客观的价格机制。中央计划当局所设定价格出现错误时，出现商品与资源不足的问题、要实现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必

须加以纠正。这样以计划代替市场机制是完全可能的。

正如哈耶克批判的一样，没有必要搜集所有商品的全部情报，解几十万个联立方程。象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消费者与经营责任者依据可能搜集到的价格情报，选择最适者就可以了。而且中央计划当局就经济整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要比从前的任何私人企业都可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可以比市场竞争更快地实现价格的均衡化。因此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公有资源及资本即物资的计算价格不能合理确定的米塞斯及哈耶克的主张并不成立。

而据兰格所论，不存在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与职业选择，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要生产和配给的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劳动者的就职也由行政决定，代替消费者的偏好，描绘出中央计划当局的价格曲线，就可能决定合理的均衡的价格体系。但是，这并非是民主的、推荐产生的。

兰格的这一论文，强烈地意识到哈耶克所批判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实行解数学方程式得出的决定生产资料价格体系，主张通过纠正试行错误去达到目的，回避了上述困难。这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算争论暂且告一段落。哈耶克在后来的《通向仆从之路》（1944年）等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已不提从前的论点，而将重点放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不相容之上。

本来狄金生、泰勒、兰格的反批判都是以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构成为前提，从消费者主权的自由的消费资料市场的价格机制及其决定于生产资料价格，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同样的价格体系与供需平衡实现的可能。而多布，斯威齐以马克思经济学为考察的基础，指出这一争论自身的局限，为证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和优越性进行了尝试。

多布在1933年的论文（Economic Theory and the Problems of a Socialist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Dec. 1933）中批判了这一争论范围所局限的经济理论是依据个人主义的个人偏好，将极为狭隘的目的函数扩大化，作为平衡条

件。接着又在《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40年）的第八章“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规律”中，对这种论点加以充实，作了如下论述。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争论中，根据主观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同样起作用。就经济问题的一般情况而言，两体制是同一的，应由同样的机制来调控是其内在要求。（同前书）

但是，在决定投资时，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统一进行，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只看眼前的技术选择及缺乏连续性、经济危机等等，使当前与长远统一起来，脱离资本主义的时间偏好，市场利率，制定发展计划（同前书283~84页）。这时进行费用比较选择生产方法，则有必要使不同的生产资料还原为同一质量，为此需要制订各种生产资料相对重要性序列表。

而这种序列表并非只有自由开放的市场才能制订，可以是权威主义的，民间调查式的，依各行业组织的情报等综合制订。而在货币工资的范围内可以将自由消费市场编入其中。根据生产物的相对价值和相对生产效率，中央当局进行资源及原料的大体分配。没有必要去编制和计算，哈耶克所批判的庞大的数学联立方程，具体项目由掌握具体项目情报的基层组织来决定，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调整生产资料价格。

可以认为，这些论点融合了泰勒和兰格的实践实证纠正试行错误的方法。多布在接受上述观点的同时，首先反对以消费者被动选择为出发点的价格理论，重视消费者对新开发的物资的消费及服务的主导权及扩大这种消费的可能性。在考虑社会投资的合理性，合适的决定可能同时，强调“本质上支配社会主义规律与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大相径庭。”他进而论述，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来说，价值论的“作用将会减少或消失，总之将迅速减少”（同前书305页）。这是接近马克思正统派的主张，即进入社会主义，依据资本主义经济成立的经济学任务终止，而被技术学取而代之。但仍可以认为，在多布所承认的以工资购买的消费资

料、部分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决定的有关理论和机制，只要尚保留一部分市场机制，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价值论就仍有重要作用。

在批判以消费者主权观念为前提的新古典派价值论的基础上，如何揭示劳动价值学说的有效性，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就这一点，多布认为，以生产为目的，进行资本资源分配的计划经济，会形成类似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价格的价格体系。他又进一步认为“但这不是平衡状态，随着资本的积累，社会生产设备的扩充，这种脱离劳动价值的倾向将趋于消失。”（同前书310页），这种认识是基于以各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向平均化方向发展的设备更新为前提的。不能认为，这里论证了技术选择的倾向决定如此。

多布在如下斯威齐所著《社会主义》（1949年）的第三部《社会主义论争》中，作了如下整理和评论。即，作为对哈耶克的答复“兰格的论文解除了就社会主义的资源利用能力的一切疑问。”（同前书285页）

但是，不必认为，现实社会主义一定要与兰格模式相一致。兰格的模式特征与其说中央计划当局成为计划机关，不如说代替市场中的价格决定机关，生产的决定象资本主义中一样成为无数企业单位的工作。这样的制度是可以设想的。但这并未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方面的可能性。

现实社会主义中的中央计划当局可以决定具体指令约束产业及工厂的管理者。正如苏联经验显示的一样，可以通过计算货币实行全面计划，而依兰格模式可以实现计算货币。可以设想，中央计划局下各生产担当部科，按兰格的企业自主决定原则决定。在消费者的嗜好，生产技术，天然资源的利用没有变化的静态下，任何体制下，最终结果都将相同。但如各条件不停变化，发展的过程就将在中央计划局计划体制与无计划体制下产生差异。总之，合理计算与资源分配的理论可能并不可能总实现保

障，常常伴随着不准确，计划错误、失败等。这种现象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的资本主义，无计划的协作大生产中也会产生，计划的社会主义不怕与其比较。

斯威齐对于兰格的无计划合作生产模式，从理论上揭示了苏联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合理存在可能性。在这里，他所论述的社会主义下对劳动和效率的刺激及扩大自由的可能性的论点也很令人感兴趣。本来，如前一章所述，尽管斯威齐后来严厉批判了苏联型社会中的党与国家官僚权力所固有的人浮于事的倾向，这与集权的计划经济不可分割。对于这种易于伴生的倾向，要密切注意。在中央计划局制定经济计划时，在尽量使权力向地方和企业分散的同时，如何确保中央计划自身的民主决策规则是极为重要的。而这里，斯威齐与兰格持同一观点，指出中央计划当局可能实现这一点；但没有论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与合理的价格与分配的关联。在这一点，可以说，多布与斯威齐在很大程度上原封未动地继承了奥斯托利学派的价格理论。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兰格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使用为背景，重新探讨了这一问题，在1967年的论文（*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 in C. Feinfein ed,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1967）中作了如下论述。即，从前的论文，如果今天来写，那就会简单得多。我可以对哈耶克、罗宾逊回答，那并没有什么困难，把联立方程输入电子计算机，立刻就会得出解吧。反复实践纠正的市场运行显然已经过时。”本来市场可以看作是通过反馈原理来解联立方程的独特的计算机。这并不是一个物理过程，而是通过社会过程解联立方程的历史上最古老的机构。于是，如计算机能力有限，则使用市场，市场的能力更广泛，并在制度上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相联。但市场的重要局限是只能进行静态的计算问题。对长期的经济发展计算问题则无能为力。而通过数学模拟程序设计，可以通过计算长期经济计划以有助于决策，计算机将起到市场所从未起到的作用。

这里兰格可能过高评价了计算机的能力，过低估计了计算联立方程之前搜集大量情报及整理的困难之大，消费者偏好选择变化之快。然而，而后信息技术的发达使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明显提高。自动条形码的识读技术，在此基础上的贩卖时点信息处理系统技术，等等使兰格的靠计算机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希望具有了更大的现实性。至少可以通过计算确定全局数值，将经济计划与分权化、局部化相结合，或者分为市场和计划两块的话，计算机能处理的部分明显大大增加了。

总之，这里兰格认为市场与计算机的机能可以互相代替是很有趣的。有这一特点，二者就可能以一方代替另一方的作用而相互补充。可以认为，这种可能性在当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信息处理技术的普及使用定货生产贩卖方式、信用卡系统，贩卖时点信息处理的技术基础更加充实了。

3. 市场社会主义论的展开

米塞斯、哈耶克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存立是不可能的。而持反对立场的兰格、多布、斯威齐等人，或多或少期待当时苏联计划经济的增长，并以此为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抽象基础。实际上，苏联经济与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严重的危机相对比，多次实现了五年计划，经受了严酷的世界战争考验，向国内国际显示了新经济系统增长的可能性。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存立可能性，与前章二种理论相比，实际在苏联经济中的运动与兰格模式不同（除去占零售物价总额的3%左右集体农庄市场价格外，基本价格计算体系并不因供需变化而伸缩变动，有投资与生产资料分配由中央计划当局集权决定的特征，多布、斯威齐理论方式较好地反映了该系统的特征。1962年9月《真理报》所载利贝尔曼的论文引发了利润论争，1966~67年苏联实施的就定价方式并未改变计划经济的性质。只

是在原价格上增加了利润部分作为计算的基础，从过去的单纯经营价格转为含有固定资产总额的生产基金，促进了固定资产基金的合理利用。（该时期有关苏联利润论争的主要论文的整理分析，可参照，野村一雄、宫锅帜、志水速雄所编《苏维埃经济与利润》，日本评论社，1966年）。

但这个时期，反对苏联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的党及官僚统治，要求民主化的东欧改革运动中，人们开始尝试希望有更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兰格模式及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被提出来了。特别是1970年以后，随着苏联经济东欧经济的衰退，危机的深化，苏联型集权计划经济的局限性，缺乏被人们指出，成了批判的目标，使人们回想起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争论，试图创立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加活跃，以下介绍有代表性的论点及争论的倾向。

匈牙利的柯尔纳依（Jans Kornai, 1928—）尖锐批判了旧苏联东欧集权的计划经济经常出现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缺乏的倾向，在《短缺经济》（1980）中对此进行了概括。其要点在论文集《不足的经济学》（盛田常夫编译，岩波书店，1984年）中也可看到。柯尔纳依认为，兰格的论文是论述市场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发生作用的典范理论。而与此相对现行社会主义系统的运行进行记述性的实证考察，揭示出短缺经济最重要的现实问题。

短缺经济的现象以三种类型表现出来。

第一种类型是卖方与买方关系中，买方产生的不足，对此买方被迫选择强制代替，借贷延期购买等手段。

第二是与中央分配机关的关系中出现的垂直的不足，这里也包括国营住宅一类的消费资料。

第三是企业内部物资和劳动力等关键环节的内部缺乏。

一种短缺很容易引起其它的短缺起连锁作用。而某种材料不足而其它材料未被利用的情况常常出现，未利用资源的剩余与短缺的相辅使其更易于增大。在能搞到手时就设法贮藏起来，家庭

与企业的库存大量增加，企业中也出现了过剩劳动力滞留的倾向。

这种不足经济的结果是，首先消费者的福利下降，第二、生产效率下降，第三、人际关系中卖方与中央分配机关独裁专断，人们只好过依赖乞讨的生活。第四、卖方与生产者处于独裁立场，买方只好永远排队，失去了生产的欲望。

产生这种短缺经济的原因之一是，要实现经济平衡的信息，决策意志及实施中的不充分与障碍。再者导致这种障碍的原因是，对企业行为放任的软约束预算。

企业的软约束预算由于下述原因而具有很大的伸缩性。①由于费用而调整的价格管理，②对于处于困难企业的国家补助，③伴有很多免税，特例的软租税制度。④永远可能进行事后谈判更改的软信用制度。在这种约束下，企业对于收益与价格趋势并不介意，易于积累过剩的物资和劳动力，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助长上述不足。而在消费生活方面，总是产生对于免费服务的需求，于是易于产生工资基金不足的现象。这些现象并非是现行社会主义运用政策可能纠正的单纯错误。这种现象在家庭中是以货币化经济为主体，在企业的软约束预算下是以模拟货币经济为主体，整体上是半货币经济体系。因此“从这种半货币经济体系向货币经济系统过渡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具有决定性问题之一。”（同前书36页）

柯尔纳依的这种短缺经济学在尖锐剖析苏联东欧集权的计划经济的现实问题时很有力量。但对于整体的短缺经济所产生的系统的理论和原因，并未进行明确的揭示。特别是从家庭经济看产生短缺的原因并不清楚。如免费服务，在英国所实现的医疗制度，如很多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免费服务一样，对于需求如能实现充分供给，就不能说这一系统自身常常产生短缺不足。人们认为，对不能充分供给的物资，服务实行免费的政策，维持短缺局面保持官僚的权威，经济增长停滞带来的财政困难及对改善短缺

的失望等也是其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工资基金的不足，货币工资过高，超过需求，软约束预算下未能实现企业的最适供给。最终出现不平衡短缺等综合结果，消费资料及服务的短缺的严重问题。当然可以认为，软约束之下企业的生产状况被正确评估，使企业自身不断地改善体质，形成这种机制，短缺问题就不会发生。

但对于柯尔纳依来说，这一实现企业自身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向，最终要以市场下的企业硬约束预算取代软预算，从模拟货币经济转为货币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确有必要由官僚来调整来保持分配关系的公平，扶植对社会有利的外部经济效果，抑制不利于社会的外部经济效果，对垄断势力进行监督，实现国有化，对官僚及市场体系的谨慎选择是必要的，大多领域中是二者的结合而不是分离。也不意味各占一半达成妥协。“一方面在形式上占统治地位，而另一方起修正补充的作用。”（同前书165页）柯尔纳依的这种建议，从内容上是以市场作用为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这一方向见诸于赛露茨基的大作《Marxism Socialism-Freedom, 1979》（日文版，宫锅帜、西村可明、久保庭真影译《社会主义的民主再生》青木书店，1983年）。赛露茨基1986年布拉格之春之前在捷克进行改革运动，而后在渥太华大学进行研究，其方向是扩大自由，实现彻底的民主，寻求社会主义理想的发展方向。

据赛露茨基的研究，马克思理论所揭示，考茨基与列宁所阐明的，以国家或工厂（伴有上下级指令关系）的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概念与另一方面水平相平等关系为基础的自主管理劳动，自由合作社会的社会主义政治概念是不相容的。

马克思曾论述“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今天做这个，明天干另一种工作。上午去打猎，下午去捕鱼，晚上去饲养家畜。晚饭后可以进行理论上的批评。而且既不

是猎人也不是渔夫，也不是批评家。（《德意志意识形态》p44）这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专业性的职业中是不现实的。社会的分工是不可能扬弃的。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规定“只有独立的私人劳动的产物才成为商品，”将生产者的独立性与私人所有，作为因果关系是不正确的。如在资本主义之前的诸社会中，商品交换在共同体间发生一样，使商品交换成立，既有生产者的独立性与私人的所有一致，又有与私人所有的不一致。

在这一考察的基础上，赛露茨基提倡，劳动者自主管理企业，在中央指示计划允许的市场范围内生产，根据各自对社会所作贡献进行分配，实现市场社会主义。这种主张是在反复研究马克思学派文献基础上，以重视政治社会的自由保障，以扩大这种自由为特征的。本来这种主张伴有市场社会主义概念为唯一符合其原理的体制之倾向，因而无视了苏联型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经济成就，也有对市场经济本身的不稳定性、收入差别扩大毫无批判地接受的倾向。如果认真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则应更深入挖掘社会主义的意义。

在1956~57年的经济改革中与兰格合作，而后由于政治原因而移居英国的布鲁斯（Włodzimierz Brus）曾著《社会主义经济机能模式》（1961年）《社会化与政治体制》（1975年）等，从东欧社会主义的理念与现实出发，主张劳动者自主管理的国营企业的市场所调控的自主活动与宏观经济的中央计划结合的市场社会主义。

布鲁斯的分权模式承认当时苏联中央计划机关直接决定增长率，积累率，及对共同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划分，对各地域的产业构造建设，对价格，工资、利息的直接及间接的调控权。预测企业在各自的范围内自主决定投入产出规模、生产方法，购入，贩卖的主顾和地点。可以说，一方面是利用市场实现企业的分权自主管理，另一方面在很大范围内承认中央计划的作用。

继承这一观点，英国的诺夫著《The Economics of Feasi-

ble Socialism》(1983)而后的时代,至50年代期间,出现了如下的社会主义构想。这并非空想,而是有可能实现的。首先对《马克思的遗产》加以严肃的评估,对马克思学派传统的浪漫空想的宗教要素持怀疑态度。马克思的价值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量化、机会费用,代替材料的选择等没有作出什么贡献。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些问题并不关心,认为使用价值与价值无法比较,将使用价值与价值不恰当地分离,导致了混乱。受到这种影响,苏联的价格依据费用来计算劳动,不计算使用价值,造成了缺陷。任何社会都应努力扩大费用与生产、成果的差额。离开货币单位,对社会有用的效果和使用价值则无法比较和计量。

苏联的产品达1200万种,计划数据达48000余。扩大选择范围则使预测精度下降,计划当局为此甚至排除或限制选择。而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中,依据马克思按劳分配的原则、怎样区分熟练与劳动强度。苏联以此为大级差工资的理由。认为排除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与计划则是单一的,透明的,这是马克思的极为不正确的看法。排除了商品生产,就意味着伴随着阶层的官僚制集中化。这与劳动者的参与相对立的,将导致异化。

从这一观点出发,诺夫研究考察了苏联,东欧各国、中国的经验,描绘了如下可能的社会主义草图。

即,政治上是周期的议会选举与多党制的民主主义。生产主体多形态化。应支持个人与集团为主导的经济实体。可以设想这些生产主体包括国家企业,自主管理的国家企业,合作集体企业,一定限制下的个人企业,自由记者、专门职业者,艺术家等等。生产资料不存在大规模的私有制。效率的评定难于取得一致意见,可以设立国家、利用者、劳动者三者的监视制度。同一产业内的竞争企业尽可能通过与消费者的交涉来决定生产活动。匈牙利的经验证明技术革新的专利有偿制度,比无偿更有利于技术的利用和转移。

中央当局计划的作用范围包括决定重要投资项目，通过银行或直接对重复的分散投资进行调整，设定关于电力、铁路，石油等由中央进行的生产部门，诸自由部门的大体管理规则，及保留介入权，对贸易等进行管理的职能。对有社会影响的重大部门进行调控和扶助，决定对GDP投资率及相关的保证储蓄的（课税或利润留成的）规则也是中央的任务。决定实现市场化的部门或免费物资及服务的界定由民主投票来决定。免费项目过多，则个人纯收入减少，投票也不会得到支持。

生产费用与利用者的评价结果之差总是体现为利润构成价格的一部分，差额地租、利息仍然存在。对于市场所产生的不平等，国家将地租、利息都收纳起来，对利润加以课税、制定所得政策。对劳动的报酬与平均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对于各种不同的劳动的供需关系、社会政策、采取刺激政策，对艰苦劳动的补偿等要素加以斟酌来决定报酬的差别。应提供充分的选择职业自由及变换劳动能力的机遇。应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工会应适应劳动节约的技术性的工作比率，保障工作的义务要优先于微观收益的目的。

诺夫所提倡的这样的市场社会主义，显然是强烈意识到兰格之前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争论，苏联型集权经济体制的窘境，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方向、分权自主管理、尝试可能被接受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要点和论据。

诺夫的这一著作的重点在于对重大理论问题的价值论的理解。据诺夫的分析，苏联型集权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价值论将使用价值与价值不恰当地分割开来，认为使用价值无法比较计量所致。这里仍然有以边际效益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为依据对马克思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米塞斯以来所表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争论的模式的影响。但诺夫所谈到的，使用价值以货币为单位用价格来计算，这是一种朴素的误解。

除了奥斯特利学派的初期理论家，包括边际效用学派也不认

为效用可以计量。假设消费者的预算制约线与无差别曲线，或者预算制约面与无差别曲面的交界点，以一定的相对价格为前提各种物资的最大需求量一定，某种物资的供给量低于(或高于)这个标准，市场价格则会上升(或下降)的自由竞争市场中，价格上升(下降)的诸条件之下，仍然常有该物资的供需的过剩(或不是)表现出来。并不能说，该种物资的使用价值与效用因此而增大(减少)。

这种市场价格的上升(下降)，在一般的可能再生产物资的场合，促进供给的增大(或减少)，通过这样的变动，成为市场价格重心的价格。即，在社会的再生产技术关联中客观地决定的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斯拉德体系中的平均价格。如史密斯、李嘉图以来，人们反复指出的一样，除去由于对于需求的稀缺性而交换价值发生变动的古董以外，经济生活中占绝大多数的重要产品，尽管有极大效用、因其生产费用低廉，单位交换价值也小，有同样效用的物资也因生产技术的发展而生产费用降低，单位价值减少。

宇野派对马克思的价值论进行了考察研究，对价值实体的劳动社会量关系与价值形态的价格关系在理论上加以区分，对其关联进行了考察。从其研究结果来看，社会主义中不实现等量劳动交换就没有公正和谐的经济秩序的看法并非天经地义，也没有必要设定包括平均利润的含于生产价格中的劳动量交换基准。

通过费用价格处理的 $C + V$ (每单位产品中从生产资料中过去的劳动时间的转移部分与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所要补充部分)劳动时间必需由各产业来分配补充， S 的剩余劳动时间部分无论是通过价格来交换，还是社会分配，都是可以自由处理的部分，由于是社会主义则无必要作为平均利润来处理。搞集中的计划经济也好、搞市场社会主义也好，产品的价格与其背后的劳动时间的关系、本来就包含着这种灵活性，应该这样去分析理解。

苏联计划中如果有理论基准的缺欠的话，那么并不在于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说本身，而是在于其僵化的理解而导致不恰当的运用。例如，诺夫也批判了直接依据劳动时间决定价格的想法是苏联型经济不可能实行的。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经济计划，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实现，实际费用为依据的国家定价与其劳动时间的关系从未得到正确的计算和处理。

对于诺夫所提出的苏联型计划经济中难以对于消费者的选择提供合适对路的供给问题应加以考虑。在理论上，对社会必需供给的短缺物资、在价格固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从库存、定货率，设备运转率等指标中发现。这种情况在各垄断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也发生过。对于社会性消费进行非市场性需求供给调整，对于教育与医疗等方面，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苏联型社会并非没有成功之例。

因此，对消费者的必需和要求，怎样提供合适的供给，其解决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即便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猜想，以何种形式在何种领域通过市场实现灵活的供给，而这在何种意义有益于人们福利的提高，都要经过研究和民主来决定。

在计量和比较经济效率时，如何计量各种投入要素的费用，用何种单位比较产出效果，这是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争到诺夫所一直强调的问题。诺夫在这里也强调自由的市场价格是不可或缺的，由供需变化而变化的市场价格来作费用与产出的客观尺度，实际上是不稳定不合适的，有寄投机市场的走运倒运为尺度之虞。在这一意义上，反映客观再生产的技术结构的价格体系，相对合适有益吧。特别是生产技术革新的削减费用效果，因此至少有一部分企业成员获得超额利润的分配，这种刺激如果强化，在某种程度上稳定的价格体系下，才易于确保其效果。

理论上，由费用构成的价格总额的后面，可以承认劳动时间比较计量的可能性。在反映其再生产所代表的技术体系的价格体系形成后，物资的同一单位或同样组合的各种物资的生产费用价格的削减，说明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投入费用，生产出更

多的产品。这也意味着，普遍地同一(过去及现在的)劳动量生产更多的产品，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达，基础生产资料每一单位的劳动时间可以计量的话，通过各种物资每单位的生产所必需劳动量的不同生产方法直接比较，就有可能决定劳动生产率的技术选择。也可以通过库存的变动，定货，抽样调查，直接来搞清可能追加利用的物资、劳动力应增加多少及消费资料与供给的先后顺序，而不依靠市场价格变动。

而要通过价格体系进行经济效率比较加以改善时，如果只将作为生活费的劳动中的货币工资部分计算在内的话，这种货币费用不能正确反映劳动费用的变化。其结果如马克思指出有节约劳动费用效果的技术，在低工资的国家与领域则难于引进(《资本论》第一卷13章2节)，这种技术选择倾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产生。要避免这一点，作为货币费用，要将在生产费用上作用的活劳动时间的货币评价的全部(即、单位时间的劳动者平均生产额，工资、社会性消费、积累基金的社会剩余中用于货币所得的评价额)，或者至少要系统地算入必要劳动的货币评价，据此价格体系算出经济效率的方法，在社会主义中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吧。

一定的货币费用及劳动费用所生产的产品种类发生变化，新产品开始生产，宏观经济的产品种类发生变化时，对整体经济生产效率变化的测定，经济效率的计算，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伴随着困难的问题。为方便起见只好与类似的旧产品相比较(如机能得到了改善，相当于旧产品的1.2分，作方便的换算)，看作是每单位的费用被节约，效率得到了改善，或一定的投入费用下产出量发生变化，大大增加，宏观上产出结构发生变化，实际所得增大。这种方便计算方法，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统计实际国民所得时，劳动效率变化的数值中所包括了，并非社会主义所固有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能说，通过价格测

定，计算经济效率的意义总是清楚明确的。

诺夫还指出在计算经济效率时，在按劳动成果分配时，怎样将熟练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相比较也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难题。但他的观点，即，该问题由市场评价的劳动成果，劳动的供需来决定，由工资来决定。这与他另一方面的观点，即，所得政策要保障某种程度的收入平等与雇用机会均等难于统一起来。特别是以什么作为收入平等的原则，在经济学上没有明确的根据。

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一样，严格区分熟练劳动支出时间的意义与熟练劳动的再生产培训费用问题，前者是简单劳动与同样的人的劳动力支出时间，即单位时间的劳动。就责任重大者和努力工作者是否给予物质激励，在报酬上予以考虑与否，可以由社会来决定。把差别看成由于能力不同而支出的劳动量而造成的。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训练费用可以本着机会均等原则，由社会负担。

诺夫非常重视社会平等的原则之下，劳动者的积极参与。这样看来，务必全面引进市场的论据，在理论上是没有充分的说服力的。要依据消费者的需求而供给，并以经济效益为尺度，诺夫的这一理论，否定了劳动价值学说，而要求依据主观价值论的观点进行计算。以此为社会主义的模式显然过于狭隘了。重视消费者的选择，但并没有考虑怎样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主义的消费者被动选择地位问题。这也是以新古典派价格理论为基础并将其绝对化的诺夫的局限所在。

4. 关于市场与计划相关联的反思

诺夫的《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描绘了在后来改革过程中，被认为有重要引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英国杂志《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由

此开始了一场争论。这使人们想起四、五十年前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论争，只不过这一次又进一步提出了更具当代意义的新论点。

该杂志1986年1月号发表了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论支持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化》，对诺夫的观点加以全面的批判。他认为，对诺夫的问题要作出妥当的答复，有待于遵循马克思的方法，依据现实资本主义内所产生的诸要素的发展，特别是劳动社会化的进展而决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厂内的劳动计划、规模和数量将增大，垄断资本主义和计划在企业中，很多工厂中将得到普及。进一步发展成跨国企业。劳动市场的分配也因此而减少。计划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基本方式，各自同其独特的政治形态相结合，既有专制的计划，也有民主的计划。

近十年来，出现了反凯恩思主义的倾向。将市场作为本质文明的代表。这对左派也产生了影响，承认市场，对计划的怀疑，对社会主义的危机感。苏联、东欧、中国的经济职能的缺欠是由于历史条件未成熟，在任何重要的意义上，这些社会也难以看作社会主义。相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实现计划的物质、技术和人的条件。

诺夫认为苏联不可能实现1200万余种产品的合理计划。必须实现市场调节生产与分配。但是，在曼德尔看来，当今资本主义各国大多是以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的市场信号变化，维持一定的消费模式与既存的生产技术而生产。其中定货生产也起了很大作用。消费者的平均消费的至少80%与物价变动无关而独立地发生作用。富裕的工业国家往往在食品、服装、鞋袜的消费上处于饱和状态。基本的人均，食物热量摄取、布料面积，鞋袜的数量开终下降。而饮食、服装、住宅、取暖、上下水，教育、保健、上下班的公共交通工具、最低限度的休假设施的需要量，已成为各国各时期的客观条件而被利用。这也成为可以不经过市场，易于进行计划生产和分配的条件。货币与价格虽然仍被使用、但已不

再是竞争性的无政府的市场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类似于市场的关系。

不能说没有竞争的市场就没有技术革新。迄今为止的重要的产品与技术的革新，勿宁说是在竞争的市场之外，由于知识性，科学的好奇心与节约劳动的生产者的自然倾向而实现的。在这样的条件的基础上，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为经济增强而提供的资源数量，免费分配供给的物资及服务的范围，货币所得的水平与差距的大小等，国民生产分配的主要决定，由表明各种预测选择结果的草案一起，每年经劳动者大众评议会民主评议通过。只有专制的劳动管理和市场经济可供选择，并非真实。第三条道路还是存在的，即，民主的联合计划自主管理，共同的生产者计划自治。

曼德尔的这种评论，依照马克思派的传统社会主义论，与登布、斯威齐的观点相比较，将市场与计划看作对抗性的经济形态，认为只有通过分权的劳动者自主管理联合组织，当今只有在先进国家才有可能实现。

对于这种观点，该杂志于1987年1—2月号发表了诺夫执笔的《市场与社会主义》一文，进行了反驳。诺夫认为，曼德尔对于包括多种投入的由分权来决定，多企业参与的复杂关系的计划之难度并无了解。只设想出无具体内容的民主解决，没有短缺的丰富的世界及生产与消费模式毫无变化的静态均衡，并无任何意义。曼迪尔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并未提供解决的方法。

接着曼德尔以答复诺夫的形式，在同一杂志1988年5—6号上发表了《市场社会主义神话》的文章。即，诺夫所强调的苏联经济的失败，并非中央计划的自动产物，而仅仅是计划不周的浪费，错误的管理所导致的结果。从资本主义各国的历史经验与其本质来看，维持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对之加以有效控制，避免失业与破产的灾难倒是不可能的幻想。

诺夫若在本身所需要资源与分配的保健，教育、公共住宅、

邮电、城市交通、环保，给排水，道路，照明及清扫，公园等项目上，添上文化服务，情报服务，基本的饮食、服装等，就占了民间支出的70~80%。如废除私人汽车，在城市的大街上设置每三分钟一次的小型公共汽车，对于整个社会不是利大于弊吗。诺夫还无视所谓需求弹性值为零或负数时，物资的市场关系丧失意义的论点。他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威胁，对生态的破坏，第三世界的饥饿，北半球的大规模贫困是市场经济所无法解决的。

问题并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观点（并无正确的定义）的经济效率最大化，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关于人类应从压迫中求得解放的，人类的共同目标，即决定自己命运的争论。

继二者的争论之后，该杂志于1988年7—8月号发表了奥尔巴赫（P. Auerbach）、迪塞（M. Desai）、桑沙瓦里（A. Shamsavari）三人的共同论文《从现存资本主义的过渡》作了如下评论。即，从西欧的社会党、共产党最近的倒退、逆流来看，发达的资本主义诸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反而成为问题，难以实现。对现存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加以评论的同时，指出经过50年左右的平静之后，市场社会主义将再次成为重要的分析的对象。曼德尔在批判诺夫时按照马克思派的传统，将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劳动的市场分配将会彻底减少作为重要论据。的确，企业内部人员组成更加精锐化。但是，这种发展并不能证明市场作用的逐渐缩小。企业的计划工作的作用对于市场的相对增大，附加价值的销售额相对会上升。从1880年到1920年期间，这个比率上升了，但后半世纪期间看不到上升的倾向。

在现实世界上出现的，并非是计划与市场的排他性关系，而是二者并存的辩证关系。如，不仅在企业内部，在行政方面也促进了零部件商品的、有计划的规格统一，标准化，使市场得以扩大。在钢铁产业，最近十年间，有碍于传统的垂直的统一联合的形成，依存于铁矿石及化工燃料的世界市场的倾向在增大。这总归

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钢铁业的有意识计划的结果。而很多巨大企业模仿市场法则，在内部形成了多分割的构造。丰田公司内的透明管理方式的，企业内及企业间的资本主义的计划，与调整的胜利显然是出自于市场的压力。

迪塞认为，这一结论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支持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实施广泛的计划的论据也可以从此推演出来。在需要作出合理决定，需要市场信号的时候，社会内部的有机结构必需作出恰当的整备，苏联的经济改革只靠行政改革是不会成功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在对投资资源总量进行管理的同时，也对重要的特殊部门进行重点投资。不仅要处理市场社会主义者指出的“市场失败，适应现存市场的需要，而且要面向未来，进行积极的计划和革新。中央对调整企业投资，扶持研究工作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将当前根据企业需要所开展的教育培训的“人的能力开发计划”反转过来，根据国民的需要改造企业的劳动作业(条件)，这是最革新的经济计划吧。使人的潜在力量发挥出来才是社会主义武器库中最有价值的武器。

迪塞的这一评论，直接按照曼德尔的马克思学派传统见解，将市场与计划理解为排他性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发展中计划的比重将增大，市场的作用将减小，因而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好了准备。这种评论的着重点在于消极的方面，这是著者本人也承认的。就人才能力开发方面，计划经济的可能性的论点，是令人感兴趣的，也是对诺夫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结果。

埃尔逊(Diane Elson)的论文《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的社会化》登载于1988年11—12月号《New Left Review》上，文中对此争论作了积极评论，她一方面赞同曼德尔的市场与官僚体制所定的计划之间仍存在第三条道路，另一方面又指出市场价格机制是不可缺少的调节手段。其出发点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观点。重视人的作用，以家庭劳动及无酬劳动为其核心。从这一观点

出发，通过使用价值政策，家庭经济与生产者协会等组织共同参与、制定计划、决策。诺夫没有这一观点，对工会组织抱怀疑态度。

埃尔逊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派不将劳动作为目的，而只看成为手段，不了解在调解过程中与其他生产要素相区别的意义。而劳动力并非作为商品而造就，是不能充分商品化的商品。注意到这一特点，如何恢复人的能动性，诺夫认为，拒绝买者，另外可以通过交涉实现，即交涉模式的市场。很多场合，市场中买方的选择自由不过是，事先所指定了物资种类范围内既定价格实现。所谓通过交涉模式保障消费者满足的诺夫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可能，不如称之为空想。在将市场作为社会具体制度时，就现有的理论经济学方面，关于市场和计划的文献所提到的，交涉模式，买卖双方之间的竞争股市方式等由经纪人所组织的市场，这三者都具有非现实性，应该重新探讨。其要点之一就是如何形成市场的情报机能和其费用问题。哈耶克也设想，在市场中无需任何费用而获取情报，后人也继承了这种观点。

但市场机制只传达隐密决定的结果。对我们并不公开其意图、愿望、评价，这是市场无政府特点。于是形成了行业团体等，在商贸中交换有关计划、信息等。但，这种信息是不完整的，搜集情报的工作有重复，这也是资源的浪费。

另外，从批驳将市场与计划截然分开的市场出发，要注意到欧昆(A·Okun)所称为“看不见的握手”的作用，即默契、道义的承诺、信用与互惠、私人关系等非正式的关系等一切行为。很多关于日本，韩国，台湾经济成功的文章都指出了这一点。资本主义之下，这种“看不见的握手”常常成为“看不见的监督、管理”。应该从这里得到启发，从这里寻找实现共同协作的第三条道路。

按埃尔逊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是独立的变数，通过积累一定会出现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变

革。到那时，作为家庭经济生活的选择与自由的基础，在下述方面，首先是保健、教育、给排水，再者是城市交通等等，由于相互的依存而需要免费提供服务。第二是要确保基本生活需要的衣食住，购买消费品所需的货币收入。

第一种免费服务，还应加上电脑、电话、复印机等信息网络的利用作为公共设施、以利于形成市场信息的平等、自由利用。工资委员会则为人才需求，求职者提供便利，促进有关信息交流，确定浮动工资，以反映基本工资，民主的职务评价及需供趋势。价格委员会则以单位平均成本加上反映不同产业的加价率，算出其基本价格。与其说是兰格模式，不如说这更接近于卡列茨基(M. Kalecki)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重新探讨价格基准时，则要公开情报，依据反映成本及库存变化的需求变化而进行。低于平均成本的低成本企业，可以得到扩大再生产追加资金，提高对其职员的奖励刺激。

关于消费支出的主要品种，型号，可以得到详尽的信息。消费者协会则进行家庭生活与生产，销售企业间的调整。情报的自由利用，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实现人为调控的关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始形成这种网络的雏形，进一步可望通过公开情报和自由利用情报来讨论和决定下述有关问题，市场的调控，环境问题，保护消费者利益，选择国家的产业政策等。

埃尔逊的这一理论，与曼德尔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有所不同，可称之为对诺夫构想相近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然而，她将诺夫构想转换成马克思及人道主义的观点，归结为市场的社会化。这里，埃尔逊设想出平均价格之上的加价价格基准，并未排除新古典派的供需论的价格基准的影响。她又着眼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特殊性、重视在发挥劳动者主观能动性方面企业管理与生活资料的补充方式。这一构想里也包括了女性经济学者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主张，即，使消费者主权成为现实，确实是社会主义的义务。与新古典派经济学对市场的抽象理解相

反，将市场作为具体制度重新考察时，值得注意的是，她强调经济情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企业为中心而支离破碎，有隐蔽的倾向，而将实现其对社会公开，自由利用作为社会主义人为调控的关键。可以认为，这是对诺威以来，一系列争论的较为恰当而又有价值的评论。

5.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多样性的可能

始自于奥斯托里学派者、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合理的经济计算观点的一系列争论，对西欧经济学界的社会主义论一直给与了巨大影响。与其同时发生的，理所当然，苏联型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挫折等过程也成为论争的背景，对论点及内容的变化发生很大影响。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将回顾其简要过程，提出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总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要注意到，实际上价值论作为考察的基准，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争论和研究的全过程中，始终受到考验。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争论中，米塞斯、哈耶克等主张，这种经济计算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以边际效益学说与生产资料归属理论为自己主张的基础。而相反，狄金生、泰勒、兰格等人也从同样的价格理论框架出发，进行考察，提出了社会主义合理经济计算的可能。当时对于苏联型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予以积极评价的登布、斯威齐没有明确表示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其主张的根据。

最近西欧的市场社会主义主张者重视分权的经济决策的同时，也出现了以诺夫所代表的，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给社会主义经济带来了混乱，强调在决定价格要素中，包含利用者评价的需求的作用。对此加以评论的曼德尔、迪塞、埃尔逊也并未直接论及价值论。三者参加了1970、1980年代的价值论论争，(该论争的概略，可在拙著《现代马克思经济学》、社会评论社，1988年，第

五章中谈到)，对萨缪尔森 (P. Samuelson) 及斯蒂德曼 (I. Steedman) 的马克思价值论批判作了答复。然而，作为马克思价值论和生产价格论的理论支持者，在整个争论过程中留下了无法解决的理论缺欠。

前面，我们就诺夫关于价值论的主张进行了探讨。并明确了弥补这些缺欠的努力方向。对于古典派经济学的自然主义劳动价值学说，马克思的价值论显示了明确劳动过程的意义的潜在可能性，这一过程是实现所有社会中人类与自然物质代谢的媒介的原则过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多样的模式，也可以灵活援用该理论的含意。不能将马克思的价值论简单地看作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则，解释成是严格实现产品的等劳动交换，支持苏联型集权的计划经济，以计算原价为依据，由中央决定的僵化的价格体系的理论。

例如，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产品的相当一部分要由竞争的市场来买卖。但是，另一方面，就投入产出核算体系深层，各种产品怎样被对象化而分配，有必要依照劳动者的主观积极活动，以对经济的积极管理为基础，加以理论的分析 and 思考。并应尽可能地运用情报信息技术，得出实证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将产品的基准价格看成是由费用价格部分与超出的剩余部分所构成的。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必要劳动部分中，只要存在共同的社会消费成为较广泛的免费服务现象，货币工资率就应因此而下降，只以货币费用支付为原价就会产生系统地对活劳动作较低评价的倾向。为更好地预测和决定技术选择的基准，劳动时间与价格的关系，如前所述，有必要将活劳动时间的货币评价的全部，或者至少将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评价作为计算成本的基础，算入在内。如果作到这一点，由于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有利的产业则超出于成本出现剩余，不利的产业则低于成本；货币费用支出与成本之差较大，因此出现低于原价的企业并不会立刻出现难以支付对社会等公益

负担费用及难于维持生产的局面。在将必要劳动时间部分的货币评价算入的场合，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当于费用价格的成本则成为基准。对比的加价率不必作为平均利润率，而是如埃尔逊所指出的一样，有意识地反映经济计划的战略方针和供需的趋向，依产业而有所不同。

而对于采用优良生产技术或利用有利的土地原价生产低廉的企业所产生的特殊剩余，即是由于土地差别而产生者（相当于级差地租）可以收为公用。对于由于技术原因而产生者，可以将其一部分归入该企业成员的特别收入，以促进技术革新。总之，在引入市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于依据成本计划表现的基准价格，反映供需变化的所许可的市场价格变化物资及服务种类及通常的价格变动范围与其结果所产生的货币剩余的增减的处理规则相配合，由社会来决定。

在这一方向上，构想劳动时间与价格关系之际，认为所谓熟练劳动与复杂劳动同样都是劳动力支出的形态之一，简单劳动与劳动时间的评价设定级差的必要与理论根据并不存在，这是本书所反复强调的。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充分实现社会免费提供教育与职业教育，免费培训服务。这与理论基本是两个问题。

市场社会主义的收入平等要与社会消费部分的扩大相适应，是社会主义超过资本主义的重要目标。我们对熟练劳动的时间评价是基于理论上，视人类劳动为经济活动基础的社会主义观点，以及对这一观点与平等原则的统一理解。为了促进各种行业间的自发流动，特别是为供给不足地区及责任重大的职业提供物质激励的方便，引进在一定范围内拉开收入差距的政策也是可行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构想将一部分产品交给市场竞争的市场社会主义，还可以采取分权模式，以价格体系为基本参数之一，中央有计划地，或模拟市场的作用而决策。不管根据何种价格体系，搞清其深层的社会劳动量的社会关系，努力计算测量劳动时间与分配收入的关系，重视信息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运

用。这将有助于搞清各种价格体系的社会职能及其变更的可能性、意义。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或相反高度发达的，实现了高生产效率的社会中，如果历史、社会条件合适的话，则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可能通过民主地运作而成为合理运行的经济模式。可以构想各种经济组织模式因领域不同而被区分和组合。

以新古典派的价格理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论，毕竟不能理解马克思价值论的这种普遍性；近来，又表现出以下倾向、既从苏联型集权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判定是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欠缺，认为没有竞争的市场，就不能实现经济的合理运作。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局限于狭窄的范围之中。而且，在这一范围之中，一旦包括了实现收入平等，发展社会性共同消费，保护环境等问题，则成了前后不一致的模式。可以认为，如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恰当地加以运用，则会理解到该学说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克服了新古典派理论的社会主义论的狭隘与不统一。

第二，与此相关，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争论，发端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可能合理存在全面否定，人们从各种观点出发，就特定经济组织的存在方式、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各自作出了唯一合适的构想，并表现出相互对立倾向的。可以认为，这是由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苏联型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唯一正确的组织形态。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论争中的结果。但是，传统的苏联型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大大降低，随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能的理论模式的构想和选择的范围大大增加，人们就可能更广泛地充分地依据各种社会历史具体条件，民主地选择和改变相应的经济组织。

依据全面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原理，相反而演绎出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排除市场经济，成为自由的人们的共同体。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当时就有必要参照考察其原理的基本标准。而应该看

到，当今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与基于原理的构想有本质区别的，是所谓的阶段论，属于分析考察现状的问题。

从这种重视现实多种可能性的观点出发，应该看到，不应将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绝对化、只注意社会主义的政治压抑，而看不到苏联型集权计划经济在一定时期曾显示出勃勃生机，并具有某些可能的条件。而相反，将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及其局限性加在一起作为当前可能的一种选择来探讨，也不应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叛逆。

人们通常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中，如果消费资料与服务的价格不是根据需求，在自由市场上变化的话，就不可能有合理的计算经济，和对技术革新的激励。虽说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来自于民众的现实选择，但将此视为实现计算经济，促进技术革命的唯一可能模式，则是固执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狭隘偏见而已。

社会共同消费应包括教育、保健，其他等。到何种程度，社会性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应维持在什么水平，共同消费及积累基金的一部分是否要从对工资的课税来征收。要实现收入平等的原则，保持劳动的积极性，进行必要的劳动分配，如何设定工资级差，并考虑上述因素及允许范围。例如，就这些问题，尊重地方自治体及劳动者自主管理企业的分权决定；利用自由竞争市场可以提供很多物资及服务的分配，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计划，管理的课题也有了更广泛的选择余地。埃尔逊所强调的情报公开及其供民众的利用的市场社会化，也是可供选择的重要途径之一。也许现在正是需要理解和回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性究竟应放宽到什么程度合适之时。马克思学派对于新古典派经济学的优势之一，就在于理论上分析和理解历史，作为系统的体系，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第三，苏联、东欧、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各自走过了自己的道路，而今正朝着同一市场经济化的方向前进。特别是东欧经历过1989年的，剧烈的政治变革之后，曾为东欧改革派的市场社会

主义构想也迅速地失去了支持。出现了哈耶克与福利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流。这似乎是资本主义经济与视其绝对化的经济思想之胜利。相反，人们认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思想理论，在理解并指导现存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方面似乎已失去了作用。于是，要确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与现实社会主义各国的政策方针的实践关系和意义的話，不用说过去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就连对此持批判态度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也似乎失去了意义。

例如，最近布鲁斯与拉斯基(K. Laski)所共著的《从马克思到市场》(From Marx to Market, 1989)中，改变了一度所持的市场社会主义立场几乎全面承认了市场经济化，对由此所产生的经济变化和失业问题，主张要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第五章还要谈及这一问题，即布鲁斯近著的观点，在其祖国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政策纷纷向右转的情况之下，失去了支持。但这一状况并不能说明布鲁斯的近著及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失去了现实意义，这与资本主义主要国家纷纷改变政策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状况，并不说明凯恩斯主义失去了理论的现实意义。

东欧各国和苏联在重新构拟其经济，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全面市场经济化。但这些国家能否迅速实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土地及其他不动产的私有化，采取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措施，迅速实现公正，特别是能否形成令广大劳动者满意的经济秩序，还令人担心，并充满了荆棘和危险。苏联、东欧的劳动人民大众之中，可能会再次萌发出向往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及愿望。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孕育着未来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及理想，保持其丰富的多样性，在资本主义诸国中反复涌现，搞清其特点对于人类史的未来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从描述的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别入手、在理论上克服社会主义者内部反复出现的分裂，抗争这正是可能避免以上不幸

历史的好时机。

第四，在构想与探讨，孕育着未来可能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前景时，必须重视资本主义世界所随时发生的情况。特别应注意到日本的实例，即70年代后，渡过危机，重建经济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意义重新在增大。

日本经济的优势，其先进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在于日本型的经营。日本的大企业从终身雇佣制，工资的年功序列制，各公司系列内部工会组织等三个方面，稳定劳资关系，树立职员意识，实行岗位班组制，轮换作业内容，提高学习效果，使其职员掌握多种技能。以此来提高劳动者的能力，并以此为前提，在企业内形成广阔的劳动市场，形成了所有正规劳动成员都可能晋升的制度。这与质量管理，零缺欠运动等车间小组活动，提案制度，重视岗位协作人际关系一起形成了提高劳动者积极性与参与意识的机制。这里不正是包含了，劳动者的合作，能力的开发，主体的参与等重要积极因素吗；这不仅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经营管理有参考意义，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自主管理企业也有学习和发扬的必要。

进一步从长远的眼光看，在经营战略、企业间的协作关系、政府、官吏、财界的协调体制，并非单一的竞争市场关系所能代替的经济组织的战略方针及相互关系也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组织的运用与调查提供了极好的参照。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所产生的商标条码识别技术 (POS point of sales) 使人们能根据需求动向在生产、供给、库存方面作出迅速的反应，由多品种大量生产方式转向订货生产方式，并通过信用卡方式来确切掌握消费者信用，消费需求的动向。可以设想，这也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情报处理及灵活调整的可能手段的补充。利用信息情报技术，使生活协同组织的力量增大，正使非资本利润动机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合作成为可能和现实。前面提到的兰格所指出的以计划机制取代市场的可能，在技术上与社会性方面具有了更多的现实

性。

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日本型经营的特性也局限于公司中心主义的狭隘范围之内，成为劳动者的共同性。其优势在于作为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努力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改善其财政状况，而在世界上臭名昭著的超长时间劳动，长时间通勤，以至于常常发生过度劳累而死的状况却难以改善。尽管由于信息技术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而实际工资水平却被控制于停滞状况，没有提高。（见拙著《逆流资本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1990年）批判企业的方针，并批判与企业合作的工会的方针，只是少数派工会成员在车间的活动，或个别人的活动，并受到压抑和歧视。经济不景气的反复发作与泡沫经济的破灭等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一直与日本经济相伴。在政官财的协调体制中不断出现了洛克希德事件，里库路特事件，证券丑闻，商社与银行间的不光彩事件等成了不断产生腐败与渎职贪污的温床。

与日本经济的现实相对照，寄希望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来实现，对于劳动人民公正的、富裕安定的经济生活，依然具有巨大的意义。从日本资本主义所存在严重问题的深层，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发掘其内部所出现的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可能性与积极机遇，重新兴起以人类未来社会为目标的生机勃勃的思想、理论和运动，这正是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也是应尽的国际贡献和义务。

三 社会主义的现实

第五章 新自由主义能救东欧吗？

1989年东欧革命到底如何？我带着这个问题，1990年5月20日从东京出发，历访了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途中在英国停留三周左右。“柏林墙”的倒坍所象征的急风暴雨般的东欧各国的一系列自由化、民主化进程，一反所谓的以马克思理论与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世纪潮流，似乎宣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

这是人们应该接受的一种看法，《文艺春秋》在登载了斋藤精一郎译布鲁津斯基的《大失败》之后，对包括我的七名马克思经济学者进行了采访，其中心问题也是所谓的“失败”。对此问题的回答，七人虽各自政治立场不同，却一致认为，“失败的是具体的苏联型社会体制，并非直接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和思想自身、而进行新的社会主义尝试的机遇却从这里诞生。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并未充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勿宁说，为了今后探讨的便利起见，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巨大问题本身作出正确简洁的概括。例如，从经济面，东欧诸国的体制危机始于何时，其由来及人们在什么方面作出克服该危机的努力、如何看待这种努力，有无成功的可能，及其对社会主义未

来的意义。就以上诸点，东欧经济学者如今提出了什么问题，西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又怎样对待这些论点。就东欧的社会变革必然性及意义，如何正确理解，认识。在回答这一课题中马克思学派的有效与否也受到检验。

1. 东欧革命缘何而起

(1) 经济危机的程度

东欧发生的1989年的一系列市民革命，包括了下述相关联的三方面要素。①对压制的旧体制的反对及实现民主化、自由化的要求。②反对苏联维持的压制的国际秩序，要求实现民族自治独立的愿望。③由于经济发展停滞与危机所引起的人们对当局的反对。

这种出自于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反对，及要求克服危机的民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决定的动因呢。关于这一点，东欧也因国家而不同，至少不能说成是直接动因，象①与②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例如，按人均国民总产值（GNP）来算，与24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东欧诸国的发展水平确实很低。其中最低的波兰竟达不到资本主义24国平均发展水平的1/3。苏联也大体处于同一水平。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东欧国家出现了人均收入水平低于或接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1/3的，诸如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对贫困，并因此产生了危机和革命的动因。

也许是因为出访之前，听取了很多人的劝告，说东欧城市里经济短缺，供应不足，连手纸也要自带。而我所到的城市中，日常必需品都较充分，没有看到很多排长队的。衣食住的基本经济生活所需，供给稳定、充足，这是我的印象。

当然按工资水平换作外币来计算的话，则极低。例如：按1990年1月的汇率50%以下的波兰来算，1美元合9300兹罗提，平均工

资约96万兹罗提，大约103美元（一美元按140日元算，约14,000日元）左右。仅此而已的话，大体上与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差不多。但是，正如经济评议会的扬·明钦尔教授所指出的一样，这是由于外汇市场价格过低评价了波兰货币，再加上基本生活费中由于补贴费的缘故，很便宜。例如，住的费用：位于市内便利地区的教授的约72.7平方米的公寓，每月租金约7美元，（约1000日元同），去离住所130公里的大学，乘特快一等车厢，往返只要2美元，音乐会的入场券只要其1/10，（约三十日元）左右，令人感到，这是可以过安定生活的经济秩序。至少比起从名义工资的国际比较的直接推算来看，东欧各国人均国民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要高得多，要强得多。政府的补助及价格调控都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重要原因。

匈牙利的巴库斯·瓦勃尔等也认为，在旧体制下，人们的经济生活，由于食物廉价，其它消费品价格也相对稳定，从数量上看，与西方各国的生活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别。问题是最邻近的维也纳，可以看到的高级音响等电器产品，彩电、轿车等耐久消费品的质量上的差别。这些物品具有一种显示效应。假设有一种屏障能遮盖这些现象，那集权体制在经济方面也可以继续运作了。

在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捷克和东德，更是如此了。我们从苏联，中国的实例出发，常常认为，集权经济体制常常在农业问题上碰壁，农业的集体化，合作化受到了挫折。而在捷克、科学院的欧塔·切尔库教授指出、集体化的农村中经济生活可以得到补助，比起城市的工人来生活更加安定。因此，在农民中对体制改革后，削减补贴极为不满，支持共产党的人较多。

这些感想是反对共产党一党统治，支持东欧变革的学者们所想，这一点应加以注意。即在他们看来集权的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秩序是站不住脚的，但并不是对生活造成了破坏。勿宁说，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能将生活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并维持其

稳定。这是他们客观所承认的。

回顾历史，更使人强烈感到，不能说集权的计划经济本身是无效率或负增长。这是因为苏联、东欧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在七十年代中期，虽不及日本那么高，但比很多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统计数字上要高许多。

(2) 集权的经济增长所需社会成本

东欧的经济学者在论及这个问题时，虽然基本认识是同意的，但都要加上两点。

第一，苏联、东欧的经济增长率在统计上有人为操作的因素。对此苏联已开始了重新审查，但东欧各国还未开始这项工作。有人说要向下修正2%左右，这也未必正确。第二、就是加以修正，仍能取得较高的增长率是由于在集权的计划经济之下，付出了重大的社会牺牲，支付了巨大代价的缘故。其具体内容包括什么，则因人而异。

第一、集权的计划经济，在苏联、东欧的一党统治之下，党与国家官僚管制之下，实际上压制并牺牲了劳动人民的基本人权、自由、民主的权利；而维持下来的。1956年的匈牙利动乱，68年的布拉格之春，80年的对团结工会镇压的历史显然是这种牺牲的例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劳动者的改善劳动环境和条件则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了。

第二、在集权的计划经济，官僚主义的运营之下，只以生产资料的数量扩大为重点，而难以实现消费资料的增产与品质改良，连可能达到这种目标的技术革新也难以得到实现。其原因在于，将“第一部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优先的规律”作为依据马克思理论得出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另外，避免大幅度改变前一年基础上的生产总额，只是在目标值(定额)上稍微增加一点。这又是由于各级官僚要明哲保身并企盼晋升的社会体系所致。其结果，大大牺牲了消费生活，消费方面出现了明显的短缺现象。按邱卢克教授的说法，要剖开经济增长的实质，来进行评价，其中

存在“隐蔽的通货膨胀。

第三、经济生活的基础、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而又不许人们对此进行批判；以致极为严重。例如、东欧某工业地域由于汽车尾气毒害，儿童毫无例外地患病。日本对东欧的援助，首先应着手解决这一类问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冲击，西欧的绿党运动的刺激，东欧变革的推动力，即市民的讨论会运动中，生态保护也逐渐成为重要的争论要点之一。例如，捷克的科雷尔大学的兹狄内克·唐纳教授讲，正由于没有空气污染、原子能发电站在原有的两座的基础上，又增加两座，正在建设之中。对此市民的讨论运动中未必没有强烈反对者，这将成为今后引人注目的争论之处。

总之这种在社会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之上，在曲折中，维持东欧经济继续增长，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转为负增长，或转为勉强的实际年增长率1%左右的低增长，迎来了比停滞期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要低的停滞和危机，这也是一个应该搞清的问题。

(3) 石油危机的冲击

东欧经济的巨大经济背景就是来自于苏联经济的停滞和危机。而且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与停滞也大大影响了东欧经济，造成了东西夹击的局面。

如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托马斯·希拉博士回顾的一样，自1973年末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之际，东欧国家的人们相信由苏联得到的石油供给不会发生提价的问题，而该地域的政治领导者也这样宣布了。正因为如此，经过一段滞后时间，苏联依据世界市场价格进行了石油提价，产生了很大冲击。而从东欧来看，提价得到的巨额石油款项的大部分，则被吸收作为与美国进行核军备竞赛的费用而使用。但，结果是，苏联无法承受与西方军备竞赛的负担，1983年前后，随着石油价格下降的打击而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以苏联为中心的旧体制走到尽头，与其说是集权

的计划经济失败，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方面的原因。

还有作为其背景，如美国的马克思学派的领导理论家P·斯威齐与H·麦唐佛在新版的《革命后社会》(社会评论社)的《补章》中论述的一样，改革的背景，即苏联的经济危机达到了支持其经济在数量上增加的供给潜力，劳动力与天然资源的界限。在此背景下，由于苏联原油供给的大幅度削减，东欧在伊拉克军队攻击科威特而引起的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暴涨的冲击下，受到巨大打击。英国《时报》(1990.8.7日)报道，东欧全境有可能陷入不景气之中。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互经会内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制中，东欧各国的工业生产进入80年代，由于苏联经济的停滞而出口萎缩。原向苏联出口的大轿车，收音机、船舶等主要出口商品不得不转向西方国际市场。但，这些商品在亚州、拉丁美洲、非洲又找不到合适的市场。70年代似曾支持东欧经济增长的西方借款，由于扩大设备投资而未能形成增加出口。8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停滞，高利率和极累债务的增大，东欧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通过石油危机发展到经济危机的过程，人们反复努力进行了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产业技术革新，使经济再次恢复了活力。而相反，苏联东欧在官僚统治下的集权计划经济，可以实现数量上一定程度的增加。但缺乏灵活的应变能力和引进新技术进行革新，来应付国际环境的剧变与危机。这也是东欧的经济危机所存在的根本问题之一。

2. 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吗？

(1) 怎样克服东欧的经济停滞呢。

东欧各国中，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政策潮流是一切依靠市场经济的作用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下的压制，追求民主化，结成工会或论坛，这一过程中，经济改革并未由于新

自由主义而受到损害。而可以认为，沿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以社会主义经济的变革和搞活为目标，具体实践上引入市场原理成为主调。

但是，通过1989年之后的东欧变革与其后的总选举，共产党失去了统治地位，党员及支持者人数激减，新政权与其追随的工会和论坛的经济政策基本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向新自由主义，视社会主义为旧体制加以全面否定，将国家的统一计划、调整，介入都看作非自由的，无效率的，加以否定。东欧各国的指导经济思想从以共产党领导下的集权的计划经济为教义的立场，转向主张进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进而又转向新自由主义，主张将所有的经济问题交给自由的全面的市场经济的作用来解决。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多次跳跃，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2) 新的国家教义

眼下，新自由主义的旗手F·A·哈耶克，M·富利德曼，成了东欧各国所公认的教义，经济学教科书也纷纷采用了他们的观点。从这一点可以说，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信条的撒切尔高呼“东欧的变革正是我们的信仰和体制的胜利”，也是有根据的。

出生于波兰·精通东欧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W·布鲁斯与K·拉斯基共著了《从马克思到市场》。布鲁斯主张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他的观点为苏联东欧的改革派及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参照，并对其产生了影响。但面临即将发生的东欧变革，他的观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与拉斯基写下了这一著作。即，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在政治体制方面必然会留下无法协调之处，因而不得不引进市场，实行全面的市场经济化。但与此同时，必然会出现投资动向不稳，失业问题严重的局面。于是，凯恩斯，柯列奇所强调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将发挥重大作用。

布鲁斯的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东欧的经济改革方

向。然而，若视此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话，那么与凯恩斯的资本主义作何区别呢。对这一问题，我认为，用布鲁斯的论述来回答的话，即“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资产的统一所有制。而现在我认为，这与适合市场经济分散的所有制的关系是可变的，开放的（open-ended）”。

市场经济有可能与各种资产的所有形态，以其各种可变的结合而存在。这是马克思学派今后在理论上，应多方面加以探讨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布鲁斯大胆提出的就观点与全面市场经济化形成了对资产统一所有的承认，又主张有必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他的主张在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仍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几乎无人支持，即便有也是极少数。连布鲁斯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3）过火的转换

看来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似乎取得了全面胜利，而实际上潜在着一些困难并很脆弱。

本来东欧的经济思想的大转变，是对于在旧体制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的集权计划经济的反动而产生的。而这种经济是在党和国家官僚统治之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来维持的。这种国家意识形态显示了某种脆弱性。例如，捷克国民经济中央研究所的凡博士认为，支持旧体制的官僚制作为遗产还根深蒂固，市场经济万能的新自由主义作为新的正统教义在研究、教育、论坛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趋向益发明显。尽管推行市场经济化也未必一定要全面实行彻底民营化与私有化，也可以实行各级公共资产管理、扩大合作社为方向。这是与上述布鲁斯的观点相通的论点。但报纸上一发表凡博士的含该观点的文章，立刻收到三位政治官僚的警告。

劳动者、市民追求自由的变革运动，在政治体制的革命方面得到成功，但其结果并未清除官僚制的遗产，新自由主义作为教条的国家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吧。

也可以说，是从对旧体制的教条国家意识形态的反对，向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转换的过程，也使人想到，这是在社会内容上尚未充分实现的自由化，未完成的革命。

总之，这不能看成是允许多种见解和交流共存的健全的民主主义社会形象，显然这里存在着某种脆弱性。正如R博士指出的一样，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消极作用太多。在东欧无论是群众还是政治领导机关中都再也得不到支持了。但纵观资本主义各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没有社会主义左派的存在，则民主主义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东欧的现状说明，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作了过低评价。

而东欧各国由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和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向新自由主义，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大飞跃，这是什么原因？

由旧体制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走向另一极端，可能产生激进主义。如布鲁斯的观点急剧的变化所显示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各种经济体制都是可变的，还带有不协调之处。而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能代替集权的计划经济能达到整体统一的经济模式。也有人认为，要以瑞典型社会民主主义为目标，在经济上则力不从心。熟悉东欧问题的维也纳国际经济比较研究所的R·狄兹博士指出，东欧各国的改革在寻求政治社会体制的民主化过程中，缺少经济理论的准备，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案与安排。

同时在80年代，在东欧的经济严重停滞，人们开始意识到与西欧的经济差距的10年中，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统治了西欧资本主义世界，这对于东欧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应该指出对于东欧经济思潮的现状，资本主义各国的左派要负未能系统地提出说服新自由主义的代替方案的责任。

(4) 从汤中能得到鱼吗？

当前在东欧各国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标榜着自由市场经济，但是何时在何种程度上能现实化？而其结果可

能是实际上实现为民主而战斗的人民所期待的民主吗？

在东欧各国中实现民营化最充分的匈牙利，波兰，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私人企业在15%以下，即85%以上是国营企业与地方企业所生产。民营化所需的手续及必须的法律上的准备都未有充分的计划和打算，法律工作者的人数也不足。

在市场经济化准备比较充分的匈牙利尚有如此大的困难。如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T埃尔道斯教授担心的一样，为解决这些问题，联合政府与组成联合的各派力量未必会统一步伐，而是关心，通过向旧所有者归还资产来解决经济危机是否有效的问题。

现实中，除了被西欧合并的东德以外，东欧各国的全面向市场过渡，正如资本主义发展期的原始积累过程一样，不可缺少的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作用。然而，东欧变革后各国的联合政府都是由各种不同势力相异的立场而联合结成的，因而对于强有力的政治家和有果断决策力的政治领导干部倒是常常拒绝的。据埃尔道斯教授认为，1948~1949年的经济体制变革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实现的，而相反这次反方向变革极为困难。东欧的汤很好喝，但正如人们所说，在匈牙利现在则是“从鱼可以烹调出汤来，从汤却不能得到鱼”。

斯威齐与麦唐佛就苏联改革警告说，认为一揽子市场化是万能的速效药的想法是一种空想，与这种困难相似这也适合于东欧的改革。推行民营化，就会出现明治政府将官营事业转卖给民间一样，很可能产生公有资产的不公正，或不公平的分配的现象。在削减补助金及改革价格体系，工资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会由于通货膨胀而引起生活不安定，另一方面由于所得重新分配中的幸运，不幸而产生收入差距。

例如，1990年7月在废除食品补贴时，据说将食价格提高到30%~80%。而当时的补贴每月人均约140克朗，这在当时的通货膨胀下，有多少价值呢。对农民的影响又如何呢？这些确实都未

考虑过。东欧各国同样急于实现外币的自由交换，也会带来外国商品的激烈竞争而导致失业增多与企业的破产，外汇短缺，外贸金融上出现困难。在东德，这些困难正在出现。

这样，新自由主义的一揽子市场化方向，难以实现，从过程和结果上看，资产与收入的分配出现了不公平与巨大差距，很可能给经济生活带来不安和冲击。这将会给推动东欧革命的主人公、民众的大多数人带来失望。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推行新自由主义10年的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反对。90年代，在人们强烈期望新的经济战略的状况下，东欧的新自由主义也或迟或早不得不重新评价。东欧的经济学者中也有很多人认为，二或三年中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与其作为现实政策而成功相结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3. 东欧变革与马克思学派

东西欧的马克思学派，对于东欧变革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1) 东欧马克思派的苦斗

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下，东欧的马克思派显然处于极度的困境之中。访问了数名各国的经济学者，在新自由主义肯定派增多之中，至少其中有一人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主张社会主义是正当的，他极为担心由于新自由主义而全面资本主义化，会使大多数劳动人民中产生什么。

例如，东柏林洪堡大学经济学部的R·孟狄雷阿斯博士即持上述观点。他认为，现在大学中，学生们只关心能否到西德的银行就职，而马克思的理论很难教授了。但他仍想开设《资本论》课程，从凯恩斯后的观点到现行的经济动向，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内容广泛的讲授，这是使学生注目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最合适的方式。从长远来看，通过与西欧马克思派的交流，建立

联盟，讨论环境问题，区域不均等发展等问题为契机，可望实现东欧马克思派的复兴。

在批判共产党统治的旧东欧体制的理论家中，反对新政府的新自由主义，通过批判和研究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作准备，不断努力掀起新的社会运动的倾向，令人注目。虽改名为民主社会党，而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人数大减，尽管如此东德还有40万人，其他东欧各国至少，每个国家都有10万人左右。这样的党已不再是以前那种可以升官发财的机关，而有可能在周围严肃的批评声中，认真摸索党的新生。

由旧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确定的，作为国家事业进行的马克思全集（MEGA）的編集发行也从党和国家分离出来，成为有高度学术意义的工作，为此设置了基金以使其继续进行。就此西德的报纸也曾大篇幅进行了报道。但是，而后旧东德马克的基金由于向统一的马克的转换得不到承认，马克思全集出版的事业由于资金困难很可能夭折。（日本也被要求对此进行支援，对此的支援活动正在由百万支援日本委员会在进行。

（2）马克思学派的东西交流

受东欧新形势的影响，马克思学派的东西交流之门也被开放，成为今后的令人瞩目之处。如，在西柏林由西德马克思学派的一个小组，福尔库斯·尤尼主办的“社会主义的死亡—社会主义万岁”双意义标题讨论会在1990年6月初的周六，周日召开，东德的马克思学派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一千余人参加，在政治、经济、哲学、人道主义、生态保护等广泛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样在六月的法兰克福，召开了以社会主义和自然科学为题目的东西德左派共同研究会。据说，要以此为契机，号召东欧各国也来参加，结成国际研究交流组织。探索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努力，可能在东西欧融合过程中获得新的活力，这是人们广泛承认的。

西德柏林自由大学的阿尔托法塔教授回顾道，在旧苏联东欧

体制下，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旧苏联型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西欧马克思学派，一直持严厉的拒绝态度，如过去一直不允许他进入东欧各国。对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倒很容易接受。其结果，作为对旧体制的一种反动，如今新古典经济学派在东欧各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教义的状况下，对其能进行有力批判的理论家无望诞生，也没有吸收西欧马克思学派对新古典派批判的成果。实际上，东欧的经济学研究者对于70年代以来，发生的欧美马克思经济学复兴的理论状况一无所知。似乎也没有传播这些情况的文件和杂志。马克思学派的国际主义大大落后于资本的国际流动。但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3) 英国马克思学派的反应

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学派也应该在批判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重新探讨苏联东欧旧体制走入困境和走向崩溃的意义，社会主义重新兴起的可能性。奥克斯福德大学的A·格林与F·哈里地在《新左派的登场》(1990年3—4月号)上以对谈形式发表了本书第二部分第四章的最近的争论和F·哈里地的《冷战的终焉》，对谈中的如下一段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苏联东欧经济的失败是相对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70年代经济危机后，以技术革新而恢复了经济的活力，而相反东欧苏联陷入危机之中，与资本主义体制相比，缺少从社会内部进行技术革新，克服困难的机制，问题就在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能否形成克服这种缺欠的系统。

从30年代的经验看，J·A·熊彼特曾认为，资本主义丧失了技术革新能力，在这一点上与社会主义相比，处于劣势；这种状况在现代的经济危机中恰恰发生了逆转。可以认为，这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性质有关，如何理解这种状况的意义，确实是对社会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东欧很多经济学者指出，离开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中，难于在理论上衡量效率高低。在同一技术基础上，量的扩大过程不成

问题，而怎样进行技术革新，怎样衡量其效果的问题。格林提出了一种影子价值。离开市场经济的经济效率尺度问题，与如何保证技术革命的动力问题，一起成为马克思学派在重新考察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之际的一个重要基本问题。

1990年7月13~15日在设菲尔德召开了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学会(CSE—以英国的马克思为中心的经济学者集会)的每年一次的大会。就如何认识东欧的变化，成为参加者全体所关心的讨论题目。

会议首先在沃利科大学由萨蒙克拉科作了以下述内容为中心的报告。即、我们西欧的马克思学派对苏联东欧旧体制持批判态度，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又认为这种体制要比资本主义优越，期望其不久将成长为健全的社会主义，而有不能彻底进行批判之处吧。

东欧的失败，并非是计划经济的一般，而是应该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中的计划体制。在那里军事部门压迫民需部门，难于进行必要的改革、黑市泛滥，各级部门特权膨胀，腐败加剧。由于世界金融体系的作用，对东欧各国和第三世界各国造成累积债务，加大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东欧的变革就是在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尽头所产生的人民的反抗，于是国家的职能被普遍拒绝，出现了期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化的空想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利兹大学的赫高·拉狄契刚刚从美国回来，他指出美英的左派都对东欧的变革保持了相对沉默。这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认为对东欧的旧体制不应支持，而且对变革之后的东欧也不敢苟同，或者作为马克思派在其内心正在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重新崛起的努力。最后拉狄契指出，我们应以此为契机，更深入地批判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用的理论与现状，同时应不囿于非此即彼的二者择一，而放开视野广泛灵活地进行选择。在这种场合，作为马克思学派要抱有自我批评的态度，重要的是不仅对马克思派内部的各种潮流进行研究学习，对

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丰富多彩的源流也应进行研究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第二部第三章4节中，A·诺夫开始的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争论与研究表明，马克思学派对于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与理论的重新构筑所作的尝试事实上已有了进展。学会的参加者们的研究和交流也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争论。

这样东西欧的马克思学派都在加紧对社会主义的危机与未来和一挑战性课题进行研究。勿宁说东欧旧体制的崩溃正是这样一个好的机会，使我们能重新对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批判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建社会主义的尝试。以这种态度来对待这一课题，与世界的马克思学派携起手来，正是日本社会科学界所应作的努力。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

1978年以后，十亿多中国人民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经济混乱，发展商品经济，提高经济效益，以物质文明建设为目标，掀起了经济建设的高潮。我作为日中友好交流协会第14次访华团（以菊池昌典为团长）的一员，于1986年7月28日从东京出发，到8月8日的12天时间内，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地，略见了中国经济之一斑。城区与近郊的道路上，终日自行车人流不断，早上上班高峰时间的十字路口，从四面八方汇集的自行车人流蔚为壮观，这些自行车都是中国生产的。女性的服装也多彩艳丽，打扮的很漂亮。街上沿途的摊店也是鳞次栉比，自由市场买卖红火。

各名胜古迹处集聚了来自于地方的游客，巨大的故宫也因而显得狭小起来。几乎每四、五人就有一人带有相机。我们所到之处，仅仅是巨大中国的极小一部分，所交谈的对象也极为有限，但感到中国人民都对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充满信心。

(1) 翻两番计划和搞活农村经济

在1986年到1990年的第七次五年计划中提出，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国民生产总值（GNP）7.5%的增长目标，在五年中增长44%。并以此为经济改革的基础，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1980年的四倍1000美元的翻两翻的构想。这一大胆构想是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次五年计划，达到了实质GNP

年均增长率10%，工业生产总额12%、农业生产总额8.1%的成果之后提出的，可以认为是具有现实性的。

在世界性不景气之中，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停滞，很多第三世界国更陷入经济困境，苏联东欧经济也从停滞转向危机，而中国的经济如此生机勃勃，令人瞩目。对于十亿多人口中约八亿都生活在农村的中国来讲，发展经济的基础，首先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振兴。

正如人们常常指出的一样，生产责任制将土地分田农户承包，取代了人民公社的共同耕种，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增产的效果。农业内的专业分户也受到支持和奖励。在上海北部近郊的嘉定县农村访问了当地农户，看到了稻米，棉花，养猪，养兔等多种经营，农活主要由妇女操持，从297.5平方米的土地中，每月平均可以得到80元（1元约当时的430日元）的收入。丈夫在附近的工场工作，月平均125元的收入。这样加起来并不低于市内双职工的收入。而且粮食，生活费多比较便宜，城市近郊的生活总是较富裕的。

在农活休息时间和我们谈话的农户的家庭主妇，看起来很健康，她的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高中毕业的儿子要是考上了大学，就让他继续读书。”“人民公社那阵子，就是盛夏也得按时下地干活，太辛苦了。”干农活的时间能自由掌握了，这也使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农村也开始使用农药，引进了小型农机具，开始注意节约劳动力。

在有限的耕地上推行节约劳动力政策，会使中国的农业与能源成为多消费型，导致地力下降，产量下降。同行的团员中的生态学者高桥史树教授对此特别忧虑。而且会使一亿多农村过剩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因而，目前中国农村重视扩大工业生产的方向，提出了“去农不去乡”“入厂不入城”的口号。嘉定县从1980年五年以来，就业者中进工厂的比率由26%上升到53%。

增加的收入被储蓄起来，准备儿子或女儿结婚用，据说备置

家具和宴会等，要花掉1万6千元左右。与年收入相比，这一是笔不小的款项。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60年代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70年代是电视、电风扇、沙发，80年代是彩电、冰箱、洗衣机。家庭生产责任制承包土地的合同是15年，如果承包顺利还可以继续承包。

(2) 城市经济的发展

在杭州访问了一家生产中药胶囊及片剂的药厂，是一家1060名职工的成功企业。这是一家国营企业，在改革中实行了厂长经营责任制，职工的雇用合同每两年更新一次，对于懒惰者可以解雇。职工平均年龄为29岁，其收入包括工资与奖金约每年1450元。工厂利润的55%上缴国家，剩下的约300万元的4成来扩大生产，二成作为奖金、福利费，研究开发费用。福利费用的使用包括，养老金（退休人员），上班月票的报销，对300名职工以每月3~4元的价格（约130~170日元）提供公寓住宅等等。设有工会与工会主席，但似乎主要管调停车间的纠纷，管理学习和体育活动。

访问的北京等城市，随着工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的发展，来现了建设热，到处都能看到高楼、公寓，道路的建设和改造工程，特别是北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深圳给人以深刻的印象。1980年设为经济特区，几年来由2万余人发展到40万人的城市。似乎旨在吸引1997年归还的香港的资本。实际上外国资本的投资中，来自于香港的投资占压倒优势。第二、三位是美国和日本的投资。似乎并未对日本等外国资本抱有期望。

究其原因，也是个有趣的问题。如据华强三洋总经理的迁井利之讲，中国工人的户籍变动许可手续复杂，因而深圳地区劳动力不足。产品出口有固定的比率，这也是经营上不利的环境条件。如能有对日本中小企业可以安心投资的政府支援窗口，那还会好一些。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中国予想到日本将来的出口竞争，回避合办经营的投资，工人也希望掌握技术回到原地去。

(3) 鸟笼与鸟

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以土地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国策的中国，商品的自由买卖，自主经营权的扩大能到什么程度？如1982年以来的“鸟笼与鸟”的争论中看到的一样，尚有理论上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就价格体系的正常化来讲，作为费用计算基础的工资价格本身，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低廉的房租，公共服务而维持于低价格水平上，不应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费用价格+平均利润），直接作为正常价格。其中一定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状况及根据其需要进行操作的余地。不能将这种操作余地直接当作价格体系的不正常扭曲来理解吧。

中国的经济改革处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这一定义也易于引起混乱。确实商品经济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是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但这并未成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和其发展阶段。而只是在资本主义才形成了全面一贯的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不能形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历史阶段的概念和关系。可以在内容上理解为、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而利用商品经济，或者当前处于扩大利用的时期。用语也有脱离实际，误入歧途之虞。

就这一点与中国的学者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但这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随着今后的交流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理论和现实都应加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史的，中国的未来所要解决的令人瞩目的课题。

2. 怎样看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1) 与苏联东欧改革的对比

海湾战争后，冷战结束的世界格局中，1991年3月25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与戈尔巴乔夫的访日，正处于全世界所关注苏联、东欧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向之际。

1984年如暴风雨般的东欧改革的进展及而后东欧各国向新自

由主义政策的转换及其景背的苏联改革之下出现的政治经济危机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但苏联东欧的旧体制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不是其唯一终极的存在方式。如斯威齐在《革命后社会》（社会评论社出版）中阐述的看法较为合适，即苏联型社会已转化为一种与社会主义相去甚远的阶级社会。以重振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最后不可能成功，是否只能向资本主义化方向前进，相反由于东欧与新自由主义的现实条件相去甚远，具有空想的一面，因而通过混乱和经济危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回归到承认市场与国家的计划经济及公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的社会主义方向上来。这也是今后令人瞩目之处。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对一切困难的万能灵药，而对社会主义的广泛可能性视而不见，只能说是目光狭窄。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现代化的经验，值得本文反复研讨。与中国相对比，1985年苏联开始了改革，共产党内部以情报公开化及推行由上而下的民主化，在政治与外交方面以改革为重点，东欧各国的改革则引起了更广泛的民众民主化运动，导致了打破共产党和苏联统治的局面。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由于市场经济化的经济改革所发生的巨大困难。除了被统一的德国之外，与其需要解决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相比，东欧各国与苏联政府所形成的政治领导部门的权限和实力，都由于民主化而在各派力量的争斗中被削弱。结果，苏联与东欧各国都陷入计划与市场之间，苦于市场与计划的职能不健全的经济危机，无法解脱。

相形之下，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避免使包括党与国家机构的关系的政治体制发生急剧的变化，而实行商品经济化，解散人民公社，落实农业及各种企业的自负盈亏生产责任制，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等，使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一步。这样回顾起来，1989年六月的天安门事件显然具有与现存社会主义

改革路线所完全不同的意义。

自1987年以来，中国制定了经济上每10年使国民收入翻一番的计划，为此每年平均增长率要达到7.2%，10年中实现了年平均增长率9.7%的高速增长，因而比较而言，尽管还存在很多压制的问题，这些成绩还是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体制改革是在稳定的强有力的政府之下推动的。

没有稳定的，强有力的政府的支持，可以设想，就不会有，变人民公社为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广泛引入商品经济，1800万家以上的乡镇企业的诞生，城市企业的生产责任制与基本建设投资的分权化等等。所需资金的连续供给等经济体制的变化和由此而实现的高速增长，不能不伴随有种种利害关系的对立，收入差别的扩大，权限的重新分配等，因而不引起政治社会的波动与动摇，也是难以实现的。

(2) 翻两番计划的混乱与整顿

终于在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在未期出现了原料，资材的不平衡，不足的倾向；由于伴随投资计划过热而出现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投机交易等，1988—89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以上，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混乱，出现了窘境。人们不禁认为，翻两番的中国经济现代化步苏联，东欧之后也受到了挫折。

但，这一混乱也在天安门事件前后的紧缩的经济停滞之中，90年以2%的低膨胀率而转为平静，经济体制的治理整顿基本取得了成果。而且在这期间的实质经济增长率维持在4%左右，给人们留下了中国经济发展相对强劲的印象。通常，人们认为与苏联东欧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天安门事件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也将给中国的对外开放，经济现代化带来巨大的障碍。然而，治理整顿只有在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下才能进行，并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的成果。引进外资，抑制膨胀，治理整顿确有其效果。

(3) 第八次五年计划以后的展望

1991年3月25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治理整顿的成果

之上，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七中全会）决定的草案，1991年1月发表的第八次五年计划（1991~95年）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年计划纲要为主要议题，经过了讨论和通过。在这一计划中又一次提出在公元2000年实现国民总产值达到80年4倍的奋斗目标。

但要达成这一目标，设定了年均增长率为6%左右的目标，这不但比过去十年的实质增长率低，就是比经济改革开始时的增长指标7.2%也低得多，这是现实的可以实现的目标。1990年制止了通货膨胀；还达到了4.4%的增长率，今后，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冻结贷款的解除，重新对华贷款，投资，技术引进，煤炭、石油、电力、粮食等计划的增产得到实现，要实现新的目标毫无困难。

相反从80年代的经验看，财政自主权分权下放到地方和企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由79年的31.9%下降到88年的19%，地方与企业间争夺资源与资金，投资计划超过宏观指标，与此相关的中央财政巨额赤字成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从这一点来看，分权投资的超额比重更容易超越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的可能而引起混乱。

第八次五年计划与十年计划纲要中提出，当前要维持中国社会经济的安定，强化中央集权、初步确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展示了从片面市场经济化，分权化的改革路线略略后退的现实主义路线，也可以说是警惕谋求民主化的方向会导致共产党统治的崩溃。也反映了为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有必要重建中央财政、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投资的系统管理。

这一方向能否确保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人民的支持，实现冷战后的和平共存，这将是重要的一环。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路线，在东欧苏联都带来了经济的混乱，人民对该路线的幻想也产生了疑问。而在中国则很有可能，在总结80年代末本国混乱的经验之后，重新评价社会

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其现实的说服力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然而，要在这一路线下使经济改革取得成果，则要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铲除行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中，党与国家官僚的特权和维持既得利益的无效率和不公正等弊端。但其实现方式完全可以不必追随苏联东欧，必需由中国独特的改革方式而产生。

就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至少我们可以预见其中期具有多种发挥发展战略的可能、尊重其独特性，注视其未来，这也是我们应该回答的基本任务。

3. 恢复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1) 治理整顿的结束

东欧苏联的体制改革使共产党的统治结束，在以全面迅速实现市场经济化为基本方针的同时，陷于市场与计划的狭窄缝隙之间面临着经济困难和严重的危机。与此相对，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其经济体制改革相对看好。这正从反面说明，所谓东欧苏联旧体制的崩溃显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体制之下不可能实现现代经济的生气勃勃的发展的见解完全是错误的。

例如，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中国经济十年间以年平均增长9.9%的实际增长率飞速发展，不能简单地看作市场经济化的成果。而应看作，人民公社的解散，耕地落实到农户的生产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出现，国有企业的承包制，私人企业、集体企业的发展，基本建设投资的地方分权化等改革对经济活动给予刺激，这些涉及到种种权限的再分配与利益关系，只有在稳定有力的政权下，坚持土地和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才能避免大的混乱，逐渐实现高速发展。

但由于经济过热终于导致了通货膨胀，1988年以后出现了混乱。人们都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可能会发生大的变化，而通过治

理整顿，中国经济仍然维持4%的增长，在较短的时间里遏制了通货膨胀，为下一段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一基础上 91年3月制订了新的第八次五年计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这一计划中提出，把实际年增长率压低到6%左右，在本世纪末实现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980年的四倍。九月末，李鹏宣布从88年秋以来的治理整顿结束。不可忽视，这一成果来自于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维持稳定的政治体系的努力。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着改革与民主化的课题。而面临着民主化也并非意味步东欧与苏联的后尘。

而中国人民对东欧苏联的剧变抱着极大的关心，同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与经济增长重新充满了期望和信心。但对这一切相关的现实条件如何，在执行中又产生了何种偏差和困难，我带着这些问题，于9月11日开始了历时一个月的访问。其中包括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社会科学院及当地的大学，共16所研究教育机关和6家工厂，也倾听了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及中国经济学者的各种意见。

(2) 现代化的步伐

86年访华时，中国人开始接受商品经济的刺激，给我留下了无数人骑自行车开始同时向现代经济生活迈进的印象。经过五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生活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城区近郊的道路上，到处都是自行车、摩托车、面包车、卡车、轿车，机动车的大潮不断涌来。汽车尾气的污染也多起来，交通阻塞在广州也很严重，在其他地区也开始出现了。

五年前来中国，在旅馆中每日三餐都是中餐，现在很多设有西餐部的旅馆建立起来了。街头也能买到面包，饮食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中餐饭店也好，街头的食品店也好，都能买到可口可乐，雪碧的罐装饮料，陈列在玻璃的冷藏柜中，放置于醒目的地点。用纸杯喝只要一元钱(合约26日元)，在街头要3元。与其每月200余元的基本工资相比，罐装可乐可能被认为是奢侈品。

但，自动生产线大量生产的易拉罐厂家、广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中方出资65%，香港、美国35%的合办企业）的生产能力为年产5亿罐，据说占国家总产量的50%，罐装可乐年消费量就是10亿罐。尽管中美关系紧张，被称之为“美帝国主义尖兵”的可乐已经完全浸透了中国市场。

各城市中钢筋混凝土的住宅群与高层建筑林立，高级饭店旅馆也与日俱增，天安门事件以后，旅店的空房率上升，似乎涉外饭店的经营不大顺利。合资，合办企业租用的情况大大增加。企业里，旅馆饭店的接待处常常可以看到电脑的使用，信用卡也被广泛地应用了。高技术企业也正形成，如中科院出资，由其下属计算机研究室创办的联想集团，以开发汉语输入软件得到成功地发展。街头鳞次栉比的露天自由市场，个体经营的商店。服装，食品，电器，杂货等应有尽有，年轻人越发讲究起时髦来了。尽管在中国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软预算和国有企业占有巨大比重，柯尔纳依所说的“短缺经济”似乎并不存在。

（3）增长的诸因素

人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将会很强。其各种因素是什么呢。与苏联东欧的严重经济困难相对比也是很有趣的。所谓坚持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如，计划出版发行60卷本的马恩全集），在经济体制方面不停地推行市场经济化，最终，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机能是支持中国经济强势增长的基本要素。的确由于市场经济的刺激，使人们对新的经济活动产生的兴趣和活力，显然对经济的增长作出了贡献。但如前所述，这种市场经济化是在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之下，逐渐实现的。请再一次注意到，其有效作用是比较稳定和广泛的。

例如，据深圳市政策研究室的王健一科长讲，在建设连结蛇口地区的150米宽的道路以及进行市产业基本设施建设时，土地的公有性就发挥了作用，在使用土地时与居民间不会产生转用和收容问题。只要市里准备好新的住宅与就业机会就可以了。据

说，与香港相邻，作为开放政策与市场经济榜样的深圳地区国有企业占其生产总额的64%，包括深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占商品经济化较深入的广东省总比率的8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克华教授举出了以上数字，在广州80%的生活用品，75%的生产资料都可以以市场调节价格购买，计划与市场就如同水与乳一一交融在一起。

这使中央政府的作用大大降低。而各省市的行政权限，领导权力相应加强了。各省市也都竞相向自己省地区内部投资加强基本建设和增强企业活力。这种状况被称为诸侯经济。彩电的成套生产设备引进超过五十多家，各城市都有不同的地方产品。这与规模经济的发展方向有悖，因而中央多次提出要企业集团化。而劳动集约型的中小企业、工厂对于搞活区域、地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与基本建设投资的活跃，与单纯的市场竞争又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的诸侯经济能促进其竞争也是很有趣的。

如果说苏联经济的停滞是由于多年只是数量的扩大，为实现工业化而容易动员的能源、资源与劳动力的供给变得紧张的话，在中国这方面还有充分的余地。不仅石油资源充分，最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又发现了占现全国石油蕴藏量1/6的石油，1/4的天然气油气田。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自由市场扩大，粮票的作用减小，只要谋得职业找到住房就可以搬迁了。既有省与市来进行劳动力的征集和分配的，也有企业直接出广告通过考查选拔录用的情况。在中国正在形成广义上的劳动市场，可以认为其供给在农村还是很充分的。

在国际上看，中国经济发展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各国的高速发展紧密相联，构成世界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亚洲经济的重要一环。在89年以后严峻的国际环境中，通过香港保持了巨大的进出口贸易额，各城市中都设立了与日本、韩国及香港企业的合办合资企业等。这样通过以亚洲为基础的华侨国际资本网络，使中国内部与周围各国活跃的经济发展密切联结起来，无疑地促

进了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发展，这也是苏联东欧所没有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4) 增大的贫富差别问题

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增强了活力，但在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别等问题。

其一是地域发展不平衡进一步扩大。邻于香港的广东省经济的充满生机的发展使人联想到美国与欧洲所出现的产业部门第二次向南方转移的趋势。而天津等旧重化工工业地区多陷于停滞化。现在正在上海浦东地区以深圳第二为目标设置了经济开发区，进行基本设施建设，面向海外招商吸引投资。即便浦东开发成功了，也难以以此来带动其他地区及内陆地区实现同样的活跃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紧缩以后，据说因重视提高经济效率，农村的数百万乡镇企业被清理整顿。1985年以来再次扩大了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而这一问题将更难于解决。

其二是，城市中的收入差别也在扩大。城市的私人企业家中出现了百万元户，也开始出现了平时乘高级奔驰，住高级宾馆的豪华生活方式。虽然与其相距甚远，高收益的承包企业中，国营企业也可以分配到与基本工资（月平均约200元）差不多的奖金，还有完备的福利保健设施和住房等。而教师与研究人员则没有那分奖金，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反而低于体力劳动者。这也是希望实现西欧式的民主化的潜在不满之源的一个因素。

其三是，国营企业中亏损企业增多，达到总数的35%多。这里有来自于基本建设物资的低价格政策的价格体系扭曲，治理整顿中对建筑业、建材业的打击，化纤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伸缩性的财政与相关的软预算制及三角债的企业间信用膨胀，使企业亏损增多，治理迟延。也使亏损企业的效益降低，收入停滞。

其四是，国家财政由于这此国营企业的困难而出现巨额赤字，随着财政地方分权化，难于纠正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平

衡，不均等。

也许相对高速增长的中国也将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后尘，患财政危机病，在重视市场经济的活力时，难于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变为税收的增加与公正平等。这里还潜伏着通货膨胀的重新发生。

中国经济发展重新转入高速增长路线，而如何克服这些偏差和问题，体现其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特色及高速增长的实质，将是令全世界瞩目之处。

第七章 苏联的经济危机与体制改革

1. 改革的课题

苏联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是随着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在其倡导下，同年4月由党中央全会所发起的。

在此之前的勃列日涅夫时代(1964—82)，除了初期以外，并未能继承赫鲁晓夫时代(1953—64)批判斯大林(1956年)等革新之风，而是相反，推行了可以说是没有斯大林的新斯大林主义，表现出重新加强党和国家官僚统治体制的倾向。同时在其后半期，经济发展开始停顿，停滞。1965年9月决定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以从经济的外延性增长转向集约化增长，从集权的指令制度转向分权的经济制度为目标，而以国营企业为中心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

如，在决定价格时将拨款基金额也作为算定的基础，对此的平均利润额也被算入成本，而从企业利润扣除向国家财政转移部分的比率，与1965年70%相比并未有大幅度下降，在80年代初期仍占约60%，这一体制上的特征与由此所产生的停滞，在安德罗波夫(82—84)、契尔年科(84—85)总书记时代并未出现改善的迹象，而是益发严峻。

戈尔巴乔夫在其所著《关于改革》(田中直毅译，讲谈社，1981)中，就改革的势在必行作了如下论述。

“有一个时期，那是70年代后期开始明显化了。出现了难以说明的事态，经济失去了活力。无法达成计划者增多，困难如山，

难于解决的问题日益增加，停滞等与社会主义无缘的各种现象开始涌现。“这15年间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一半多，80年代开始陷于经济停滞状态……而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科学进步、高技术的开发及应用先端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大。”“提高总产量成了最优先课题，其本身成了目的。……消费者被迫完全服从于生产者，只能对其产品忍耐而接受。”

“我国的很多经营者并不考虑如何增加国有资产，而普遍地仅仅是努力如何将更多的原料、材料、劳动力、劳动时间注入产品，使产品获得高昂的价格。其结果尽管重视总产量，而商品却短缺。”“获得天然资源的困难与时俱增，并益发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而另一方面，这种无尽的设备投资扩大，投入增加的结果，引起了人为的劳力缺乏。而为解决这种困难，对实际未进行的劳动支付了高额的奖金……，寄生虫的歪风开始蔓延，自觉的高质量的劳动消失了。于是“劳动者与能力无关，都应得到平等的工资”的想法开始一般化了（同前引书P19—21）。

戈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的道德的价值观的腐败”也在泛滥，对政府失去信赖及民众的道德水平下降。革命时期，建设初期，五年计划当时是卫国战争，战后复兴时形成的国民团结意识淡化，酒精中毒、吸毒、犯罪现象增加、精神文明萎缩“某些管理岗位上，如同法律不复存在一样，欺骗、贿赂、盲从、追随者大有增加的趋势。”（同书P23—25）

这样苏联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国家领导人这样坦率地公开承认本国的经济社会危机实属少见。这一方面是向内外宣告要进行改革，求得协助，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改革开始时，戈尔巴乔夫的自信。然而，这也表明了苏联社会的危机之严峻并具有复杂的多重历史及现实的原因。

说起来，其基本的还是经济的危机。据苏联官方统计1970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明显停滞。据月刊《新世界》1987年2月号刊登的谢柳宁与哈尼的文章《狡猾的数字》认为，这些数字是不正确的，

应予以订正，据推算，70年代后期的停滞极为严重和突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推算也显示了同一趋势。（如表1）

表1 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推算（年率为%）

年	苏联官方统计	谢柳宁哈尼	CIA美情报局
1951—60	10.3	7.2	5.1
1961—65	6.5	4.4	4.8
1966—70	7.8	4.1	5.0
1971—75	5.7	3.2	3.1
1976—80	4.3	1.0	2.2
1981—85	3.6	0.6	1.8

从任一数值看，苏联的平均增长率从1951~70年间比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值要高，但进入70年代则明显转向停滞。而资本主义国家也在1973年末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中，转入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但是在资本主义于70年代后期出现某种程度恢复时，苏联经济却近于停滞。据谢柳宁、哈尼或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核算，到80年代前期，苏联经济陷入近于零增长状态。

经济停滞不止局限于数量的增长率，从质量来看，科技的民需性开发及运用滞后，特别是在70、80年代经济危机后重组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引进信息技术，实现了耐久性消费商品生产改型换代的多样化与高性能化，而苏联的消费品生产的革新和供给的扩大则大大落后。一方面企业中积存了大量过剩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普遍地存在科尔纳依所说的“短缺经济”现象，经济效益低下，商品供给不足。

与60年代前苏联经济的相对高速增长相对照，不能说集权的计划经济永远是带来停滞和低效率的体制。然而，第一、错误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将第一部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优先发展在政策上绝对化，在继续推行扩大重化学工业数量的同

时，出现了对生产技术革新，在于数量与质量两方面扩大消费资料的生产及扩大流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轻视。第二，在实现每年基础定额成为官僚明哲保身的基础的体制之下，为确保制定不大幅度超过上一年生产额的指标，实现其目标的有把握达成，出现了避免技术革新与开发新产品，在企业中积累过剩的设备、材料和人力的倾向。

这种倾向直到以重化工设备投资为中心，以量的扩大为经济增长主要路线的60年代尚有其可能性，如苏联尚存在丰富的天然资源有供给的余地，农村可提供大量的过剩人口给工业部门，同时还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念，卫国战争胜利自豪感，世界冷战结构下形成的团结意识所支撑，对当时苏联经济的增长还有某种适合性。至少不能是直接的大的障碍因素。因此，还可能支持高额军事费用，据说对国内国民年生产总值之比为美国的2倍，至少达15%。而在当然的冷战结构之下，严肃风纪道德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这种数量上扩大的发展进入70年代，正如戈氏所承认的一样，天然资源的采掘变得困难并价格上涨，劳动力普遍不足，在量上增长的两个条件都丧失了。斯威齐与麦唐佛也认为，这是苏联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斯威齐《革命后社会》，伊藤诚译、社会评论社1990年、补章）。可以认为到1973年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产生的对于劳动力与初级产品的供给余力而言，资本积累过剩导致的窘境在苏联又重演了。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曾出现了劳动纪律松弛，而苏联则是对集权官僚制的不信任和反对，酗酒等异常状态益发严重。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对于这种伴有劳动纪律松懈的经济危机、失业增多、低效率企业倒闭、通过企业的合理化、信息技术的普及等技术革新，反复进行努力节约劳动力与资源，劳动者被迫承担更重的压力，这样经济重新得到活力，恢复并发展。

相比之下，苏联经济处于以国营企业为中心的强有力的官僚

体制之下，转变招致危机的发展模式并非易事，明显缺乏重建经济进行革新的内在动力。资源与原材料的相对缺乏与企业的积存一起使“短缺经济”严重化，而所谓的“第二经济”，黑市经济的作用增大。随着经济危机的继续严重，军事费用的过重负担也难以承受了。

与这种经济形势相关联，政治社会的危机也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所应有的，劳动人民作为主人公参与并形成的自主、自由、公正的社会生活、民主决策，在党与官僚的巨大统治体制之下难以实现。虽然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结束了，人们仍在上意下达的官僚统治之下被压制、被异化。在非民主的各级决策过程中，对信息的统制，不公开化也导致了，以此而享有特权的阶层的腐败与贪污及渎职。由于城市化与教育的高度普及而出现的大量知识分子，技术者阶层，与在西方社会状况下，同僚所享受的经济、社会生活相比，在本身的地位，与官僚的关系、与工人的工资水平等方面，都感觉未受到正当的待遇，对这种社会状态抱有很大的不满。

而在广大的苏联内部所存在的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与传统的各民族的统一的维系，也是由经济的增长与社会主义理念来支持的，对于少数民族总是伴有很多政治的，官僚的压制。城市与地方，地域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也有增大的倾向。戈氏在前述著作中未大提及民族问题和长期以来的官僚体制自身的问题。但对照后来事情的进展，我们只能说，这也是需要解决的严峻的重大课题。

2. 改革的进展

改革是在戈氏的倡导之下，从苏共党内对社会经济体制全盘进行改革的起点。这一切，包括情报公开化，表现自由、实行民主化的方针等，得到了广泛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引起了种种议

论。然而，1989年的东欧改革，由于工人市民的参加和起义，一举使共产党及党的垄断国家统治崩溃，次年的多党制自由选举使原执政党在议会中成为少数派，出现了政治剧变，走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化。相形之下，苏联的改革尚维持着苏共的统治地位，大多是依靠内部的动力推进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活跃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热情成为重要的支持力量，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重心而推进的。同时，改革是“向着更好的社会主义前进，而不是离它越来越远。”（戈氏同前书P45）。

中国文革挫折后，1978年开始的体制改革，也是为了更稳固地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而进行的，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开放路线，如前章所述，在中央决策的计划经济中逐步纳入市场经济化，这样通过80年代，实现了经济的高度增长，虽有各种不平衡与不稳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基本取得了成功。

苏联的改革，与东欧的体制变革不同，与中国的现代化一样，保持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与中国的改革相比，明显有所不同，政治社会方面的透明化，各种不同意见发表的自由，对特权和腐败的批判等，以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为重点。这也可以称之为，比中国拥有相对多数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支持的戈氏改革路线的特点。对于如何应付经济危机，当然原来就很重视，但未能通过分析危机的原因，作出克服危机的完整对策。其方针是在很多动摇和曲折中推进的。

即，改革之下的经济政策，开始时是对商品经济化持慎重态度，对既存的指令性政治格局进行修补，首先对严肃风纪，整顿纪律寄托于了巨大的期望。

例如，改革开始后的85年5月，党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酗酒，酒精中毒的决定。制定了纠正由于工作时间饮酒及酒精中毒引起的劳动纪律松懈现象的方针，按这一方针，农村和集体农庄决定禁止贩卖和使用酒精类制品。据称这一禁酒运动两年中使国民每人平均酒精消费量减半。取得很大的效果。而由此所引起的

酒税大幅度减少带来对财政危机的严重影响，虽然可视为造成健全的社会所必付的代价，这种禁酒运动对劳动纪律的再振，经济的重建显然并未起到充分的作用。

于是，戈氏于1986年2~3月的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加速化”战略，以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为主要目标，为此提高生产率。但其措施仍是制定定额，努力在行政上使其完成，这些与以往的经济运营没有太大差别。即，以禁酒运动为开端，反复开展整顿劳动纪律的运动，引入“国家验收制”，强化质量管理体系，同时在1986年6月，为消除黑市经济，决定“加强对不劳而获的斗争，”以排除据认为约达国民收入1/4的黑市经济的不正当收入和非法所得。

但是，这一严肃纪律运动已经不能靠斯大林式的强制手段来进行。另一方面，不靠强制，唤起工人群众，经营管理者阶层的自发运动和合作支持这一方针，上面下来的运动，行政指令和领导也可能奏效。戈氏的政治领导们乐观地期待以支持公开化、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和广泛的国内改革这一环，可以顺利地严整经济生活中的纪律，来重建经济。

但，改革并未实现劳动者的参与和博得他们支持，以形成广泛的社会运动来开始。另一方面，在群众的感觉之中，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化、民主化，与停止和取缔黑市经济，重新强化岗位纪律、禁酒运动一定有些难于接受之处。在经济危机之中，无望提高收入，而进行严整纪律，取缔黑市等运动，对于劳动大众及部分管理者阶层来说，无非是强化劳动，经济生活的紧缩，加强自上而来的监视和管理，提高劳动积极性，结果对劳动积极性的提高，黑市经济的排除并无实效，以至带来相反的效果。总之，经济危机发展是仅靠整顿风纪、强化纪律的运动无法阻止的。接着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扩大企业自主权、引进改革。这事实上构成了苏联经济的市场经济化的中间步骤。例如，1988年11月，通过了个人营业法，实现了小规模个人经营自由。接着1987年6月制

定了国有企业法，于次年初开始实施。该法规定，取消一切自上指定的指标，购入资材和原料，支付工资等皆由企业靠其营业收入，自主调剂资金来解决，采用了完全独立的核算制，使其自主，以搞活企业。

接着设置了资材，机械补给委员会，将资材原料分配制转为批发商业制，并预定将实施价格改革。但这种转换和改革绝非易事，没能形成企业自主购买，贩卖的市场和批发商业系统，行政省厅也抱抵抗态度。在经济战略上极为重要的特定部门必需减少的国家定货并未减少，反而几乎都达到了百分之百。

这样实现了个人营业自由的同时，对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占绝对重要地位的国有企业虽然通过了完全独立核算制和加强自主活动的政策方针，未能实现价格的改革，不能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计划经济的统一调控作用也崩溃了，生产与流通反而失去了平衡，更加混乱。短缺经济，消费物资，特别是国营的贩买渠道严重供给不足，1989年时通货膨胀率已达10%，面临着国民经济生活绝对水平下降的危机局面。

1988年发生了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阿美尼亚人要求加入阿美尼亚共和国的大规模运动。波罗地海东岸三国结成了要求独立的人民战线，苏联所内存的复杂民族问题开始喷发而出，苏联的政治经济危机更加难以控制。

为应付经济危机的严峻状态，90年10月苏联最高会议通过了“稳定苏联经济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向”的决议，以此来克服计划与企业自主性的不谐调引起的混乱，采取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并主张，“这与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并无矛盾，”对于通货膨胀，失业，收入差距过大，地域发展不平衡，有必要采取宏观的经济政策，并应充分兼顾社会政策方面的最低工资标准、就业保障、生活扶助、医疗教育等。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经济化。根据这一方针，将在一年半或二年之间，经过四个阶段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市场经济化。

第一阶段是非常措施过程时期，将削减财政赤字、改善商品与通货的不平衡，平抑物价，防止生产滑坡，推行所有制的非国有化（转为集体、合作、股份公司、私人所有制）。

第二阶段，转入严格的金融管制和灵活的价格体系的时期，对于重要的燃料、原料、资材及维持最低生活所需消费资料等，所有商品的1/3以上维持固定价格，其它价格过渡到市场价格。

第三阶段，进一步形成市场和住宅市场，撤消对工资体系的严格法律控制。

第四阶段，在达到稳定市场的目标之后，为实现市场自动调整机能的必要竞争市场环境，而排除国家管理，努力促进私人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企业日常业务所需外汇与卢布自由买卖的前提。

这一方针是1991年5月戈氏在请求西方国家对苏经济帮助，在伦敦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在向国际货币基金及欧共体提请援助时也是公认的必要条件。显然，这里有着反复向这一方向诱导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对顾问团的影响。然而，这一经济政策本身并未能避免抽象的幻想，要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实现稳定经济，结束危机，全面向市场过渡是不可能的，其本身就含有种种矛盾与不协调。

如，在广泛的物资短缺状态下，且财政赤字增大，易于通货膨胀的状况下，很多物资，服务的价格靠市场需求来定价的话，只会导致高通货膨胀率。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作用很可能导致投机，带来不平衡影响生产活动。因通胀生活水平会大幅下降，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由于通货膨胀要提高工资和生活保障费用的话，就不免会发生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与物价竞相上涨，因而恶性通胀，高物价的破坏性后果。而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物资及重要燃料、原料、资材等，眼下维持在原来相当的范围内成为一时固定价格。相关的生产部门和企业，对于其它物资、工资的上涨，应给予充足的价格差补贴，这与削减

财政赤字稳定物价的非常措施计划大大矛盾。

以新自由主义政策出发的东欧各国经济体制改革，尽管缺少成功的把握，在意识形态上看是具有一贯性的。相比之下，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在经济危机严峻状况下而产生的苏联市场经济化战略，是寄希望于新自由主义的稳定物价战略、自由市场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及福利国家政策方针，使其与社会主义劳动群众的劳动生活权及参与决策权相混合存在，相互协调，取得好的效果。形成取代集权的计划体制的经济秩序与乐观和谐的论述。

但是，苏联的财政近60%依靠交易税与扣除的利润。在经济危机中难免会出现年度财政收入减少的倾向。而从另一方面看，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要保持工农民众的支持，则不能轻易削减占财政支出5成多的国民经济费与3成多的社会文化科学费用，这样改革的过程就成为不断积累财政赤字的过程了。

85年苏联的财政赤字是1416亿卢布，到88年则积累到3118亿卢布，翻了一倍多，而到90年仅仅一年就增加了1674亿卢布，1991年5月则为5999亿卢布（按官方汇率约1兆美元），到91年末可能突破7000亿卢布。91年5月的累积赤字有，由中央银行的借款1855亿卢布，经中央银行从国营企业的剩余款项及企业的住宅基金等存款中借入1743亿卢布，向企业发行的国债（15年期限）496亿卢布（其中企业认购的达20亿卢布左右，其余由中央银行认购）。有依靠存款部分，而大量的靠发行新人民币作为财源，这显然将促发通胀。仅就财政危机累积债务的严重状况看，也可略知，要迅速实现向自由市场价格的过渡，遏止通胀，终止生产的滑坡，使其恢复的方针计划是多么不现实，充满了荆棘。

这样克服经济停滞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就是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经济战略的重点也不断发生变化，首先以提高劳动者的道德水准，整顿劳动纪律为开始，经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到以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为基本方向。然而，是否这样就能遏制经济危机、给经济注入活力，使其复苏，还是很大的问题。91年苏联经

济仍呈负增长状态，也没有迹象表明这次滑坡已进入谷底。

3. 从改革转向苏联解体

毫无疑问，苏联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第一、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旧的集权的党、国家官僚的压制性统治、腐败、特权，从内部受到了全面的批判，出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运动。改革在这一意义上，提出了重大课题，也给社会主义的新生带来了希望和期待。

第二、从此出现了苏联社会的情报公开，可以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各种活跃的社会运动广泛出现，如生态学、人道主义、工人运动、民族问题等，而从前这些都在被禁止之列。人们开始关心政治，注视改革的前途和意义。实现了通过非暴力的民意而左右政治方针和社会系统的状况。

第三、通过戈氏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思维”，从全人类的观点出发，谋求和平裁减军备的政策使其与美国间的裁减核武器的谈判获得成功，冷战因而终结。虽说，这是在为了缓和财政危机，美苏两国都有必要裁军的情况下实现的，但，大大减少了大规模核战争所能给人类造成灭亡和巨大灾害的威胁，这一贡献本身就值得大书一笔。这使对国民总收入相比，约为美国2倍，达百分之十几的苏联军事费用负担的减轻，财政危机得已缓和，为重新搞活经济开辟了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可能。这一转变的成败，也是苏联经济今后具有重要决定意义的大事。

而对国民各人自己都拥有决定选择其前途的权利。戈氏所表明尊重国民民主自决权，这是对56年匈牙利事件、68年捷克事件，苏联介入80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等历史的自我批判。89年的一系列东欧变革，后来的发展如第三部分第一章所述，尽管是出于

权，给予经济自主权及联邦国家的解体将会缓和这种困难，不如说增加了各共和国间的经济合作与负担的调整问题，更加复杂了。

以全面市场经济的经济调整机能为抽象模式，为实现这一理念即，摆脱经济危机的战略的新古典派们的想法及以此出发的当前苏联改革计划，在现实中常常碰壁而停滞。成功的概率正在下降。现在苏联经济中所出现的是运用国民经济计划方面已失去机能，而未形成条件的市场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陷于计划与市场之间进退维谷。因此而出现的短缺严重化，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中的结构性短缺，而是有一种特殊的危险。

而且抽象模式的市场体系的优点，是苏联经济中出现的悲剧，并不能立刻反证该模式的不正确。凯恩斯之前的新古典派与近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攻击工会的存在是对市场合理机能的障碍。而苏联经济危机的日趋恶化，常常被当作由于决策者意识的落后，向市场过渡方针提出迟误，遗留有计划机构“社会主义”的劳动权、生活权等。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界在论及有关经济援助问题时，也常常出现这种论调。应注意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改革最终的理念，重塑人道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

第三，以重建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中，终始有赖于工人群众民主的主动参与，这一方面也未得到充分实现。由戈氏自上而下开始的民主运动，得到了城市广泛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支持，在打破传统的党国家官僚的非民主的情报管理及特权方面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工农大众尚未成为主力军，并未登台表演。

在工厂中也是如此，企业管理部门、党委、工会组织三方面，排斥工人参与决策的旧体制难以发生变化。88年实施的国有企业法虽标明向工人自主管理企业过渡。工会评议会被当成管理部和工会的咨询机关。工人自主管理的理念很难变成现实。在市

场化、民营化的方针之下，企业经营者层的权限得到扩大，工人在有失业威胁之下缔结雇用契约。

工人大众参与积极变革的尝试，明显被寻求民族独立的各共和国，及其内部的自治共和国独立运动所吸收。这能否成为工人作主人翁重建社会主义运动，还有疑问，实际常常有反社会主义的倾向。

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中，严肃劳动纪律、强化质量管理，在独立核算条件下，企业经营更严峻的状态下，企业当局使工人面对恶劣的劳动条件，而报酬的提高与对经营的参与却无望实现。反而由于通胀而物资短缺、生活水平下降。

反对这种状态，工人有组织的运动增多，常常发展为罢工。90年大规模的煤矿工人罢工显示了强大的威力。这些虽然是与市场经济化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不一致的因素，但工人大众的参与为重建社会主义，创造新社会或多或少作了准备。这种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集结左派力量的尝试取得了进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造成很大的影响，值得注意。（如何参照鲍利斯·加加尔茨基《莫斯科人民战线下的改革》估久间邦夫、水谷晓汤川顺夫译拓殖书房89年）

这样以戈氏首倡的体制改革，远远超越了戈氏的意愿。苏联体制内积累的深层对立和矛盾爆发出来，如同打开了地狱的大门，出现了深刻广泛的社会危机。与戈氏的意图相反，联邦本身也走向解体，成了以致于在理念上否定社会主义的严重危机。

在激进改革派立场上91年6月的选举中，得到支持，取得俄罗斯大总统地位的叶利钦与戈氏的对立正象征着以民族问题与经济问题为核心的严重危机之中难于决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其政治领导部的内部分裂和软弱，对于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动摇。在经济运营中回避国家的责任，对市场经济化抱着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1991年8月保守派政变之后，受到人们支持的叶利钦也只能以各共和国的独立，共产党的解体为政策的重点，而在经济方面并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畏惧而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苏联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思维”之下，对各国人民大众进行的社会变革予以了承认。

另一方面，重新评价中国为“东方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束了60年以来中苏对立的历史，在外交上努力修复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建立合作关系，值得重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从冷战转向和平的交流，扩大合作，尊重各国的自决权，以开放并加入世界市场为方向。在国际关系方面苏联的改革，与中国体制改革的趋势发生共鸣，对朝鲜、越南、古巴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会造成何种影响，中国正为之担心。不能认为这是共同向资本主义体制的“和平演变”，而是尝试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的变革。这种趋势令人瞩目。

另一方面，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混乱，也表现出其局限性。如，要克服所出现的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这也是在几方面将面临的重大选择。

第一、苏联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由于改革，承认民主主义与民族自决权的契机不断出现，而对此所作反应，时常是调动军队造成紧张局势。91年8月所谓保守派政变失败之后，共产党被解散，于是国家的名称，主权联邦都被更改，国家也终于解体了。

这一形势不仅本身造成了极为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就处理方针，在加强各分权共和国的独立性，边维系综合纽带边进行调整的方向上，联邦制所起到的经济作用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理念还会保持下去吗？今后的苏联体制改革也面临着重大考验。

实际上，1991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的斯拉夫签定了三国独立共同体协定，其他共和国也陆续加入，苏联的解体进入最后阶段。

第二、这种状态下，作为改革的起点，克服经济危机变得更加重要。若能重建经济，并开始顺利地恢复和发展，就会有余力对地区性民族对立及不满进行调整。相反，实际经济危机严重，

民族问题的处理也更棘手了。作为经济危机对策，经过了模式重建，加强企业自主性、全面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不断变化。然而，苏联的经济充满了困难和矛盾，未见多大成果。相反是危机深化，再生产停滞并萎缩。

通过这个过程，人们发现苏联占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这一有利于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特点，在摆脱停滞和紧缩之中并未发生作用。经济体制的这一社会主义特点并不能与重要政策的情报民主公开决策的改革在同时发挥作用，也未能有力地落实节约能源和劳力的战略，实现经济的稳定和恢复。这使人想起战时日本经济的稳定化与向战后经济的转变，都是在倾斜生产方式等国家产业政策、物价管制、金融调控下实现的。苏联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市场经济化也应与这种产业政策相配套，在具备现实条件时，或创造条件来逐步推进，否则难以奏效。还会带来混乱，起反作用。

而东欧变革的前前后后，与资本主义各国直接与间接的推动也密切相关。推出诸如一揽子全面市场经济化政策，似乎这就是克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市场经济，一方面是长期经营的私人资本之间的财产、服务、资金等交易惯例、制度、法律等及掌握这些的人的意识，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就没有这方面的社会系统。另一方面全面市场经济化，必须形成市场及很多企业以其资本在市场上追求利润，有企业可以自由雇佣、解雇的劳动力市场。

这整个过程尽管不可能象马克思论述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英国历史中资本主义发生期那样，但在颇长的一段时间内应有广泛的社会变革与强有力的政治的支持。如国有企业民营化时出现的地域、产业，企业之间不平衡的利害关系，全民资产流入私人手中的不公正分配的危险，企业整顿与合理化过程中发生大量的失业等，如前面等三部分第五章就东欧问题所述，苏联仍标榜为社会主义，因而将会出现更大的困难。与其说向各共和国的分

未提出稳定与恢复经济的有效措施和计划。即，仍然依据抽象的一揽子市场经济化为唯一的基本方针。而苏联社会的深刻经济危机与现实条件决定，只靠市场经济化是不解决问题的，全面市场化本身就行不通。

在这种危机的不断深化之中，重建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希望是否被放弃，这有待于苏联人民来回答。这是基本问题所在。以重建健全的社会主义为目标，苏联左翼人民战线正在努力尝试以工人运动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寄希望于人民对社会的选择。在联邦解体，各共和国独立、经济危机深化之际，益发深入人心。这一动向与反对就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用的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再建运动及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活跃和实践运动结合在一起，相呼应而发展。

总之苏联的改革与联邦的解体，通过经济危机表现出社会的全面严重危机。从长远来看，这一历史将起到重建健重的社会主义熔炉的作用。我们要深刻理解这一历史性苦难的意义，与苏联人民共同思考这一课题。

后 记

历史一闪而过，以无法预测的速度和广度发生了连锁反映，出现了东欧变革、集权计划经济国家陆续放弃社会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在积极地推行市场经济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解散了联邦，共产党不复存在了。

1917年的俄国革命，标志世界从此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是人们的普遍认识。的确，20世纪曾发生过一系列的革命。以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成为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很多人都认为，历史在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全人类解放的目标迈进。

这一对历史变化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败为胜被讴歌。难道这是历史的终结吗？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根本无法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安定、贫富差距与压迫、剥削环境的破坏，劳动人民的过度疲劳等问题。于是，只有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的局限性、重新寄希望于社会主义。

在飞闪的列车中只注视眼前的景物就会晕眩，失去方向感。在剧变的世界中，当前应解决的课题之一，即，搞清这种变化的意义，重新澄清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原则。这是事实的根本所在。

本书依这种观点，试就现代社会主义危机的意义，从基本的，长期的观点加以研究。其中的提示之一是，在遥远的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能形成均等的近于一致的形态，而当前，则是计

划与市场相结合，具有广泛选择的余地。

从这一观点看，过去所认为唯有苏联型社会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曾经为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及在其失败后的某种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主张在理论上都是十分狭隘的见解。另一方面认为苏联型社会的失败是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及新阶级社会的原因。这里可以逃避社会主义失败的批评，但有些不负责任，也没有经济学的论据。本书不赞成这一观点。如果那样的话，就是将苏联型社会所形成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看作可以与民主主义经济相结合并共存的社会主义模式了。

在迅速变化的时代，在重新探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愿本书能引导读者看到未来社会主义重新诞生的光明和希望。

1991年12月15日于东京
伊藤诚